



目 录

专 论

- 3 李中海 /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知识重
构及政策影响

政党研究

- 28 强 舸，叶尔郎·马季耶夫 / 哈萨克斯
坦“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和发展
趋势
- 51 聂侯诚 / 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
——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
年)

区域身份构建

- 101 谢尔盖·比留科夫 / 身份认同与地区政
治经济发展——以俄罗斯巴什科尔
托斯坦共和国为例
- 124 葛静深 / 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
多维话语建构
- 162 李 暖 /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
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
归国难题
- 189 王弘毅 /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
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阎德学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0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и Чжунха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знани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3)

Цян Гэ, Ерлан Мадиев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азвитие парт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Нур Отан»... (28)

Не Юйчэ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зменение характера и причины (1992-2019 гг.)..... (51)

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На
пример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101)

Гэ Цзиншэнь

Создание многомер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124)

Ли Нуань

«Русификация», от которой трудно избавиться---проблема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евреев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162)

Ван Хуньи

Поль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редней державы---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жидания от роли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18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0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i Zhonghai

Contemporary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s: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and Policy Impacts..... (3)

Qiang Ge, Yerlan Madiyev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Kazakhstan Nur Otan Party (28)

Nie Yucheng

Political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Local Politics---Role Changes and Causes (1992-2019) (51)

Sergey Biryukov

Identity and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in Russia..... (101)

Ge Jingshen

The Multidimension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Arctic Macro-Regional Identity..... (124)

Li Nuan

Unescapable "Russianization"---Russian Jews' Returning Home in the Context of Post-Soviet Diaspora (162)

Wang Hongyi

Poland's Medium Power Diplomacy---Identity Positioning, Role Expectation and Diplomatic Preferences (189)

专论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知识重构及政策影响

李中海*

【内容提要】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在破除苏联时期的教条主义后有了极大发展。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7年金融危机，围绕着经济转轨、克服经济危机、启动增长进程等问题，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吸收西方经济思想，试图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货币主义理论，为解决当时紧迫的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但由于现实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俄罗斯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思想能否解决本国严峻的经济问题产生了怀疑。从1998年至今，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注重从本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寻找智慧源泉，并广泛引进西方各流派的经济思想，试图通过将西方经济思想与本国思想传统结合起来，找到适应本国经济现实的发展之路。至此，俄罗斯经济思想开始呈现出多元发展、相互交织的局面：新制度主义强势兴起，政治经济学悄然回归，传统经济思想复活，货币主义的理论影响力下降。代表各种流派的经济思想相互撞击，纷纷提出振兴俄罗斯经济的政策主张，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倾向于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获得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认可；但货币主义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对财政、货币、产业等诸多领域仍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思想 货币主义 新制度主义 俄罗斯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003(25)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

“俄罗斯有经济思想吗？”每当提起俄罗斯经济思想，总有人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将经济思想定义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看法、观点和主张，那么这一问题则不答自明。古往今来，小到有基本思考能力的个体，大到一个民族，只要这个个体和民族从事经济活动，都会有自己的经济思想。他们思考如何利用自然条件和人的智力与体力，创造出用于满足个人和群体需要的财富，在这样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自己的经济思想。俄罗斯当然也不例外。

经济思想对经济活动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思想都是其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在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强人主宰的国家来说，其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同样处在某些经济思想的影响之下，这是因为强人的思想和意志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或者是过去时代某些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对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进行梳理研究，考察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经济的本质特点和发展方向。

一、经济思想的定义与价值判断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在经济上长期落后于西方。一般认为，俄罗斯经济总是比西方落后 50 年左右。^①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个疆域如此辽阔、资源如此丰富、人口素质如此之高的国家，为什么其经济长期落后于西方，为什么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此艰难，为什么其经济现代化进程如此曲折？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改革，虽都曾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大多半途而废或转向，其原因何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到底是要依赖于外部经验还是需要寻找适合本国实际的独特道路？西方经济思想能否用以解决俄罗斯经济中遭遇的问题，或者俄罗斯经济学家能否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和解决

① 关于俄罗斯落后于西方，很多学者有过论述。如 1880 年本格（Н.Х. Бунге）在致亚历山大二世的呈文中就曾写道，“俄罗斯落后于西方 50 年”（Власть и реформы. М.: Олма-Пресс; Экслибрис, 2006. С.349）；法国作家司汤达指出，“俄罗斯人有意识地学习法国的道德，只是要滞后 50 年”（Травин Д., Маргания О.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М.; СПб.: АСТ, 2004. Кн.1. С.18）。弗·马乌也赞成这一观点，详见 Владимир Мау.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вызовы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науч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Е.Т. Гайда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0. №.6.

本国所面临问题的适宜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俄罗斯国内外学者从多种理论进路、多个侧面和角度，进行过大量广泛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关于俄罗斯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开始增加。进入 21 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学界围绕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是否存在“俄罗斯经济思想学派”，进行过至少三次大辩论。^①虽未达成共识，但围绕经济思想问题的研讨，促使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深入反思经济研究的新范式、西方经济学对俄罗斯现实的适用性以及有关俄罗斯经济的其他诸多理论问题。

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思想研究大多侧重挖掘十月革命前的经济思想，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更多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从认识论和理论高度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在此仅列举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如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教授哈宁（Г.И. Ханин）所著的《对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争论》^②，德国的俄罗斯经济思想研究者乔希姆·茨维纳特（J. Zweynert）的文章《俄罗斯转型争论中的思维模式冲突：1992-2002》和《俄罗斯转型争论中的思维模式冲突：2003-2007》^③，俄罗斯经济学家格拉齐耶夫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等。^④这些研究成果从经济学范式角度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思想的演变进行了阐释。本文试图将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与经济政策联系起来，透过经济政策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来考察政策争论的焦点和本质，从而把握俄罗斯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可能走向。

① 俄罗斯经济学界关于经济思想的三次大辩论详见会议论文集，分别是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 Под ред. Л.И. Абалкина. М., 2003;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школы* / Под ред. Ю.В. Яковца. М., 2003; *Российская школ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истоки, принцип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атериал сессии пер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 Общ. Ред. Ю.В. Якутина. М., 2010.

② Ханин Г.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дискуссии 90-х годов 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 *Terra Economicus*. 2014. Том.12. №.2.

③ Joachim Zweynert, “Conflicting Patterns of Thought in the Russian Debate on Transition: 1992-2002”, *HWWA Discussion Paper* 345, March 15, 2006; Joachim Zweynert, “Conflicting Patterns of Thought in the Russian Debate on Transition: 2003-2007”, *Hambu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WWI)*, September 2009.

④ Глазьев С.Ю. О новой парадигме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2016. №.56.

要对经济思想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经济思想”不是一个已获得共识的概念。有学者提出,所谓经济思想是以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为对象,对经济活动的动机、条件、方式、后果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思想是以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基础、确定其基础概念和体系结构方向的思考方法。^①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思想是针对特定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与经济思想相近但有所区别的概念有经济学说、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思想等。较之其他几个概念,经济思想的视域更加宽泛。也有学者对经济思想的构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经济思想是由想象力和正规理论共同组成的。想象力是个体用以看待世界的宽阔感知;正规理论则包含捕捉想象力的具体模型。要了解单个经济学家的思想,必须既了解他们的想象力,又明白他们的模型。^②

研究与经济政策相关联的经济思想,首先遇到的可能就是经济思想的价值定位问题,即以何种思想为基础所制定出来的政策,其价值取向是怎样的。一种侧重于经济效率的思想可能有损社会公平,偏重公平的思想可能不利于充分发挥效率。在学术界,考察一种经济思想一般是将其置于国家、社会和市场这三个维度内。倾向于国家方面、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经济问题的思想一般被称为左翼思想;而偏向于市场效率的经济思想一般被称为右翼思想;居于两者之间偏向于社会利益的思想一般会被当成中派,视其对国家和市场的态度可能被称为中左翼思想或中右翼思想。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思想的价值设定是由其对立面所决定的,针对不同方面存在以下截然对立的思想:全球化与自我隔绝、对外开放与自给自足、市场调节与行政化管理、自由竞争与国家垄断、市场化自发发展型经济与动员型经济等。目标设定就是要找到实现价值原则的衡量尺度——是选择自给自足的衡量尺度、稳定性的衡量尺度,抑或是社团主义的衡量尺度、意识形态的衡量尺度等等。^③

① [日]八木纪一郎:《经济思想——从古典到当代》,何慈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 [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科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③ Якунин В.И., Багдасарян В.Э., Сулакшин С.С. Иде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обл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ыбора. М.: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08. С.12.

在经济学说史上，一般按不同学派的基本价值取向来为一种思想定位。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一般意见，最近 200 多年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发生三次转折性变化，分别是亚当·斯密革命即自由放任革命、杰文斯革命即效用或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即宏观经济学革命。这些“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凯恩斯革命对重建整个经济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凯恩斯理论，20 世纪 50-70 年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几个不同的重要支派。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 Davidson）认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已沿着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分析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路线发展。以凯恩斯理论为中心，向左右两方面发展，形成了中左的新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为罗宾逊夫人、卡尔多、帕西内蒂、斯拉法等），极“左”的社会主义激进学派（代表人物为加尔布雷斯），中右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为萨缪尔森、索罗、托宾等），极右的货币主义者（代表人物为弗里德曼）。这些学派对货币、工资率与收入分配、资本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政府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①

了解一种经济思想的来源有利于我们对其价值和政策取向作出判断，并可据此看出一种经济政策对现实经济社会的适宜程度及可能的影响。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在破除苏联时期的僵化教条后获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新局面，认识这些思想及其价值和政策取向，有利于我们认清俄罗斯经济政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需要特别指出，在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不存在类似于几何学中那样的公理和定理，它们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在总结经济现实基础上为解决特定时代的特定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因此不存在优劣对错、先进与落后之分。对任何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绝对化理解都有违科学精神，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为基础，对不同经济思想及其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① 详见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二、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知识重构和体系重建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苏联解体初期（1991-1996年），在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这是改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时期，也是围绕经济改革和转型进行激烈争论的时期；在经济学思想方面，是面对经济急剧衰退的现实，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生激烈碰撞，前者节节败退，后者高歌猛进的时期。第二阶段为1997年至今。此时俄罗斯经济现实发生了明显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经济转型造成经济下滑，俄罗斯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需要在货币主义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之外寻找新的理论。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在经济政策上开始从激进转向谋求增长和发展转变，在经济思想上开始多元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形成相对稳定但界限不甚分明的经济流派，突出的特点是：制度经济学强势复兴，政治经济学悄然回归，沙皇俄国时期传统经济思想复活，货币主义理论虽然遭到质疑，但是政策影响力依然不减。

（一）第一阶段的经济政策争论及经济学知识重构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学界就在反思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1986年8月底，一群青年学者聚集在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名为“蛇岗”的疗养基地，对苏联的前途命运、苏联能否实行市场经济等当时看来颇为敏感的问题进行研讨。在今天看来，这场研讨会已成过眼烟云，但在苏联和俄罗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大都成了影响俄罗斯政治经济进程的代表性人物。会议的召集人盖达尔和丘拜斯成了俄罗斯激进改革的急先锋，其他参会者有的跟随他们进入了政府，成了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如阿文和乌留卡耶夫；有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成了今天对俄罗斯政府经济政策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重量级专家，如马乌。这场当时不为人知的研讨会既埋下了“休克疗法”的种子，也成为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多元化的开先河之举。此后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和俄罗斯的独立，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根本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到苏联解体后的激

进市场化转型，在较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俄罗斯经济科学不可能提供有关经济转型和改革的哪怕是粗浅的理论，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解释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经济现实，更不能为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经济界只能寻求外来理论的帮助。至于当时决策者所选择的理论是否适合，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经济中遽然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任何科学都无法做出预测。当时只能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选择可资借鉴的现成理论，而在当时的西方经济科学中，这样的理论同样非常有限。这一时期俄罗斯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基本共识都是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要将国家的作用降到最低程度，主张以市场方式进行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资源的自动配置。当时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影响如日中天，将这一理论拿来用于解释和指导经济政策顺理成章。以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俄罗斯年轻改革者们相信以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能够挽救濒于崩溃的俄罗斯经济，于是制定了以国有资产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转轨方案，并得到了具体落实。“休克疗法”成为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经济政策的主轴。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思想按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经济政策思想的线索，即从不同思想及其原则出发对经济政策进行争论，二是经济理论思想即经济学知识的重构和经济学人知识的更新。

1. 经济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思想

俄罗斯独立后最初几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遵循货币主义思想制定的，改革和转型是主基调，造成的后果是经济滑坡和衰退。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独立初期的经济下滑不是当时的政策造成的，而是继承自苏联时期经济的先天不足，或者是因为没有更严格地遵循货币主义思想，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本文对此不作深入分析。归根结底，在经济衰退的现实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学界对这种政策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争论激烈，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除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外别无选择。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当时协助叶利钦制定经济政策的年轻经济学人，包括盖达尔、丘拜斯（Чубайс）、利夫希茨（А. Лившиц）、阿列克沙申科（С. Алексащенко）、伊拉里奥诺夫（А. Илларионов）、马乌（В. Мау）、

纳伊舒利 (В. Найшуль) 等。他们认为, 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必须遵循国际金融组织开出的药方, 政府的任务是保障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 在当时俄罗斯的经济条件下, 只能通过自由主义的经济转轨快速实现市场化, 并通过市场作用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持这种观点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也开始建立新的经济研究机构。如纳伊舒利创建了国家经济模式研究所, 在盖达尔的支持下建立了过渡经济研究所(现更名为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别列津建立了社会研究所, 等等。

第二种看法认为, 货币主义政策的失败不是货币主义思想本身存在的问题, 而是因为俄罗斯的现实从最初就不符合货币主义的原则和实行这种政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他们不否定货币主义理论本身, 但承认俄罗斯现实与实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所需的前提条件相去甚远。奥利谢维奇 (Ю. Ольсевич)、什梅列夫 (Н. Шмелев)、汉德鲁耶夫 (А. Хандруев) 等指出, 国际金融组织和俄罗斯政府内的“伪货币主义者”夸大了货币主义理论的作用, 歪曲了弗里德曼的许多观点, 没有考虑这一理论的先决条件和限制因素。罗格娃 (О.Л. Рогова)、缅什科夫 (С. Меньшиков)、波焦姆金 (А. Потемкин) 等对货币主义政策原则、纲领和方案的实际落实提出批评。亚夫林斯基也是批评者之一。批评者通过经济学类杂志发表大量文章, 如《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专家》(«Эксперт»)、《经济学人》(«Экономист»)、《俄罗斯经济杂志》(«РЭЖ»)、《社会与经济》(«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МЭиМО») 等, 从货币主义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 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批评。

第三种看法认为, 货币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 俄罗斯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制定经济政策。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货币主义及其政策的批判者, 代表人物有: 利沃夫 (Д. Львов)、格拉季耶夫 (С. Глазьев)、卢金 (Д. Лукин)、博格莫洛夫 (О. Богомолов)、切尔诺维茨 (О. Черновец) 等。他们主张按凯恩斯主义制定经济政策, 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模式。

同时, 不少学者认为, 当时俄罗斯选择货币主义思想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而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当时的决策者希望使经济转型进程不

可逆转，使俄罗斯完全走上市场化道路。因此，如果从经济目标和效率角度看，俄罗斯早期经济改革者的决策或许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看，一切都非常明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以及实行严厉的货币政策和“休克疗法”等措施，符合当时新上台的执政精英的政治利益，即为了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要创造出一个富人阶层，并使之成为新执政精英的社会支持者。^①激进改革者在总体上同意这样的假设，即货币主义方针具有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但针对具体目标和任务而言，应有不同的政策选择。在苏联解体、政权软弱、政府已不掌握影响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手段和工具的情况下，除了实行以货币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外别无其他选择。

2. 经济学知识的更新和重构

针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的新政治经济现实，经济学界开始寻找新的经济理论范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失去了合法性，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在制度剧变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走出苏联时期的思想封闭，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和枝繁叶茂的西方经济学，认识到他们曾经坚守的教条化的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大厦中较小的组成部分，全面认识西方经济理论已迫在眉睫。再者，苏联解体后实行的“休克疗法”急剧地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苏联时期经济科学研究对象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迅速打破，经济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现实需要新的理论，要研究新现实，解释新现实，更重要的是要为现实经济转轨和新体制发展寻找理论依据，提供理论指导。

1992年是俄罗斯新经济科学的起点。随着苏联时期经济理论的退出，俄罗斯经济学界面临更新经济学知识和重构的双重任务。经济学知识更新和重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学知识的更新。此时的俄罗斯经济科学不是继承而是要抛弃苏联政治经济学中的丰富遗产，老一代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一无所知，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排斥西方经济学。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人与老一代不同，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并不抱排斥态度，但对其同样知之甚

^① Кириченко В. Усиление гос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углубление или приостановка ре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9. №.12. С. 3-13; Мау 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критиков. «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форм и обвинения в адрес реформаторов//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999. №.11. С.4-23.

少。苏联时期的经济学家善于用逻辑思维形式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一般能够看到经济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年轻一代经济学人缺乏这种能力。于是1991-1995年间俄罗斯经济学界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即，新老两代经济学人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回到同一水平，他们都面临着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任务。

经济学知识重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引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参考书。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构经济学知识体系。编写新的经济学教材就成了重构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初期俄罗斯的经济学家教材都是以美国的经济学家教科书为蓝本编写的。苏联解体后最早被翻译成俄语、进入俄罗斯的外国经济学教科书是保罗·海恩所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①，多兰和林赛所著的《基础宏观经济学》，平迪克和鲁宾菲尔德所著的《微观经济学》，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多恩布什、理查德·斯默兰所著的《经济学》（1993），保罗·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1994），坎贝尔·R·麦康奈尔和斯坦利·布鲁所著的《经济学：原则、问题与政策》（1992）等。这些著作被引进后，一直作为高等院校经济学教科书使用。

苏联解体两三年后，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饥渴虽然得到了满足，但人们也意识到，美国的知识养料不完全适合俄罗斯胃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写的一切，与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甚至超过了苏联时期。^②连自由派经济学家也开始抱怨正在形成高度数学化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院经济学，比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更远离实际生活。为了寻找出路，俄罗斯经济学家开始转向欧洲，引进西欧国家的经济学教材，但欧洲经济学教材同样不能帮助俄国学者弄清楚俄罗斯的经济现实。比如，扎伊捷利和焦民的《经济学说基本原理》，克巴疆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尔德和维普洛什的《宏观经济》。^③还有艾克龙德的《效率经济学》（1991），在《经济学：原则、问题与政策》出版前，这部著作一直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入门参考书。^④

① Хейне 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 мышления. М., 1991.

② Нуреев Р., Латов Ю. Плоды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1. №1. С.96-116.

③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б экономике» Х. Зайделя и Р. Теммена(М., 1994);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Ж. Кебаджяна(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6);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ка» М. Бурды и Ч. Выплоша(Сб., 1998).

④ 详见 Нуреев Р., Латов Ю. Плоды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97.

同时，俄罗斯经济学家和高等院校教师开始独立编写教学参考书，其中包括卡马耶夫主编的《经济与企业》，塔拉谢维奇主编的《宏观经济学》，努列耶夫编写的《微观经济学》，莫斯科大学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学院希多罗维奇主编的系列教科书，包括《经济理论教程》等。^①

（二）第二阶段经济科学发展特点及主要流派的形成

俄罗斯经济学人通过第一阶段的睁眼看世界，对西方经济学有了新的了解，开始从盲目崇拜向理性自觉回归，认识到照抄照搬他人的药方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开始寻求经济理论的多元发展。

1. 第二阶段俄罗斯经济科学发展的特点

从 1990 年代后半期起，俄罗斯经济科学开始摆脱国家主义和货币主义两种经济思想的对立阶段，试图在这种极端对立的思想之间寻找新的理论，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多数经济学家开始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无原则膜拜，倾向于客观看待和审视西方经济思想并力图有所超越，认为俄罗斯新的经济科学应提出新思想、新概念，形成自己的流派，不能成为西方经济思想的崇拜者、追随者和模仿者。俄罗斯经济学界认识到，不应该机械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路，应该是有科学依据地平衡地吸收，有利于解释经济现实，制定有效的措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经济学方法的更新、引进和综合，有利于发展新知识，最终使经济科学摆脱危机。

第二，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独有问题或重要问题开始进行原创性研究，如指令性计划经济运行的教训，开始提出与转型期经济相关的新思想。此时产业经济研究趋于活跃，如自然资源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数理经济学在苏联时期就较为强大的基础上得到较快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对影子经济非常关注，认为影子经济在转型期的存在可能威胁改革进程，导致市场原则被扭曲。

第三，开始以客观态度反思而不是完全抛弃旧的经济研究理路和方法，

^① «Экономика и бизнес»(МГТУ им. Баумана, под ред. В.Д. Камаев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ка»(СПбГУЭФ, под ред. Л.С. Тарасевича); курс «Микроэкономики» Р. Нурсева и «Микроэкономика» в 2 томах. ИППК при МГУ выпустил серию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под ред. А.В. Сидорович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Кур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и т.д.

试图借鉴西方经济学原则改变原有的经济研究范式，经济研究的理路、方法、原则和分析工具更加多元化，理论构建出现多元化和折中化趋势，本质是试图将各种互不排斥的经济理论综合起来。^①

2. 主要经济学流派的形成

进入 21 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学界形成了相对稳定但界限不甚分明的经济学流派，突出的特点是：制度经济学强势复兴，政治经济学悄然复活，沙皇俄国时期的“经济哲学”等传统经济思想复活，货币主义思想虽遭到质疑，但政策影响力依然强大，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原创性理论，但这些理论的影响力较小。

第一，新制度主义强势兴起。经济研究的制度学派主要起源于美国，是 19-20 世纪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1916 年沃尔顿·汉密尔顿引入“制度政治经济学”概念，认为有必要分析市场和市场行为，但还要考虑影响制度形成的技术、社会心理和政治等因素。1919 年他使用“制度主义”来标定这个学派。这个新学派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不仅区别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也区别于政治经济学。^②制度经济学聚焦经济发展问题，将经济发展视为演化的进程，研究制度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

制度经济学派形成之初，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对其态度消极。十月革命后，苏俄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属于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一，制度主义者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苏联官方经济研究团体对制度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启动，情况出现反转性变化，苏联经济学界开始引进包括制度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20 世纪 90 年代，制度学派的一些重要著作开始被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也有俄罗斯经济学家出版了制度经济学教科书，一些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创建了制度经济学会。他们通过创办杂志、举办研讨会等形式，不断扩大新制度主义

① 西方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比如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经济理论等都是在综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苏联时期经济理论家也试图将各种思想综合起来。

② W.H. Hamilton,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19, Vol.9, No.1, Supplement, pp.309-318.

的影响力，制度主义已成为俄罗斯最流行的经济学流派。^①弗罗洛夫（Д.П. Фролов）甚至认为，新制度主义的大爆发是 21 世纪初俄罗斯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②

目前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亚辛（Евгений Ясин）、阿乌赞（Александр Аузан）、波尔捷罗维奇（Виктор Полтерович）、雅科夫列夫（Андрей Яковлев）、沙斯季特科（Андрей Шаститко）、格里戈里耶夫（Леонид Григорьев）、努列耶夫（Р.М. Нуреев）、基尔季娜（Светлана Кирдина）等。他们主张发展市场经济，但呼吁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路和方法来研究俄罗斯经济问题，遵循制度主义思想制定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与新制度主义者在思想上较为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更适合于俄罗斯的社会传统，这种思想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更易于为俄罗斯社会所接受。

第二，政治经济学悄然回归。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语的人是法国的安·德·蒙克莱田，他在 1615 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分配的科学。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经济科学，西方经济学及其二级学科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而遭到贬斥。苏联解体后，政治经济学的命运发生逆转。俄罗斯高等院校取消了“政治经济学”，代之以“经济理论”等课程。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版本遭到漠视，直到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人们才再一次认识到这门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③一些经济学家要求重新评估这门学科的现实意义，主张在高等院校经济专业恢复这门课程。2002 年，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经济学家致函俄罗斯教育部，呼吁将政治经济

① Светлана Кирдин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 1930-2010-е гг.: инверсионный цикл?// Журнал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5. Том.7. №.2.

② Фролов Д.П.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эволюц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а//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8. №.4. С.130-139.

③ Бугалин 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ынок. Капитал. Общество// Terra Economicus. 2016. Том.14. №.1.

学重新纳入经济学专业课程之中。

同时，布兹加林、马梅多夫等经济学家希望挖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潜力以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发展潜力，探讨其对社会经济政策实际问题的解释力，他们认为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晚期资本主义半边缘经济来说，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殊价值。^①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各国的社会经济政策都是精英阶层实现其基本利益的一种方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政策更加透辟。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为政治经济学的复活做出实际努力。布兹加林（А.В. Бугалин）、梁赞诺夫（В.Т. Рязанов）、马梅多夫（О.Ю. Мамедов）等经济学家于 2011 年建立了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学协会，创办了协会刊物《政治经济学问题》，并于 2012 年召开了首届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政治经济学大会。

在具体理论和政策方面，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决定了这门学科要采用抽象-逻辑的研究方法；随着经济知识的发展和经济研究的深入，学术思想应远离个人主义方法论，远离生活和制度表面的现象，要对表象进行抽象，以便使经济科学更深入实际，随着经济现象的个人方面逐渐消失，社会方面越来越深刻；^②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不仅在于揭示市场如何运行或其代理人如何行动，而且在于阐释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和终结的，为什么要进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解释改革的影响因素，也有人呼吁要转向以生态-社会-人道主义为目标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③

第三，货币主义理论吸引力下降，但政策影响力不减。在几乎整个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货币主义处方制定的，这个处方要求控制货币发行量，使市场的自组织机制作用于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减少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者相信，以控制货币数量的方式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为企业自由活动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以竞争机制

① Бугалин 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②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пецкурса по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под общ. ред. д-ра экон. наук С.С. Мишурова – Иваново, 2016. С.165.

③ Бугалин А.В.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2012.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vstupitelnoe-slovo-vozvrashchenie-politicheskoy-ekonomii>

为基础的企业活动能为经济带来最大效率。在他们看来，实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就足以确保经济的成功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并未证明货币主义理论的效力，使得货币主义在理论上陷入贫困状态，无法解决经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满足国家振兴经济的需要。

但是货币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货币主义者集中在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独立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主要代表人物有盖达尔、丘拜斯、纳比乌琳娜、马乌^①、乌留卡耶夫等。20世纪90年代，他们是俄罗斯激进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影响力式微，但他们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仍然受到普京总统的重视和信赖。与这个流派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有一批技术主义者，如古里耶夫（Сергей Гуриев），他们专注于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经济研究，喜欢用英文写作，希望通过在西方国家发表论文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

第四，传统经济思想复活，原创性思想开始产生，但影响力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经济学界开始重视挖掘沙皇俄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传统思想与当代现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解释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道路，并指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布尔加科夫的“经济哲学”的复活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经济哲学”是谢·尼·布尔加科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经济思想流派，是将俄罗斯宗教哲学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一种经济思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学家奥西波夫（Ю.М. Осипов）提出要复兴“经济哲学”，为此，2001年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经济哲学研究室，开始出版“经济哲学”文选（自1999年起），创办俄罗斯经济哲学大会，等等。在传统经济思想复活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探索提出新的原创性经济思想，比如伊诺泽姆采夫（В. Иноземцев）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福诺托夫（А. Фонов）的发展类型理论。上述经济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有限。

第五，传统经济研究机构的实用经济研究继续发展。在今天的俄罗斯，

① 近年来马乌的经济思想开始转向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转向是经济思想研究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因此，对一些经济学家做出定位存在一定困难。

仍然存在不少继承自苏联时期的经济研究机构，很难将其做出流派或学派的界定。如果一定要对其进行界定，可称之为“科学院派实用经济学家”。比如俄罗斯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特点是，大多赞成发展市场经济，但他们更务实地看待和研究俄罗斯现实经济问题，寻求解决俄罗斯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案，针对切实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提出主张和建议。他们对盎格鲁-萨克森的经济学说存有疑虑，比较赞赏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政策。主要代表人物有涅基别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екипелов）、格林贝格（Руслан Гринберг）、伊万德尔（Виктор Ивантер）、马卡罗夫（Валерий Макаров）、别洛乌索夫（Андрей Белоусов）、克列帕奇（Андрей Клепач）等。伊万德尔、马卡罗夫、别洛乌索夫和克列帕奇等经济学家继续在数理经济学领域耕耘。科学院派实用主义者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较为广泛，但他们处在国家决策圈边缘，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和评估。^①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科学院派经济学家更多倾向于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强调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经济思想具有较强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三、不同流派和利益集团的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的源流、演变及特点，突出反映在不同经济流派和利益集团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上。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二是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增长问题；三是改善经济结构、实现长期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俄罗斯经济学界为回答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究和政策探索，对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在经济政策争论的背后，如果不考虑利益分配这样的私欲的话，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思想分歧。2018年总统大选前后俄罗斯经济学界的经济政策大辩论，就是不同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在此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和

^① Леонид Григорьев. Три шко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http://www.intelros.ru/pdf/Rus_Journal/40/10.pdf

利益集团的发展战略作一介绍。

第一是伊兹博尔斯科俱乐部^①提出的“大突进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большого рывка）。2012年伊兹博尔斯科俱乐部成立之初，就提交了一份名为“大突进战略”的报告，提出“在世界经济危机高峰时刻挽救俄罗斯的思想 and 纲领”。这份报告的牵头人是俄罗斯东正教政论作家、伊兹博尔斯科俱乐部副主席阿维里亚诺夫（В.В. Аверьянов），时任俄罗斯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也参与了报告的起草。这份报告提出，对负责的领导者来说，在全球系统性危机条件下，民族生存正在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俄罗斯尚未对应对灾难性变化做好准备。当代俄罗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是多层次的，在社会意义上是裙带公司化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人为自己，只有一个上帝是为所有人的。俄罗斯的发展面临着四种前景：一是国家解体，二是被直接或间接占领，三是可能发生革命，四是制定和落实长期系统性战略，国家实现现代化。为此，他们提出了动员型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经济方面的关键前提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制度化，必须将国有经济部门分为两部分：国家市场部门和非国家市场经济。军工部门、行业骨干公司以及银行、开发机制和主要的能源企业、自然垄断部门应成为国有经济的基础。这份报告提出，建立多种欧亚一体化制度也是动员型经济模式的组成部分。^②

这份报告虽然并未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但从报告的基调看，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振兴国有经济的方案，可以看到明显的苏联式动员型经济的影子。非常明显，执政者并未全盘接受这一战略，但是在今天俄罗斯的经济战略中可以看到相关思想。

第二是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的“2035年战略”（Стратегия-2035）。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ЦСР）是普京首次竞选总统时的大本营，时任负责人格列夫曾主持编写了普京首个总统任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格列夫计划”。

① 伊兹博尔斯科俱乐部成立于2012年9月，是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精英组成的团体。该俱乐部指出，他们的意识形态方针是社会保守主义、将俄罗斯国务活动家（从社会主义者和苏联爱国者到君主主义者和东正教保守主义者）的各种观点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思想纲领。有别于其他团体和自由派团体，反映官方政策，为官方政策提供智力服务。他们反映的思想不是新的，而是成熟的、早已形成的，但由于主观因素和负责内政的政府对专家调控之需，长期无法成为制度化的思想。

② Доклад Изборского клуба: Стратегия большого рывка. <https://izborsk-club.ru/975>

2011年库德林因与梅德韦杰夫发生矛盾被解职后曾在此短期担任领导。2017年6月，该中心制定了“2035战略”。这份战略提出，俄罗斯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技术落后，衡量标准是每万人拥有的多功能机器人数量。俄罗斯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和韩国。其次是俄罗斯经济增长过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三是俄罗斯国防能力不足，其四是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低。为改变这种落后局面，俄罗斯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改变：一是加快进行制度改革，二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质量。在经济政策层面，应该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开支，但该战略同时指出，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有害的，其成效虽可在短期内实现，但长期将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为抑制通货膨胀，保障财政盈余，应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①“2035战略”较之“大突进”战略更为务实，对俄罗斯落后状况的分析集中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认同和响应。

第三是斯托雷平俱乐部的“经济增长战略”（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та）。斯托雷平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12月，是俄罗斯金融资本家和中小企业家与经济学家讨论经济政策的平台。他们信奉“市场现实主义”，基本立场是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应服务于经济增长，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过适度地、有针对性地扩大货币发行量，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②他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无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俄罗斯政府所实行的宏观经济稳定化、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是盲目的，无法解决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上述做法已被包括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所弃用，中国也从未采用这样的政策。2015年10月，斯托雷平俱乐部由季托夫牵头，起草了一份名为“增长的经济”的报告，实际上也是当时季托夫参与总统竞选的经济纲领。这份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处在危机之中，发展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企业亏损严重，企业家信心下降，国有经济部门排挤私人部门，经济对能源的依赖不断增强，能源部门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最高

① Русем Фалыхов, Петр Орехин. Бум и революция Кудрина. Стали известны детали «Стратегии-2035» Алексея Кудрина.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7/05/31/10701803.shtml>

② «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клуб» разработал программу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Ведомости. 21.10.2015.

点，影子经济和离岸经济正在成为俄罗斯的“第二经济”。报告指出，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安全感下降，腐败仍然是严重风险，司法和强力部门对企业发展造成很大压力，企业的行政负担加剧，需要改善营商环境，要充分考虑非能源部门的利益。报告提出俄罗斯经济还存在许多新风险，如石油价格持续下降，西方制裁加剧，国际隔绝严重，强化外汇管理限制了资本流动等。这份报告最后提出了改善俄罗斯经济的政策主张，即要改善五个方面的长期指标：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应超过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的标准改善人力资本；增加高生产率产业的就业；增加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对高新技术领域增加直接投资。为实现上述目标，这份报告还提出了涉及十个方面的系统性政策，其中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①这份报告对俄罗斯经济的看法和观点及政策主张，代表了俄罗斯非能源类企业、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斯托雷平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来自企业界，深知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不过从俄罗斯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看，他们的主张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俄罗斯精英阶层对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有足够的认识，但在某些经济思想教条的影响下^②，一直难以提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

第四是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大学”的新制度主义主张。“高等经济大学”目前是俄罗斯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高等院校之一。这所学校成立于1992年，建立这样一所学校的目的，是希望将其建成政府经济智库，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培养在新条件下服务于政府决策的经济学人、经济分析人员、高校教师等。因此，这所学校与俄罗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关系密切。亚辛和库兹明诺夫是这所学校的创建者。前者为学术领导，后者为校长。亚辛是俄罗斯经济学界的指标式人物。他在1992年曾经是总统下属的企业经营问题委员会成员，1994-1997年担任俄罗斯经济部长，其早期的经济思想信奉货币主义理念，近年来转向新制度主义。这也是俄罗斯早期货币主义

① 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клуб: Доклад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та». https://expert.ru/data/public/499741/499785/dir-polnaya-versiya-19_10_15.pdf

② 比如，继续执行货币主义的稳定化政策，收紧银根，不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投资；在财政上，执行量入为出的政策，不能用财政政策促进投资，等等。一说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马上想到通胀，一说财政政策，就说政府无效，财政资金被贪污，等等。

思想转向新制度主义的标志，是俄罗斯经济学界转向的标志。此外，亚辛既有政府任职的经历，又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其门生故旧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中任职者众多，对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①

亚辛近年来撰写的著作为俄罗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出过一系列建议，其中《后苏联经济政策：从过去到未来》集中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这部著作提出，俄罗斯的发展面临着四种选择：一是惯性发展模式，即，延续 2003-2013 年间政府的经济政策；二是动员型模式，这种模式在 2014 年当局的政策中已有所体现，对外采取强硬外交行动，对内强化控制，以爱国主义口号赢得民众支持，推行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三是快速激进民主化模式；四是渐进民主化模式。亚辛主张，俄罗斯应该走渐进民主化道路，政府经济政策则应着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强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应该独立，对强力部门同样要进行监督和监管；第二，要大力发展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竞争；第三，推动地方自治改革，激发地方活力，为此要厘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第四，要改革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②

上述不同经济流派和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主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分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道路之争，俄罗斯应该以动员型模式还是以自发发展模式推动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政府角色之争，即政府是否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如果需要政府干预，那么如何干预；三是具体政策之争，货币政策应该宽松还是紧缩，财政政策应该量入为出还是转向赤字财政，产业政策应该支持特定产业还是一视同仁。从历史上看，这些问题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世界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些问题，这也是经济思想产生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焦点难题，或许这些问题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

普京第四次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颁布了新的“五月命令”，再次提出

① 比如，据媒体报道，俄罗斯现任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就是在亚辛提携下进入政府部门的。参见 Елена Петрова, Юлия Павлова. Эльвира Набиуллина: от правой руки Грефа до правой руки Путина. <http://www.itogi.ru/profil/2013/11/187924.html>

② Евгений Ясин. Развити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з прошлого в будущее. М., 2017. <https://www.hse.ru/data/2017/04/20/1168793820/Yasin2017.pdf>

要使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俄罗斯政府随之在 2019 年推出了“2024 年前政府工作计划”和包括 13 个方面的“国家项目”（Нацпроект），部分吸收了上述流派的思想。政府计划颁布后，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专门发表文章，对计划进行了解释。梅德韦杰夫认为，过去十年所形成的重要趋势和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进程的发展方向，认识到全球趋势的变化对判断俄罗斯现状和发展道路、制定经济计划至关重要。世界各国面临着经济、技术、社会和生态挑战，还有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之门，有时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俄罗斯政府的议事日程是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企业积极性，消除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多余限制，保障生产率的增长，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人的福利创造稳定的基础。为此，梅德韦杰夫提出政府工作计划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国家，重视人的发展，完善教育、医疗、减贫、退休制度。教育的发展是决定个人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机会、整个社会福利增长和俄罗斯世界地位的重要因素。这是发现个人才能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工具。在社会经济不确定的条件下，教育可以成为基本的稳定性因素，并可保障长期发展的普遍价值的形成，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样性国家尤为重要。有效的社会政策需要新的医疗质量，国家要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计划还提出要减少贫困，做好退休保障，改善住房等目标。

第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建立有竞争力的经济。要推动科技的突破性发展以及技术的现代化，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为此要发展创新活动，发展数字经济。技术的现代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针对具体企业而言，而是要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考虑到俄罗斯经济有相当高的垄断化水平，国有成分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就有落入陷阱的风险，长期来看可能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同时，要发展非能源原材料产业，兴建基础设施。

第三，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增强社会信任。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的重要任务，要降低通货膨胀率，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税收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同时要保持税收政策

的稳定，增加就业，减少影子经济和影子就业。

由此看来，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也反映出了普京经济思想的总体特点。回顾普京上台以来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宣示和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看出普京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虽然普京多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 2012 年和 2018 年的两次“五月命令”中都提出“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希望俄罗斯经济实现“突破式”发展，但总体上普京更加重视人的发展，重视社会建设，历年的国情咨文都突出强调人口、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关系民生的居民总体福利问题。所谓“动员型”“跃进式”发展模式并未成为普京经济政策的选项。

其次，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企业界和各种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经济思想倾向和实际利益，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政策主张，为高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从普京过往的各类讲话及所采取的举措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并未受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其政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侧重于从解决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具体政策，不作大而化之的空洞的经济思想和政策论述。

再次，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存在。普京上台以来尤其是 2003 年以来，一方面，俄罗斯放慢了国有资产私有化速度，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产业中增加了国有经济成分，使国有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 and 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自由主义色彩，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国家并未动用预算资金进行大规模政府投资，同时一直延续“休克疗法”时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化货币政策，即执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总的来看，仍然希望以市场调节方式调动私人企业增加投资规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8 年普京第四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试图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启动“国家项目”，但政策效果欠佳。

四、结 语

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是在苏联剧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市场经济制度重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广泛吸收了沙皇俄国时期的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试图将西方经济思想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以解决当代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发展和现代化目标。但是在近 30 年间形成的经济思想流派对经济发展道路、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以及经济政策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分歧至今仍无法弥合。换言之，当代俄罗斯经济思想虽然存在某种共性，但这种共同性并未使其产生结构性变化，即各个经济思想流派或来源于国外，或来源于历史，即便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原创性思想，也并未发生理论的综合或分解，总体上其理论构造和整合能力及现实指导能力尚不够强大。

当前俄罗斯经济存在的突出困境是增长和发展问题。增长涉及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两个方面，发展涉及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人的全面发展及福利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才能实现增长和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方向难以确定。在制度改革方面，21 世纪以来的趋向是增加国有经济部门的比重，国家加强对垄断部门的控制，发展各种新型投融资制度，促进非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生产，但其客观后果是在原有的二元工业结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新型多重二元结构，因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面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来源的需求。但是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思想自苏联解体以来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一直执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量入为出、量力开支的财政政策，一视同仁、不对特定产业提供特殊支持的产业政策，以市场、产业和资源保护为目标的封闭性地区主义对外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思想主导下，经济制度与政策不相匹配，造成经济政策长期处于无效状态。

【Abstract】 Contemporary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s have developed greatly after breaking away from dogmatism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revolving

around such issues as economic transition, overcoming economic crisis, and starting the growth process, Russian economics community began to absorb Western economic ideas, trying to fin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bases for solving the then urgent economic problems by studying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especially monetarism theories. However, as the actual economic situation had not improved, the Russian economics community doubted whether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could solve Russia's serious economic problems. From 1998 till now, the Russian economics community has begun to focus on seeking wisdom from its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s, and has widely introduced economic thoughts from various Western schools. They attempted to find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adapts to Russia's economic realities by combining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with its own ideological tradition. So far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s have begun to b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and intertwined development: new institutionalism has risen vigorously, political economics has quietly returne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s have revived, and theoretical influences of monetarism have declined. Economic ideas representing various schools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They put forward policy proposals to revitalize Russian economy, which have had impacts to different degrees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deas leaning towards new institutionalism are recognized by mainstream economics circles and government economic authorities. Nevertheless, influences of monetarism still exist, and it has strong policy influence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finance, currency and industries.

【 Key Words 】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s, Monetar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Russian Economic Poli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получи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после ухода от догматизм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От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1991 году д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1997 году, занимаясь проблема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реодо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запуска процесса роста,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ачало поглощать запа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ытаясь решить теку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ая и внедряя запа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теории, особенно монетариз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л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разрешения акту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Однако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ре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е улучшилась,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стало сомневаться в том, сможет 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Запада решить серьёз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 России. С 1998 года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ачало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ться на поиске источника мудр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деях и широко внедря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западных школ. Оно пыталось найти путь адаптации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еалиям страны путём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запад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с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начало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сть: новы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стал энергич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ернулас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мысли возродились, 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монетаризма уменьшилос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 различные школы, сталкиваясь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выдвину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оживле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оказали различ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работку и реализац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де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клоняющиеся к новому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у, признаются основны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кругам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однако влияние монетаризма всё ещё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оно по-прежнему оказывает си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во многих областях, таких как финансы, валют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монетаризм, новы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政党研究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和发展趋势

强 舸 叶尔郎·马季耶夫*

【内容提要】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邻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祖国之光”党自2004年至今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的执政党。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辞任总统，但依然保留着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将继续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在哈萨克斯坦实地考察的一手材料，本文从中央组织、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政党经费等四个方面，阐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探讨其发展趋势。现有的文献在观察原苏各国政党转型和政治发展时，大多将议会式政党预设比较样板和发展终点。然而，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近年来重新采用了诸多列宁主义政党的做法，其政治发展受议会政治和列宁主义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政治 哈萨克斯坦政党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 列宁主义政党

【中图分类号】D73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028(23)

* 强舸，中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叶尔郎·马季耶夫（Yerlan Madiyev），国籍哈萨克斯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曾任“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引言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的陆上邻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地和重要战略支点。2004年以来，“祖国之光”党（其前身为“祖国党”）一直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近年来，随着哈国政治发展和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Нұрсұ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年龄增长，“祖国之光”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2019年3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是依然保留“祖国之光”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将在哈国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探讨哈萨克斯坦政坛变化和政治发展，就必须深入了解“祖国之光”党。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席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与“祖国之光”党的党际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双方频繁互访，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

从现实看，深入研究“祖国之光”党，对把握哈萨克斯坦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政局变化，以及推进中哈执政党党际交流、中国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都非常重要。然而，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专门探讨“祖国之光”党的研究，只有一些关于哈萨克斯坦或中亚五国政治转型的文献对此有所涉猎，大致涉及如下内容：“祖国之光”党的缘起和发展历程；它在近几年大选中的表现；粗略探讨“祖国之光”党在哈国政治转型中的可能作用。^①总的来说，上述研究还远不足以系统、全面地呈现“祖国之光”党，以及与之相关的哈萨克斯坦政治格局。具体来说，“祖国之光”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是上述文献较关注的热点，但选举结果对哈萨克斯坦这个稳固的一党长期执政国家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可能更有价值的是，相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邻国，“谁是接班人”并不是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一些研究也意识到，“祖国之光”党而非某个个人或小集团，更可能

^① 参见雷琳、王林兵：“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孙壮志：“当前中亚五国政治形势及未来走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韩隽：“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雷琳、陈彤：《国际视野下的中亚研究》，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年；方志涛：“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成为今后哈国政坛和政治转型的主导性力量^①，可惜并未就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跳出关于哈国政局的宏大叙事框架，聚焦分析“祖国之光”党这个核心角色，以便更好地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发展。

从理论上来说，原苏联地区政党政治是学界的热门议题。“政权党”是原苏多国当下政治的普遍现象，统一俄罗斯党、“祖国之光”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皆是其中的代表。^②政权党具有如下关键特征：以拥护和推进总统政治主张为核心纲领；存续和发展高度依赖于总统威望和国家政权提供的资源；是政权掌控议会的工具，而非相反。^③目前，政权党研究主要集中于统一俄罗斯党，上述有关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文献也略有涉及。这些文献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对政权党的意识形态、“政党-领袖”关系、“政党-政权”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博弈研究较多，但是对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关注较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有研究暗含这一观点，即组织体系对政权党并不重要，因为总统及其掌控的政权可以轻易提供这一切。第二，普遍将西方议会式政党视为政权党发展的终点，进而反过来以议会式政党特征为标准，来分析评判政权党现状，预测其发展趋势。然而，从我们对“祖国之光”党发展趋势的考察来看，它虽然具有一些议会式政党要素，但是近年来也在找回许多具有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做法，其政治发展呈现两者交织的双重面向。

相比国内尚没有聚焦“祖国之光”党的研究，国外已经有一些直接以“祖国之光”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大致关注了两类问题：其一，“祖国之光”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作用。德尔索迪指出，“祖国之光”党在选举中的胜

① 高永久、许亚清：“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体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吴宏伟：“中亚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李宁：“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作为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不被认作是执政党。核心依据是，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不加入任何政党，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多数党没有政府组阁权。2007年宪法改革前，哈萨克斯坦的做法类似于俄罗斯，“祖国之光”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宪法改革后则有着本质不同，详见第一部分的阐述。

③ 王秋文：“浅析俄罗斯的‘政权党’现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王树春：“俄罗斯政党政治中的‘政权党’现象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那传林：“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权党’现象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利，让政权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合法性认可。同时，民众在选举中也能通过“祖国之光”党实现一些利益表达。^①巴德强调，不断壮大的“祖国之光”党在议会中边缘化了反对派，巩固了政权和总统权威。^②其二，政党与领袖的关系。^③相关文献持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将“祖国之光”党视作纳扎尔巴耶夫的附庸，是个人化的政党，强调其生存主要依赖于政权。二是这些文献都对“祖国之光”党的发展前景作了预判，它们均认为，“祖国之光”党在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将难以继续存在，相应地，哈萨克斯坦政权也很难保持长期稳定。

总的来说，国外相关研究存在三个不足：研究视野基本局限于选举和议会，忽视了“祖国之光”党在选举之外的组织与活动；普遍将“祖国之光”党视为领袖和政权的工具，没有注意到“祖国之光”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常常将其与统一俄罗斯党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不少文献的主旨其实是研究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祖国之光”党只是对比案例。因而，在案例处理上，与统一俄罗斯党类似之处就予以研究，不同之处就简化舍去，并未全面展现真实的“祖国之光”党。

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是从政党建设的视角（而非议会政治视角）^④，系统呈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以及近年来的运作情况和发展态势，以填补国内对其知之甚少的空白，并初步探讨政权党的演化问题。研究主要采

① Adele Del Sordi, “Legitimation and the Party of Power in Kazakhstan”, in M. Brusis, J. Ahrens, M. Schulze Wessel(Eds.), *Politics and legitimacy in post-Soviet Eur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72-96.

② Max Bader, “Hegemonic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Towards party-based authoritarian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1, Vol.44, No.3, pp.189-197.

③ Rico Isaacs, Sarah Whitmore, “The limited agency and life-cycles of personalized dominant partie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the cases of United Russia and Nur Otan”, *Democratization*, 2014, Vol.21, No.4, pp.699-721; Davor Boban, “The presidential-hegemonic party and autocratic stability: the legal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Kazakhstan”, *Zbornik PFZ*, 2017, Vol.67, No.1, pp.55-83; Anthony Clive Bowyer,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Working Pape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8.

④ 从议会政治视角研究政党问题，焦点是政党如何竞选以及议会与政府关系等议题；政党建设视角则更关注政党的组织体系、日常运作、干部队伍、党员队伍等。关于政党建设视角和议会政治视角的差别，可以参见祝灵君、郭玥：“美国政党政治中的党建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用一手资料。2015年以来，“祖国之光”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及第一副主席等政要，多次访问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9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席达成的共识，中共中央党校与“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规划，2015年10至11月，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通过正式会见、座谈交流、私下访问等方式，本文第一作者及所在团队，系统访谈了“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以及努尔苏丹、阿拉木图两个直辖市市委数十位要员（包括中央副主席、中央机构负责人、市委及内设机构负责人等）和一些普通党员。之后，我们在国内又与到访的哈方代表团多次交流。此外，哈方还提供了一些文献材料。本文第二作者是哈萨克斯坦长期研究政党政治的专业学者，在“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任“祖国之光”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本研究视角采用的是第一作者的外部视角，大框架由第一作者搭建；第二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核对了细节要点，修正细化了整体框架。

一、“祖国之光”党的发展历程

“祖国之光”党全称“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哈萨克语：«Нұр Отан» партиясы；俄语：партия «Нур Отан»），其前身是祖国党。祖国党是在1999年2月12日，由哈萨克斯坦人民团结联盟、哈萨克斯坦解放运动和“为了哈萨克斯坦-2013”运动等党派联合组建而成的，核心纲领是全力支持纳扎尔巴耶夫领导国家。2004年，祖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赢得了60.6%的选票和议会下院77个席位中的42个。2006年9月，祖国党与纳扎尔巴耶夫长女纳扎尔巴耶娃领导的“阿萨尔”党合并。2006年12月，公民党和农民党并入。在2006年12月22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更名为“祖国之光”党。“祖国之光”党的诞生，是基于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一理念：所有支持总统的政党都应该联合起来，“以使未来50年内没有其他政党能够挑战……哈萨克斯坦应该有更少但强大的政党，以捍卫人民的利益”。显然，“祖国之光”党的目标，是建立稳定的一党长期执政体制，而非议会多党政治。

随后，2007年5月18日，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哈萨克斯

坦开始由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转变。这次宪法改革扩大了“祖国之光”党的权力和作用，为其奠定了名副其实的执政党地位。具体来说，其一，废除“总统不得加入政党”的限制。2007年7月4日，“祖国之光”党召开第11次非常大会，选举纳扎尔巴耶夫为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宣布，“根据宪法，我有权成为我们党的主席。这是国际惯例，也将在哈萨克斯坦实行。”此后，纳扎尔巴耶夫均以“祖国之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历次大选。其二，原属总统的总理提名权和组阁审批权，转移至议会多数党，也就是“祖国之光”党。这一变化在2019年前并无实际影响，因为实际行使权力的依然是纳扎尔巴耶夫，只是赋予他权力的职务从总统变成了多数党主席。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卸任总统后，宪法的这一条款就具有了重大现实意义。接下来的大选后，将依然由作为党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夫提名总理、审批内阁名单，新任总统则对政府组成没有法定权力。当然，在哈国政治架构中，存在大量直属总统的机构，总理及内阁属下的政府规模相对其他国家要小。所以，新总统并不会因这一条款成为光杆司令。显然，12年前的宪法修改，为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继续保持影响力乃至掌控政局作了准备。其三，提升议会制衡政府（总理）的权力。此前，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需要两院2/3多数议席，新宪法规定只需过半的简单多数。

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支持率稳步上升，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80.99%的选票和议会下院98个选举产生的席位中的83个；在2016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82.2%的选票和84个席位。

二、“祖国之光”党的中央组织

（一）领导层

“祖国之光”党设有中央政治局（目前有11名委员），作为党的领导层，包括主席1名、第一副主席1名、政党秘书1名、副主席若干名。^①主席由

^① “祖国之光”党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该党的多语对照材料（哈萨克文、俄文、中文、英文等），本文使用的“祖国之光”党的机构和职务名称，如无特别说明，均是“祖国之光”党提供的官方中文译名。

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第一副主席在政党秘书协助下负责日常党务。多数副主席是兼职，并不具体负责党务工作；有的副主席是专职，分管相应的党务工作。所有副主席的党内排名，均在政党秘书之后。目前，第一副主席由玛吾廉·阿希姆巴耶夫（Maulen Ashimbayev）担任。在哈国政治架构中，“祖国之光”党第一副主席大约是排在总统、总理、第一副总理后，是与上下院议长、副总理等岗位权重类似的第 5、6 号政治职务（以上职务也都是由“祖国之光”党党员担任），任职数年后一般会转任副总理。例如，曾任第一副主席的梅尔扎赫梅托夫于 2017 年转任副总理兼农业部部长。相应地，地方党委主席由地方政府首长担任，第一副主席在政党秘书的协助之下负责日常工作。

（二）中央机构

“祖国之光”党的中央党部位于首都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为表彰其功勋，哈萨克斯坦议会将阿斯塔纳改名为努尔苏丹），与总统府相距不足 800 米，共有 20 多个内设机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 传统部门。哈萨克斯坦有 7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执政经历，纳扎尔巴耶夫是原苏联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祖国之光”党参照哈共设置了多数机构，包括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群众工作部、反腐败委员会、政治管理学院（党校）和党际交流理事会^①等。

2. 与时俱进的新部门。“祖国之光”党重视新生事物对政治的影响，为应对互联网等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中央党部专门设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互联网办公室、公共政策研究所等部门。此外，近年来“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联系群众。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指示，“祖国之光”党要充分接触各阶层党员和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日常需求，加强大众对党的信心^②；并特别设立了公共接待室^③，其任务是通过多种渠道接待群众访问，收集社情民意，协调相关机构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群众诉求。

3. 附属机构。一是媒体，“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媒体宣传，打造了自

① 与外国政党开展党际交流，类似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② “Nazarbaev instructs to develop new doctrine of party ‘Nur Otan’”, February 18, 2013, <http://www.akipress.com/news:521083/>

③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риемная партии Нур Отан

己的媒体集团“光明传媒”(Nur Media)，核心任务是宣传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下辖阿斯塔纳电视台(Astana TV)、Orda广播电台(Orda FM)、读者报(liter)、艾肯报(aikyn)以及相应网站，覆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所有传播渠道。二是党产管理部门，第五部分会专门讨论。

(三) 与政府的链接机制

作为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与政府和议会最主要的链接机制，是提名党员竞选议员、提名总理组建内阁、组成议会党团等举措，在此毋庸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祖国之光”党近年来建立的一个新机制，即中央党部向中央政府各部委派驻党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党法》禁止政党在政府部门建立党组织，但“祖国之光”党派驻党代表(即派遣个人)的做法被视为符合《政党法》。驻部党代表拥有以下职权：(1) 参加所驻部委的部长会议，可以发言、讨论、提出意见，但没有表决权；(2) 向所驻部委传达党的决策和精神，确保领袖^①大政方针有效实施；(3) 将党收集来的相关社情民意及时反映给所驻部委；(4) 虽然党代表没有表决权，但是如果其认为某些决策违背了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可以向中央党部报告。经中央党部认定后，情节轻微的，中央党部会对相关部长、副部长(他们都是“祖国之光”党党员)采取类似“诫勉谈话”等措施，要求改正错误；情节严重的，通过总理或议会党团否决相关决策乃至罢免相关人员。

在议会政治下，政党一般有两种影响政府部门的间接途径：第一，执政党通过由本党党员担任的总理(政府首长)指导政府部门运作；第二，议会党团通过预算、提案、质询等手段，在议会中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但是，政党一般不能越过议会来和总理直接联系、不能指导乃至干预政府部门的运作。与之不同，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执政党会向政府部门派出党组，作为党领导政府部门的直接途径。当然，“祖国之光”党派驻政府部门的党代表，只有建议权和干预权，并没有党组作为“领导核心”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① 在“祖国之光”党的话语体系中，“领袖”专指纳扎尔巴耶夫。

三、“祖国之光”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

(一) 组织结构

“祖国之光”党的纵向架构，分为“中央党部-州（直辖市）党委-县（市、区）党委-党支部”四个层级。其中，州级和县级党委是地方组织，按行政区划设置。目前“祖国之光”党已实现地方组织全覆盖，在全国 14 个州和努尔苏丹、阿拉木图（前首都）、奇姆肯特等 3 个直辖市设立 17 个州级党委；在全国所有县（市、区）设立 217 个县级党委。县以下设党支部，为基层组织，其设置方式并不以行政区划为准（详见后文），哈全国现有超过 1 万个党支部。州、县两级党委一般设有以下机构：党委常委会（领导和决策机构）、组织部、宣传部、反腐败委员会、社会部、公共接待室等，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此外，州级党委大多有自己的报纸或网站。党支部一般没有内设机构，有数名兼职党务工作者。从中央到基层，“祖国之光”党现有党务工作者 4.5 万人，其中专职党务工作者 1202 名。

“祖国之光”党党章规定，党支部党员数须在 3 人以上，没有明确上限，但党员过多的支部也要适当拆分。支部负责人和支委会，由支部全体党员选举产生。每个支部都必须根据党的大政方针和上级党组织规划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我们实地考察了“祖国之光”党努尔苏丹市委、阿拉木图市委的组织建设情况，它们是“祖国之光”党最大的两个地方党委，组织体系最为完善。阿拉木图市委共有党员 6.5 万余名，650 多个支部；努尔苏丹市委共有党员 3.7 万余名，350 多个支部。本部分主要以它们为例，阐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建设。

首先看阿拉木图，它可以代表“祖国之光”党在除努尔苏丹外全国各地的普遍做法。阿拉木图市下辖 6 个行政区，“祖国之光”党在各区都设有党委。区党委直接管理党支部，两者间不再设其他层级。例如，阿尔马林区委下辖 145 个党支部。支部主要根据行业领域设置，阿尔马林区划分了教育、医疗、中小企业、工业、金融、非政府组织、体育文化组织等不同行业类别，基本做到了行业领域的支部全覆盖。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设置“以

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①，即“条块结合”。“祖国之光”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没有“块”（在县以下，没有按“区域”组建的党支部），只有“条”，并且是同行业多个单位联合组建党支部的“大条线”。不过，“祖国之光”党和中共的基层组织体系之间的差异，还是要远小于它与议会式政党的差异。在县级以下，西方政党一般只有外围组织，没有基层组织体系。另外，“祖国之光”党目前不在外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符合条件的本国私营企业需要建立党组织）。

“祖国之光”党在努尔苏丹的基层组织体系，与其他 16 个州市有较大不同。努尔苏丹市委设有 7 个区级党委，除 3 个行政区党委外，值得关注的是 2 个特殊的区级党委，这是其他州市所没有的。其一，欧亚大学党委，在欧亚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等地处努尔苏丹的所有高校中，设有 54 个党支部，管理近 6000 名党员，以大学教师为主。单独设立欧亚大学党委，既是由于首都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更是因为欧亚大学一直是“祖国之光”党的政治基地并在哈国政坛有很大影响力。其二，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哈文名是 Бірлік，本文采用了意译），其下不设明确的党支部，有 6000 多名党员，包括“祖国之光”党籍的议员、议会工作人员和中央公务员。需要强调的是，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不等于“祖国之光”党在议会中的议会党团^②，两者并无关联。议会党团承担执政职能，受命于纳扎尔巴耶夫和中央党部。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则有些类似中共（和过去哈共）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也有区别，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隶属于中共中央，“祖国之光”党的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隶属于努尔苏丹市委）。

设置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并将其置于努尔苏丹市委管辖的主要用意有两个：第一，哈萨克斯坦《政党法》禁止在每个政府部门建立对应的党组织（例如，不允许在农业部建立“祖国之光”党农业部党委），因而将所有政府部门中的党员统合在一起建立总的党委，可以规避《政党法》限制（其下有意不设明确的党支部，也是为了避免违反《政党法》），确保党对这些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第二，也是希望这些党员在议会和中央政府中履行党的执

①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四条。

② parliamentary groups

政职能外，还要直接联系努尔苏丹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服务。这样做
的优势在于，努尔苏丹是新首都，原本人口不多，新增人口主要来自政府及
相关机构，单设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能比行政区党委更好地管理这些党员，
发挥他们的作用。

（二）青年团

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新增党员主要来
自青年。因此，“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青年工作，2000年1月就成立了青
年团，中央、州、县均有设置。但目前作用发挥比较突出的还是努尔苏丹、
阿拉木图和一些大城市的青年团。原因在于，“祖国之光”党青年团最初诞
生于欧亚大学，现在主要还是依托高校开展活动，成员以大学生和毕业生为
主，在没有大学的地区尚缺乏比较有效的工作抓手。加入青年团的年龄要求
是不大于29周岁，但29周岁后并不自动退团。“祖国之光”党对青年团的
定位是：第一，做青年思想工作，团结青年，引导青年成长；第二，建设党
的后备力量，青年团员是“祖国之光”党党员的重要来源。目前，青年团主
要开展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例如，照顾老人、关爱儿童、宣传领袖思想和
党的大政方针等。

（三）外围组织

除了构建自身组织体系外，“祖国之光”党在发展过程中还整体吸收了
许多社会组织，作为地方党委的外围组织，例如中小企业协会、妇女权益保
护组织、残疾人促进会、儿童关爱基金会等。加入“祖国之光”党后，这些
机构依然独立运作，但必须在活动中宣传贯彻领袖思想和党的大政方针。组
织负责人会同时加入“祖国之光”党，但其他成员和工作人员并不会直接成
为“祖国之光”党党员。

（四）党员发展

党员由党支部发展。哈萨克斯坦成年公民想要加入“祖国之光”党，首
先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全心全意支持领袖的政治主张；全心全意拥护党的
章程，遵守党的纪律。在此基础上，履行如下程序：（1）向某个党支部提交
入党申请书，并有两名党员作为介绍人；（2）党支部考察申请人各方面的情
况；（3）考察通过后，申请人参加考试（笔试）；（4）考试通过后，党支部

对申请人进行综合鉴定；(5)通过鉴定的申请人，由支部党员大会投票表决。不过，上述流程耗时较短，一般只需要1到3个月即可完成从递交申请书到成为正式党员的全过程。此外，“祖国之光”党高层和地方党委负责人反复强调，虽然青年团被视作“祖国之光”党党员的重要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团团员一定能，或者一定要加入“祖国之光”党。

同时，“祖国之光”党的出口很大。当党员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时，就会被开除党籍：(1)有较严重违反党纪或国法的行为；(2)与党失去联络，不及时缴纳党费等；(3)思想退步，不能全心全意支持领袖主张。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是，仅在2014和2015两年，努尔苏丹市委就开除了5000多名党员的党籍，占该市全部3.7万名党员的13%；如果排除议会和中央政府党委的6000多名党员（这些党员较少出现上述情况），比例更是高达16%。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规模开除党籍的情况，有正反两方面原因：正面，这说明“祖国之光”党对党员的管理非常严格。反面，这也反映出“祖国之光”党近年来扩张过快，较简单的入党程序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补充的是，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如果思想上再次达标，可以重新申请入党（因违反国家法律或严重违反党纪被开除党籍的除外），不会因此背上政治包袱。

比较来看，“祖国之光”党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过去哈共的党员发展方式，也有两处不同：入口，入党程序比较快捷、耗时少，没有预备党员阶段；出口，党纪严格，开除党籍概率非常高。与西方议会式政党相比则存在根本不同：第一，除投票外，议会式政党对普通党员少有要求；第二，在议会式政党中，普通党员可以随时脱党，也没有针对普通党员的党纪处分（议会式政党也有党纪处分，但只针对党内高层、党籍议员和通过政党获得公职的党员）。

四、“祖国之光”党的干部队伍

（一）干部来源

“祖国之光”党的干部队伍大致有三个来源：前哈共党员、新一代精英，以及来自社会的贤达人士。

1. 前哈共党员。“祖国之光”党高层表示，虽然没有统计过具体比例，但前哈共党员肯定是其干部队伍，特别是中高层干部的最大来源。根据座谈会上直接调查^①、私下访问掌握的情况，我们判断，目前“祖国之光”党年龄超过 50 岁的中高层干部中，约有六成是前哈共党员或原苏时期干部。他们的成长路径是：苏联解体后，一直追随纳扎尔巴耶夫，多年来在政府、国企或高校科研机构任职；在“祖国之光”党成立之初即成为党员，并因为党的需要，逐步转入党内工作。

2. 新一代精英。前哈共党员既熟悉哈共的组织运作模式，又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积累了二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从与之接触后的感受来说，他们思维比较活跃，对新生事物并不抵触。现在，他们依然是“祖国之光”党的支柱，承担着主要工作。但是他们已不再年轻，大多将在十年内退休，显然不能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已有大批 80 后精英走上党的重要岗位。中央党部办公厅主任、大数据中心主任等“中管干部”都是 80 后。该群体具有下述特点：第一，大多有海外特别是欧美留学的经历。留学时一般享有哈萨克斯坦总统奖学金或“祖国之光”党奖学金资助，这要求他们回国后必须从事至少 5 年的公共服务（例如在“祖国之光”党工作）。第二，学历高，普遍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语言能力强，除哈国官方语言俄语和哈语外，他们的英语水平大多良好。此外，往往还能在法语、德语、土耳其语、汉语、日语、韩语中精通一两门。第三，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多数家庭背景较好。80 后精英在地方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也占据了较大比重，不过群体特征与中央党部同僚有一些区别：有留学背景的少，即使有，也大多是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国家。

3. 社会贤达。前哈共党员和新一代精英，构成了“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的主体。此外，“祖国之光”党还有一些可以称为“社会贤达”的干部，其主要特征是：首先，如第三部分所述，“祖国之光”党在发展过程中整体吸纳了许多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负责人同时成为党员，其中一些被选派担任党内职务。例如，努尔苏丹市委下属的妇女发展促进会，其主席是一名企业

^① 例如，在与努尔苏丹市委的座谈会上，我们询问前哈共党员比例，主持座谈的市委第一副主席直接让在座的前哈共党员举手，包括他在内有 7 人举手（总共 11 人）。

家。由于女性身份，她关注妇女权益，发起成立努尔苏丹妇女发展促进会，后来促进会受邀加入“祖国之光”党，她本人也被选为市委委员，并由“祖国之光”党提名当选市议员。其次，前两类干部可以说是“党（‘祖国之光’党以及曾经的哈共）培养起来的干部”，但社会贤达类干部的政治成长和经济利益并不必然依赖“祖国之光”党。第三，他们主要在地方和基层组织任职，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很少；并且一般是兼职（前两类大多是专职），他们大多有自己的企业或体面的工作，党内上升机会和途径也较少。

（二）培养机制

“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年龄分化明显，分为 50 岁以上和 30 岁左右两个群体，30-50 岁年龄段干部很少。表面上看，它似乎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问题。但这一判断并不准确。“祖国之光”党是执政党，考察其干部结构，还需要把各级官员和议员考虑在内。事实上，哈萨克斯坦中央政府部长、各级地方政府首长和议会议长，几乎都是“祖国之光”党党员，多数议员和中层官员也是“祖国之光”党党员，其年龄大多在 30-50 岁间。将他们纳入后，“祖国之光”党干部队伍在年龄结构上就完整了。“祖国之光”党的培养机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30 岁，成为“祖国之光”党党务干部，在党内历练，提升能力。第二阶段，30-50 岁，受党选派，经法定程序进入政府任职或竞选议员，此时亦可兼任党内职务，但一般不负责具体党务工作。第三阶段，一部分人在 50 岁后转回党内工作。

从我们的调查看，对前哈共党员的“祖国之光”党党务干部来说，他们此前普遍在政府或相关单位任职，近年来陆续转任专职党务干部。当然，他们没有经历过第一阶段。对 80 后精英来说，他们大多计划下一步进入政府或竞选议员。目前，除选任制官员、总统和地方首长有权直接任命的官员外，哈萨克斯坦公务员“逢进必考”，因此党政转岗也必须通过考试关。不过，“祖国之光”党高层表示，他们正在研究构建针对中层党务干部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机制。另外，党务干部薪酬略高于同级别政府公务员，旨在增强党务岗位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祖国之光”党干部培养的思路是：年轻精英先在党内历练，一方面，坚定对领袖思想和党的主张的理解和信仰，增强组织纪律性；另一

方面，在适当压力下，锻炼工作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祖国之光”党在哈国体制下毕竟较少直接承担社会治理任务，而政府工作直面很多棘手问题，难度和压力较大）。

（三）政治管理学院（党校）系统

无论从政党整体发展，还是从干部自身成长来看，干部教育对全世界政党都十分重要。党校是列宁主义政党干部教育的关键环节，“祖国之光”党近年来建立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复归了这一传统。

1. 组织结构。“祖国之光”党现已构建覆盖全国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中央系统，包括“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和西哈、东哈、南哈 3 个分校。分校隶属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由于哈国幅员辽阔（270 万平方公里），所以在离首都较远的三个方向设置分校。在地方系统方面，“祖国之光”党已在 17 个州（直辖市）和绝大多数县建立了地方政治管理学院，隶属同级地方党委。不过地方政治管理学院组建时日尚短，实际运作不多。哈萨克斯坦另有国家行政学院，由总统直辖（不属于总理领导的政府，负责人无须议会任命），但还没有也不计划建立地方行政学院。

2. 培训类别。“祖国之光”党政治管理学院主要开展两类培训：其一，党务干部培训。按高层、中层、基层三类分级培训。高层包括中央党部部门负责人、州级党委负责人，他们在中央政治管理学院和三个分校受训。中层包括州级党委部门负责人、县级党委负责人，他们在州级政治管理学院受训。基层包括县级党委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党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县级政治管理学院受训。2015 年全国共培训 2000 人次。其二，根据政府工作需要，由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对公务员（是否党员没有要求）进行培训，2015 年全国共培训 4 万人次。此外，也承接一些企业培训，可以视作带有创收性质的计划外培训。

3. 师资力量。“祖国之光”党各级政治管理学院只有行政人员，没有专职教师，授课教师均需外请，分为三类：其一，长期兼职的教师，主要是大学教授，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议员和党务干部。其二，根据项目需要聘请特定业务上有专长的教师，包括大学教授、各领域专家、企业家等。其三，“祖国之光”党注重学习外国政党经验，经常聘请外籍教师；从俄罗斯聘请

具有统一俄罗斯党背景的教师最多。本文第一作者也曾随中央党校代表团在“祖国之光”党中央党部授课两天，讲授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经验；这次培训是“祖国之光”党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的计划内培训，受训者主要是中央党部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努尔苏丹市委领导层部分成员。地方政治管理学院虽然在组织上隶属地方党委，但培训计划主要由中央政治管理学院统一规划，多数师资由中央统一选派。地方政治管理学院主要负责日常运营和培训监督，一般只有两名专职人员（校长、助理）。这也比较符合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专业人才密度低、干部教育工作刚刚起步、地方力量不足等特点。

五、“祖国之光”党的政党经费

政党经费是政党运作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从趋势上看，这几年“祖国之光”党经费规模和构成变化不大。我们以 2018 年为例分析其收支情况。

收入方面，2018 年总收入是 99 亿坚戈（约 1.8 亿人民币）^①，主要来源有三：最大头是政党补助费，2018 年共计 52 亿坚戈，占总收入的 53%。根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 2009 年 9 月 3 日颁布的第 166/314 号法案，政府向所有在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政党按年拨付补助费，计算公式是“政党所得票数*当年法定最低工资*3%”。

二是党费，2018 年共计 23 亿坚戈，占总收入的 24%。缴费标准如下：其一，有正式工作的党员按当年法定最低工资的 1% 缴纳党费，2018 年的标准是 282.84 坚戈/月（约 5 元人民币）；其二，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党员按当年法定最低工资的 0.1% 缴纳党费，即 28.3 坚戈/月；其三，退休、残疾、失业和生育假的党员免缴党费。

三是党产收益。党产有两个来源：其一，“祖国之光”党由数个政党合并而成，这些政党此前已有一定资产，合并后全部归“祖国之光”党所有。其二，如果某年度政党经费有结余，会用于购置党产。《哈萨克斯坦宪法》禁止政党经营企业。因此，“祖国之光”党党产以现金和不动产为主，主要是通过理财和物业出租等方式盈利。党属媒体是一个例外，它可以通过广告

^① 2018-2019 年，人民币对坚戈汇率大约在 1: 55 上下浮动。

等方式盈利，但并不被视为企业。在管理上，中央党部和地方党委各自管理名下党产，一般会由一名副主席分管党产工作。在这名副主席之下，设有专门岗位负责党产具体运营，聘请财务专家担任，并不要求是党员。2018年，“祖国之光”党的理财收益是 11 亿坚戈，物业租金和媒体利润总计为 7.5 亿坚戈。此外，2018 年还有 4 亿坚戈的捐款和 42.7 万坚戈的其他收入。

表 1 “祖国之光”党 2018 年政党经费情况（单位：万坚戈）

总收入：990319.7		总支出：897243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政党补助费	524704.2	工资与福利	429375.2
党费	234689.8	差旅	13473.9
理财收益	114596.2	房屋和车辆租赁	437.7
物业租金和媒体利润	75764.2	通讯服务	9235.7
捐款	40522.6	咨询	1098.5
其他	42.7	重要会议	50159.6
/	/	宣传	56006
/	/	党员证和党徽等制作	6968.9
/	/	其他办公	19075
/	/	资产维护	129910.8
/	/	资产购置	18963.8
/	/	青年团	46130.4
/	/	党校和研究所	56544.4
/	/	税和其他强制性支出	59863.1

支出方面，2018 年总支出是 90 亿坚戈，财政报告列出了 14 个项目，可以归为五类。一是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工资和福利，共计 43 亿坚戈，占总支出的 48%。二是办公经费，共计 16 亿坚戈，占总支出的 17%，包括差旅、房屋和车辆租赁、通讯服务、咨询、重要会议（中央和地方党部的政治局会议、全会等）、宣传、党员证和党徽等制作、其他等 8 项。三是党产运营，共计 15 亿坚戈，占总支出的 16%，包括资产维护和资产购置两项。四是附属机构运转，包括青年团和“祖国之光”党政治管理学院（党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两项。其中，拨给青年团的经费主要用于资助一些论坛类项目，后两者主要是干部培训和政策研究费用。五是为党产等缴纳的税费。

需要补充的是，表面上看，“祖国之光”党收支规模比较小，但“祖国之光”党很多活动都是和政府一起开展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例如党校的干部培训），所以实际支出规模会大不少。

六、结 语

基于实地考察所得的一手材料，本文从中央组织、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政党经费等四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祖国之光”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初步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重要邻国哈萨克斯坦的了解，特别是把握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变化。在前文基础上，本节分两部分在整体上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政党建设目标及实效

政党建设的根本目标不在自身，而是要通过自身建设推进执政目标。总的来说，“祖国之光”党取得了不错成效，可以从两方面看。

在与政权关系方面，“祖国之光”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立至 2007 年宪法改革。“祖国之光”党主要是作为议会式政党发挥作用，其政党建设目标是，通过整合诸多小党和社会组织，逐步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为总统在选举和执政中提供充分支持，减少议会党争，提升行政效率。但是，这一时期党的规模还比较小，组织体系还很不完善，在议会和选举之外较少发挥作用。

第二阶段，2007 年宪法改革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辞职前。在巩固议会优势的基础上，“祖国之光”党进一步增强了对政权的直接影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不断显现，具体包括三方面举措：其一，建立中央党部向政府部委派驻党代表制度，党具有了无须通过议会或总理对政府各部委和相关政策的直接影响力。其二，干部队伍建设。“祖国之光”党在成立之初是选举导向型政党，初创期党员不少是“加盟式”、在选举中有较大号召力的社会精英，自身缺少干部队伍。成立以后，“祖国之光”党一直着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了“党-政”干部输送机制，确保各级政府多数重要岗位都在党的直接掌控中。一方面，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培养并支持他们考取公职；另一方面，

从政府官员中选拔党务干部。在高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副总理、州长和部长在获任前会经历中央党部专职干部历练，第一副主席和政党秘书是最突出的两个岗位。在基层，不少有志从政的大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做一段时间党务工作者或志愿者。同时，一些优秀公务员被选拔进入地方党部担任专职干部。其三，党校系统。许多政党都有干部培训机构，但一般只设在中央层面。党校系统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特点。近年来，“祖国之光”党构建起与行政区划同构的政治管理学院系统，其最大培训群体并非党务干部，而是政府官员。培训目标既重视职业能力，同时也非常强调增强他们对领袖精神的理解和对党的认同，即党性教育。

第三阶段，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去职后。毫无疑问，哈萨克斯坦政局和“祖国之光”党均已进入新阶段。就政党建设而言，除继续推进第二阶段的举措外，“祖国之光”党需要解决两个新问题：第一，是总统直属机构与“祖国之光”党之间的关系。派驻党代表制度只限于政府各部委（总理辖下、议会任命），而哈国还有大量直属总统（无须议会任命）的机构，“祖国之光”党对这些机构尚缺少影响途径。因此，除继续担任党主席外，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还担任了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相关法律修改赋予安委会主席对总统直属机构负责人任命的审批权。所以，需要关注的是，“祖国之光”党与总统直属机构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建立类似的派驻党代表制度？第二个问题是今后党的领导体制。目前，托卡耶夫总统是中央政治局11名委员之一。随着时间流逝，将来总统（无论托卡耶夫还是其他人）应当会成为党主席。现在“祖国之光”党实行的是主席（纳扎尔巴耶夫）负责制，今后会不会改成政治局集体负责制？

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祖国之光”党一直在三方面着力推进政党建设。

其一，组织基层社会。“祖国之光”党已经做到基层组织在行政区划和社会领域全覆盖。其深层目标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和宗教众多、部族传统影响较大^①，并且还有不少地方豪强和利益集团，这些关系处理不好，极易造成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稳定。因此，“祖国之光”党希望用党的组织体系将

① 哈萨克族内部又分为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三个大部族和众多小部落。

基层社会组织起来，减少民族、宗教、部族和地方势力的影响，降低发生冲突的概率。

其二，联系服务群众。“祖国之光”党希望成为民众和政权沟通的最主要中介与桥梁。一方面，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向政府反馈，指导政策制定，回应社会诉求，增强民众对领袖、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戴。另一方面，系统地向民众宣传领袖的精神和主张、国家大政方针，“把领袖的精神变成民众的自觉行动”。

其三，扩大党员规模。“祖国之光”党希望以此奠定长期执政的基础，不仅为了选举，更重要的是从年轻人中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夯实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基础和影响力。2015年，“祖国之光”党提出了在2020年左右党员过百万的目标，随后党员规模快速增长。2016年共有86万名党员（此前长期在80万左右），2018年底有102万名党员，占比超过总人口（1700万）的6%。目前每8名成年公民中就有1名“祖国之光”党党员，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高的。

（二）讨论

原苏联地区政治发展一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政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随着政治强人逐渐老去和国家政治发展，政权党肯定要转型。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更是让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大多从西方视角出发考察上述问题，将议会式政党视为发展终点乃至价值标准，没有对苏共七十多年的执政传统给予足够关注。然而，仅从逻辑推演来讲，苏共历史遗产必然会给原苏各国当下政治打下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中亚五国，其政要大多仍是曾经的苏共高官。此外，中共的成功经验也给他们带去很大震撼，目前中亚各国政党普遍有着较强烈了解和借鉴中共经验的意愿。

本文对“祖国之光”党的阐述，实证地呈现了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诸多影响。具体来说，第一，无论是纵向组织体系，还是横向机构设置，以及政党与政府、议会和民众关系，“祖国之光”党更像列宁主义政党，而非议会式政党。第二，除时间较短外，党员的发展程序几乎是过去哈共的翻版，并且党员管理（针对全体党员）非常严格，频繁使用开除党籍等措施。这与西

方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只对党内高层、党籍议员和政府高官有明确的党纪要求。第三，就基层组织而言，西方政党基层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动员选民、赢得选票。与此不同，“祖国之光”党的基层组织并不以选票为主要目标（这也与纳扎尔巴耶夫威望极高、“祖国之光”党获胜缺乏悬念有关），而是以教育引导群众（让群众理解、信仰领袖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发展战略，例如“2050”计划、“光明之路”计划等）、联系服务群众为主要任务。还需注意的是，与直接由土库曼共产党更名改制而来的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独立以来一直是土国执政党，2012年以前是唯一合法政党）等不同，“祖国之光”党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发展成长起来的新政党。本文介绍的关于该党的诸多内容，大多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是有意构建的结果。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初步可以列举四项原因：第一，路径依赖。七十多年苏联传统深深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祖国之光”党众多骨干出自哈共，他们不了解议会式政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仅从个人习惯来说，也会倾向于选择熟悉的建党方式。^①第二，对议会政治的不适应。苏联解体后，原苏各国普遍采用了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但除具有不同历史遗产的波罗的海三国外，大多效果不佳，问题最严重的乌克兰等国动荡至今。现有研究多将议会式政党视为政权党的发展方向，然而，事实上，原苏多国政权党的出现，反倒是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议会式政党软弱无力、议会政治内斗频繁等问题。因此，从主观意愿看，上述国家执政精英和普通民众对议会式政党都有所排斥。纳扎尔巴耶夫多次指出，“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②第三，相比议会式政党，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有助于纳扎尔巴耶夫在辞去总统后继续保持较大影响力乃至掌控政局和国家发展方向，确保平稳过渡。第四，外部因素。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成就彰显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生命力和时代性。“祖国之光”党非常重视学习中共经验，近年来两党交流频繁。换言之，“祖国之光”党的种种做法，既是对哈共传统的路径依赖，也是对当下中国的借鉴参考。

① 高永久、许亚清：“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体制”。

②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 命运 个人》，陆兵、王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严格限定结论的边界：“祖国之光”党正在学习借鉴列宁主义政党的许多做法（主要是在组织体系建设上），但不能说“祖国之光”党正在向列宁主义政党转型。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等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祖国之光”党是没有的。相比组织体系的“形”，这是“神”上的本质不同。第二，作为议会政治参与者，“祖国之光”党也有不少议会式政党的运作机制（例如议会党团），只是由于主题原因，本文没有阐述这方面的内容。事实上，原苏各国政权党的发展，具有西方议会式政党与列宁主义政党的双重特征。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既要从议会政治视角考察政权党，也应当从政党建设视角考察政权党，并进一步构建复合框架，考察两种政党模式在政权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 Abstract 】 Kazakhstan is an important neighbor of China and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Nur Otan has been the ruling party of Kazakhstan since 2004. In March 2019, Nazarbayev resigned as President, but still retained the position of Party Chairman. This means that the Nur Otan Party will continue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Kazakhstan, but little domestic research has been done. Based on first-hand materials of field visits in Kazakhsta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Nur Otan Party from four aspects: central organization, local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Party cadres and Party funds, and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 trend. When obser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documents presuppose parliamentary political parties as their comparative model and development destination. However,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ur Otan Party has adopted many Leninist party practices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influenced by both parliamentary politics and Leninism.

【 Key Words 】 Kazakhstan Politics, Kazakhstan Political Parties,

Kazakhstan Nur Otan Party, Leninist Party

【Аннотация】 Казахстан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соседом Китая и важной точкой опоры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и один путь». Партия «Нур Отан» является прав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2004 года. В марте 2019 года Назарбаев подал в отставку с пос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днако сохранил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 в партии, ч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партия «Нур Отан»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играть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из первых рук, приобретённых во время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раскрывает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и методы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и «Нур Отан» и обсуждает тенденции её развит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етырёх аспект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ест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артийные кадры и партийн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блюдая з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ей и развити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странах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партии являют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ми моделями и конечными точками развити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партия «Нур Отан»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новь приняла практику многих ленинских партий, и на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оказали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ак и лениниз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парт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Нур Отан»,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 ——角色变化及其原因（1992-2019年）*

聂侯诚**

【内容提要】俄罗斯独立以来，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尽管身处中心、却受中央政权规制的地位演变。叶利钦时期和普京第一任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原因是当时地方政治中旧统治集团占据绝对优势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对政党功能造成了负面影响。普京第二任期开始，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政权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真正能够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高度受控的统一俄罗斯党。这一过程基本完成于2004-2012年，并在普京第三任期得以延续。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既是俄罗斯选举威权主义由地区性迈向全国性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作为重构央地关系的手段，统俄党为整合地方精英、实现央地制度性互动搭建了平台，俄罗斯中央政权得以更为稳定地以地方精英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为自身服务，从而完成了全国性选举威权主义体制的建设。

【关键词】俄罗斯地方政治 俄罗斯地方选举 俄罗斯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051-(50)

* 本文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欧亚地区战略态势(2019-2021)”的资助。感谢薛福岐老师、张昊琦老师、李雅君老师、李中海老师、庞大鹏老师、刘莹老师、曾庆捷老师、白娜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和无私帮助！

** 聂侯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后，其主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经历了包括民族国家重建、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三重制度重构，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治、政党政治等方面，都展开了与苏联时期有很大区别的政治实践。俄罗斯是一个领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自然社会条件复杂的巨型国家，地方政治和央地关系自然是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的国家权力机关分为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两级，联邦主体之下是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是独立的、不属于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因此，在本文中，一般情况下，地方政治指的是联邦主体这一层面的政治，在有特殊说明时包括俄罗斯地方自治这一层面的政治运行情况。^①作为俄罗斯联邦的组成部分，联邦主体的政治运行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俄罗斯的最低一级政权，与民众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是在联邦主体的管辖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各联邦主体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对联邦层面政治的影响力。联邦中央也需要同各联邦主体保持一种有利于政权延续和国家稳定发展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财政和人事等多方面）。联邦中央同地方的这种互动，即构成了所谓的央地关系。

本文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这一视角切入，对俄罗斯联邦主体层面的政治进行研究。政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具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政治录用等多项重要功能，起着国家与市民社会间中介的作用。政党制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在整个西方民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国政党政治的成熟与否和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该国西式民主体制运行的顺畅与否。正如胡安·林茨所指出的，“现在，放眼全球都无法在民主政体建设的过程中找到政党的替代品”。^②在现代政治变迁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中，政党往往

^① 目前，也有部分中文学术作品将联邦主体这一层面的政治称为“地区政治”，但是，笔者仍然更愿意使用“地方政治”的说法，以体现其同联邦中央层面政治的区别。

^② Cameron Ross ed., *Regional politics in Rus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7.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个强而有凝聚力的全国性政党，能够在—个联邦制国家中起着整合的作用。在威权政体中，政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芭芭拉的研究显示，在传统威权政体中，政党政体相较—人独裁政体和军人政体，延续时间更长。^①斯提芬·列维茨基和卢肯·威则把政党组织力的强弱，视为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延续的关键。^②其他学者也从精英晋升和政治选拔、利益分配、精英间矛盾协调等^③多个维度，阐明了政党在选举型威权政体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俄罗斯在独立后按照西方民主制度的模板，建立起了政治制度的大致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则更多体现出选举威权主义的特征。无论是民主之表还是选举威权主义之里，政党在俄罗斯这一特殊的框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自身功能发挥的情况如何，都是分析俄罗斯政治运行的—个重要视角。同时，目前国内对俄罗斯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层面。因此，对地方政治中政党活动的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加深对俄罗斯地方政治的认识，还在于能从地方层面补充对俄罗斯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逻辑上层层深入的三组问题：首先，俄罗斯独立以来，政党在俄罗斯地方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其次，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最后，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当中，反映出独立以来俄罗斯政治的哪些特点和怎样的内在逻辑？

围绕地方政治中政党的活动这一主题，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直接对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进行

① [美]芭芭拉·格迪斯著：《范式与沙堡》，陈子格、刘骥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Beatriz Magaloni,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Vol.13, No.1, pp.123-143;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Yonatan L. Morse, “From Single-Party to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ompetitiveness in Post-Cold War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5, Vol.48, No.1, pp. 126-143.

研究。戈洛索夫的《俄罗斯地方上的政党》^①一书和哈奇森的《俄罗斯地方上的政党》^②一书，均以别斯兰事件前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为研究对象。这两本专著均认为，政党在当时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卡梅伦·罗斯则考察了政党在俄罗斯地方议会中的兴衰^③，其文章认为，叶利钦时期地方议会中的政党体制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而到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政党体制则转变为统俄党在地方议会内占据绝对优势。第二类文献的关注点是俄罗斯政党体制，其中涉及政党在地方的活动。有的学者关注在统治型政党体制形成过程中，中央政权同地方精英的合作^④；有的则考察政党体制改革对地方政治中政党活动的影响。^⑤关于统俄党的研究在这类文献中占了相当一部分，具体议题包括统俄党在地方统治地位的形成^⑥，统俄党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及其机制^⑦等。第三类文献研究的出发点是俄罗斯的地

①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② Derek S. Hutcheso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ussian Reg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③ Cameron 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s Regional Assemblie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3, pp.429-448; Ora John Reuter, *The Origins of Dominant Parties Building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Grigorii V. Golosov, "Co-op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ominant Party System Building: The Case of Russ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4, Vol.30, No.2, pp.271-285; [日]大串敦：“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7页。

⑤ Yury Korgunuk, Cameron Ross, Sergey Shpagin, "Party Reforms and the Unbalancing of the Cleavage Structure in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2012-2015",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Vol.70, No.2, pp.155-181;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контрреформа 2012-2014 год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д ред. Н.А. Борисова, Ю.Г. Коргунока, А.Е. Любарева, Г.М. Михалевой;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акультет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исслед. Комитет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у изучению партийных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Москв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15. 200 с.

⑥ Ora John Reuter, Rostislav Turovsky, "Dominant Party Rule and Legislative Leadership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Party Politics*, 2014, Vol.20, No.5, pp.663-674; Petr Panov, Cameron Ross, "Sub-Nat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Variations in United Russia's Domination of Regional Assemblies", *Europe-Asia Studies*, 2013, Vol.65, No.4, pp.737-752.

⑦ Petr Panov, Cameron Ross, "Levels of Centralisation and Autonomy in Russia's 'Party of Power': Cross-Regional Varia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Vol.68, No.2, pp.232-252.

方政治，在对地方政治总体考察中对地方政治中的政党进行研究^①，这类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把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的地方选举制度上。^②

此外，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对当年或当次选举的分析。包括戈洛索夫对俄罗斯地方选举的长期跟踪^③，基涅夫对俄罗斯选举和政治进程的长期跟踪^④以及相关智库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备忘录等^⑤，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叶利钦时期^⑥政党的边缘处境及其原因

俄罗斯独立以来，其地方政治实践的逐步展开和规范化经历了一个过程。苏联时期，地方行政长官产生的方式实际上都是委任制。^⑦自“8·19

① Andrew Konitzer,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Vladimir Gel'man, Cameron Ross eds., *The Politics of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Farnham: Ashgate, 2010; William M. Reisinger, eds. *Russia's Regions and Comparative Sub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② Arkady Lyubarev, "Electoral Legislation in Russian Region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3, pp.415-427; Bryon Moraski, *Elections by Design*,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6; Grigorii V. Golosov,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Evidence from Russia's Regional Election Law Reform", *Representation*, 2013, Vol.49, No.1, pp.83-95.

③ Grigorii V. Golosov, "Disproportionality by Proportional Design: Seats and Votes in Russia's Reg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December 2003-March 2005", *Europe-Asia Studies*, 2006, Vol.58, No.1, pp.25-55; Grigorii V. Golosov, "The September 2013 Reg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14, Vol.24, No.2, pp.229-241; Grigorii V. Golosov, "The September 2015 Reg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A Rehearsal for Next Year's National Legislative Races",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16, Vol.26, No.2, pp.255-268.

④ Aleksandr Kynev, "Russia's September 14 Regional Elections: Strengthening the Rules and Reducing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14, No.156.

⑤ Нат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Кыне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 Кирилл Рогов, Сергей Шпилькин. Стресс-Тест на Пол-России Технологии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и 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Анализ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2018 г.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18.

⑥ 需要说明的是，为行文方便，我们使用了“叶利钦时期”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覆盖了叶利钦执政的9年和普京的第一任期。

⑦ 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7页。

事件”起至 1996 年，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制度进入了一个任命制与选举制并存的时期。“8·19 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关于俄罗斯联邦执行机构若干问题的总统令，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较大变动：设立地方行政长官以领导地方权力执行机构，而地方行政长官^①由总统直接任命。这一时期，叶利钦还利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任免了一批地方行政长官，而原先的苏维埃仍然存在，因此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双重政权问题，叶利钦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同遗留下来的苏维埃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②1996 年，在经历了三次冻结之后，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开始步入正轨，47 个联邦主体进行了选举，任期一般为四到五年。地方立法机关的选举则相对复杂。最早的相对自由的地方立法机关选举，开始于 1990 年 3 月的地方苏维埃选举。苏联时期选举出的地方立法机关大多运行到 1993 年秋，之后，根据叶利钦的总统令，各非共和国联邦主体的地方立法机关大多被解散，个别地方延续到 1995 年底甚至 1996 年底。大多数联邦主体在 1993 年 12 月或 1994 年初举行了新的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也有个别联邦主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按期举行选举。新选出的地方立法机关任期只有两年，但各地方立法机关都寻求将任期延长至 1996-1997 年底。从这两年起，俄罗斯地方立法机关的选举开始依法按期举行。

总的来说，1993 年“十月事件”后，伴随着联邦中央权力斗争的结束和宪政体制的逐步形成，作为地方政治核心制度的行政和立法机关选举逐渐步入正轨，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制度框架和按期举行的选举。而这些选举也成为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各方展开角逐的主要舞台。政党作为以争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其参与地方政治的核心任务和主要手段，就是参加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两大选举。通过考察政党在两大选举中的参与情况及最终表现，我们就能对这一时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有所认识。

（一）处于边缘地位的政党

① 我们在此将联邦主体行政机关的领导人统一称为地方行政长官，其具体称呼根据联邦主体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别。

② 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第 204-205 页。

1. 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政党

地方行政长官是这一时期地方的权力核心，也是地方政治的中枢所在。因此，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争夺在地方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政党在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俄国学者戈洛索夫搜集了第二和第三选举周期^①内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相关数据：在第二选举周期举行的 88 次选举中^②，有 48 场选举有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参加；而到第三选举周期举行的 87 次选举中，这个数字降到了 32 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候选人人数和最终结果方面，第二选举周期共有 459 名候选人，其中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74 人，13 人成功当选；第三选举周期共有 562 名候选人，其中政党提名的候选人降至 46 人，成功当选的仅有 6 人。^③通过这一系列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并不占优势，且政党对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低参与度有加剧的趋势。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全俄协调委员会（OKS）和人民爱国力量联盟（NPSR）两大全俄性政治联盟，是 1996-1997 年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主要政党参与者。人民爱国力量联盟成立于 1996 年 8 月，其前身是 1996 年总统大选中为支持久加诺夫而建立的政治联盟，领导人是久加诺夫和原苏联总理、时任杜马人民力量议员团领袖雷日科夫，联盟成员包括俄共、农业党及其他一些左翼政治组织。全俄协调委员会也成立于 1996 年 8 月，其领导人为总统办公厅前主任费拉托夫，包括“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俄罗斯民主选择”、“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党”等在内的 19 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加入了这一联盟。全俄协调委员会同叶利钦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主要支持的候选人也都是叶利钦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

从表面上看，在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全俄协调委员会同人

① 戈洛索夫根据国家杜马选举的情况将这十年划分为三个选举周期，第一选举周期是 1993 年 8 月到 1995 年 7 月，第二选举周期是 1995 年 8 月到 1999 年 7 月，第三选举周期是 1999 年 8 月到 2003 年 7 月。见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9

② 采取两轮制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仅计一次。

③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71.

民爱国力量联盟两军对垒，旗鼓相当，似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际选战中，候选人对来自这两大阵营的支持并不买账。全俄协调委员会背书的行政长官并不强调自己被其支持的情况，全俄协调委员会对不少行政长官的支持也并非来自行政长官的争取或邀请，他们更关心的是总统办公厅对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情况也在人民爱国力量联盟身上存在：联盟更多选择的是本身就具有相当实力的地方行政长官，尽管这些人同左翼运动并没有联系。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爱国力量联盟开始等到选战进行到中段，甚至第一、二轮选举的间歇期时，才开始在已显胜相的候选人中挑选自己的支持对象。在部分联邦主体则出现了全俄协调委员会和人民爱国力量联盟支持同一个候选人的现象。^①

因此，我们认为，这两大联盟看似深度参与了1996-1997年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但这种参与并没有对实际的政治进程产生太大影响。一方面，行政长官没有选择借助政党标签进行选战，即使是受到政党支持，他们也更愿意以独立候选人的形象面对选民。另一方面，政党在选择支持对象时，常常不是根据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政见或与本党的关系，而是通过评估候选人胜选的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支持策略。全俄协调委员会和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存续时间也不长。前者主要是在叶利钦任命的行政长官所在的联邦主体活动，因此在1997年后基本上淡出了历史舞台，且再无类似的组织出现。^②后者在1998-1999年经历了包括农业党的离开等一系列变故，实力大为下降。可以说，这两个联盟是1996-1997年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红色州长”现象似乎也是政党在这一时期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例证。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考察，则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首先，“红色州长”们上台以后，并没有在所在的联邦主体按照俄共的路线行事，相反，他们选择尽可能淡化、回避自己的“红色”政治身份，

① S. Solnick,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in Russia, 1996-1997”, *Post-Soviet Affairs*, 1998, Vol.14, No.1, pp.48-80.

② Andrew Konitzer,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pp.86-87.

在具体的政策方针上与其他州长并没有太大差别。与此相呼应，这些州长上台以后建立的行政班子中也没有多少俄共成员，有的沿袭了上一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班底，有的则选择依靠当地精英组建。其次，这些“红色州长”在当选后，其中的不少人并没有保持对俄共的政治支持，在之后举行的全国性选举中，没有使用自己拥有的行政资源为俄共助选，特别是在普京上任以后，更是出现了直接表达对俄共批评和对政权支持的现象。有的“红色州长”执政以后选择建立自己的地区性政权党，进而取代对俄共的依赖；个别实力派州长甚至还选择在左翼阵营中自立门户，成为俄共的分裂者。^①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红色州长”与俄共的关系是相对疏离和含糊的。他们的存在并不影响我们对政党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低参与度和低影响力的判断。

而当时间推移到第三选举周期时，已经有了执政经验和基础的行政长官候选人，以“实干家”（крепкий хозяйственник）、“全民领导人”的形象出现，成为席卷全俄地方的一股政治风潮。鲜有候选人愿以政党成员的面目参选，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发展相对成熟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其参选人所归属的政党也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极具个人色彩的地方性政党，政党的归属本身可以说是无足轻重。^②而这一时期在国家杜马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团结”联盟，也未能在地方有所斩获。在2000年举行的44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没有一名获胜者是由其提名的。^③种种迹象表明，在普京的执政初期，政党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地位愈发边缘化了。

2. 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政党

尽管同地方行政长官相比，地方立法机关在地方政治当中的影响力和地位较低，但其仍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普京推行“法律专政”、清理与中央法律相违背的地方法律之前，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对

① Rostislav Turovsky, “Opposition Parties in Dominant-Party Regimes: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Russia’s Region”, in William M. Reisinger, eds., *Russia’s Regions and Comparative Sub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87-91.

② Vladimir Gel’man, Cameron Ross, eds., *The Politics of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Farnham: Ashgate, 2010, p.137.

③ Ora John Reuter, *The Origins of Dominant Parties Building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1-112.

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很强的影响力。另外，一般来说，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往往会有更高的参与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党在这一时期地方立法机关的选举中发挥的同样是边缘、次要的作用，扮演着选举舞台上的“龙套”角色。

首先来看 1993-2003 年期间政党参与地方立法机关选举总的情况。根据戈洛索夫的统计，在第一选举周期内，共有 65.9% 的地方立法机关选举有政党参加，而在 57.6% 的选举中政党候选人拿到了至少一个席位。^① 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赢得了 12.5% 的席位；第二选举周期内各项数字都有所上升，政党参与率 88.6%，政党成功赢得一个席位的比例上升至 78.4%，政党候选人在所有席位中占比 21.8%；第三选举周期各项数据又有所下降，政党参与率 85.9%，政党成功赢得一个席位的比例 67.1%，政党候选人在所有席位中占比 14.3%。原因在于，在前两个周期的统计口径中，戈洛索夫把商业联盟、退伍军人协会等更多具有利益集团性质的政治团体也划入了政党的范畴内，而在 1999 年，政治性社会团体被明确限制参加选举，因此这部分组织没有参加第三选举周期的地方立法机关选举。

表 1 政党在俄罗斯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参与情况（1993-2003 年）

	第一选举周期	第二选举周期	第三选举周期
所有选举中有政党提名候选人参与的比例（下表简称参选率）	65.9%	88.6%	85.9%
所有选举中政党候选人赢得至少一个席位的比例（下表简称赢得席位率）	57.6%	78.4%	67.1%
当选的政党候选人在所有议员中的比例（下表简称在议会中占比）	12.5%	21.8%	14.3%

数据来源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73.

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参与率尚可。除地方议会选举刚刚开展的第一选举周期外，在另外两个选举周期中，超过 80% 的选举中有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且政党提名候选人获得席位的

① 之所以使用比例值而非绝对值，主要是因为每一选举周期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数量并不相同，采用比例值便于我们进行比较。

比例均在 65%以上。这说明政党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地方立法机关选举，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政党参与选举的效率并不高。在第一、第三两个选举周期内，政党提名当选议员的，在全部议员中的比例均不超过 15%，在政党参与率最高的第二选举周期内也不过刚刚超过 20%。这样的数据，使我们很难认为政党在尤其应该唱主角的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有很重的席位。

而如果我们分党派进行考察，则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时期，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表现最为出色的是俄共。在第一选举周期以 42.2%的参与度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二、三选举周期则保持在 55%以上。但是，尽管俄共的参与度相对其他党派较高，如果从绝对值考察，这样的数字则表明，这一时期在地方政治中影响力最强、政党基层组织建设最完备的俄共，也仅参加了这一时期略超过一半的地方议会选举。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实在难称出色。尽管在第二选举周期其参选率一度达到 73.9%，但是三个选举周期内其赢得席位的比例都没有超过 5%。在这三个选举周期内出现过的四个政权党：俄罗斯民主选择、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团结、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表现也很一般，在各自得势的选举周期内，他们的参与度一般在 25%左右，赢得席位率在 15%左右。这表明，受到中央政权支持的政权党，并不能在地方获得相应的影响力。自由派政党亚博卢在第二选举周期以 37.5%的参与率和 14.8%的赢得席位率，让人眼前一亮，但在第三选举周期则回归平淡。右翼力量联盟的情况，与亚博卢基本类似。相较传统的全国性政党，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特殊现象——地方性政党和利益集团等非政党政治团体，则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例如，这一时期的地方左翼运动从总体上计算参与率和赢得席位率不高，但是其在成功赢得席位的议会内占有相对可观的比例。这说明地方左翼政党的表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在其基础好的联邦主体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占据一定席位。在第一和第二选举周期中，以退伍军人协会和贸易联盟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也取得了不俗表现。

总而言之，相较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确实更高。同非赢即输且只有一个胜者的行政长官选举相比，议会选举的门槛更低，成功（拿到席位）的可能性更高。从各国普遍的情况

看，政党也确实更多地在议会及其选举中发挥作用。但是，这是相比政党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参与度和影响程度而言的。从绝对值来看，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发挥的仍是次要作用。对俄共以外的政党来说，他们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各全国性政党在选举中的参与率鲜有超过30%的。即使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亚博卢超过了30%，其最终能够赢得席位的比例也仅在个位数上下，很难说对地方议会选举有什么影响。俄共尽管相对于其他政党表现稍好，但从绝对数上看，其对地方选举的参与率不到六成，在一半以上的选举中无法拿到哪怕一个席位，因而相对地方政治中的其他非政党参与者，仍然居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作为本时期对地方政治参与程度最深的政党，俄共的位置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的选举中，扮演着次要和边缘的角色。

表2 几个主要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参与情况（1993-2003年）

	参选率（第一/二/三 选举周期，下同），%	赢得席位率，%	议会中占比，%
俄罗斯共产党	42.4/59.1/57.9	25.9/46.6/38.8	10.2/21.2/10.4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23.5/73.9/42.4	2.4/4.5/2.4	12.0/6.9/2.8
农业党	17.6/21.6/14.6	21.6/10.2/18.0	17.6/8.2/8.9
地方左翼运动	23.5/17.0/13.0	16.5/11.4/5.9	8.2/5.9/38.1
俄罗斯民主选择	22.4/13.6/*	11.8/3.4/*	10.6/8.7/*
亚博卢	*/37.5/23.5	*/14.8/7.1	*/8.5/7.5
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27.3/*	*/13.6/*	*/7.1/*
团结/统俄党	*/*/21.2	*/*/18.8	*/*/21.6

表格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p.83-87; *无相关数据。

在对 1991-2003 年政党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和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的表现进行梳理后，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政党在地方政治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不是政党，这一时期的政党只是角落里的一个龙套角色。

（二）政党在地方政治中边缘地位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的考察，我们认为，造成政党在这一时期地方政治中不得不扮演“龙套”角色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地方政治中的

权力结构。换言之，在当时地方政治舞台上，有实力远强于政党的其他“演员”，这就是以地方行政长官为代表和核心的体制内精英。他们占据了地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是真正的主角。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及政党本身选举功能发挥的不足，进一步导致了政党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1. 权力结构因素

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后，尽管上层的政治精英有较大更替，但在地方层面，旧的政治势力和权力结构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很多都保留了下来。除了包括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在内的几个民主运动发展较充分的联邦主体由原先的民主运动领导人上台执政外，大部分联邦主体的旧精英只是改换门庭，继续盘踞在地方政权当中。即使是民主派领导人上台或在这一时期由叶利钦更换过地方行政长官的联邦主体，其内部也仍有很强的旧势力。^①斯通纳-维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她在1999年对当时俄罗斯联邦内19个民族共和国、53个州和边疆区的824名官员（其中包括政务官序列：地方行政长官、副长官和地方自治机关领导人；事务官序列：地方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和联邦派驻机构领导人）的履历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25%的官员在苏联时期曾在当地的行政机关任职，28%的官员在国有企业任职，5.7%的官员在立法机关任职。总体而言，地方官员当中的70.5%，在苏联时期在其所在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指主管或副主管）。^②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体制内地方精英，仍然掌握着相当多的资源，远非政党可比。这是我们展开本部分论述的基础。下面，我们分别从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和地方立法机关选举入手来展开论述。

本时期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突出特点，可以被概括为“神仙打架”，即主要候选人基本上都是手握大量行政资源的地方上层精英。竞争的一方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任州长，其拥有的资源自然无须赘言。另一方往往也是地

^① 参见 Graeme Gill, James Young,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53-154.

^② Kathryn Stoner-Weiss,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2.

方议会的首脑、首府市长、地方行政机关和自治机关的重量级官员、国家杜马议员等手握相当行政资源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不需要向资源并不丰富的政党求助。从第二选举周期到第三选举周期，在任官员的连任成功率上升，政党参与度下降，这提示我们，随着这一时期当选的地方行政长官逐渐坐稳位置，留给瘠弱的政党发挥作用的空间在进一步缩小。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立法机关选举。不少学者都关注到企业家在俄罗斯地方议会中占有的特殊位置。根据戈洛索夫对 1995-1999 年俄罗斯地方议会中 3420 名议员的调查统计（见下表），有 41.6% 的议员来自企业家。他们参与地方立法机关的主要政治资源，是其企业的员工及家属的支持。苏联时期，大中型企业承担了包括住房、医疗、儿童保育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苏联解体以后，尽管经历了经济转轨和私有化，但这些职能也部分得到了保留，这使得企业家对员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①

表 3 1995-1999 年俄罗斯地方议会议员背景分布及政党提名情况

议员背景	该背景议员在所有议员中占比，%	该背景议员中由政党提名的议员占比，%
工商企业家	41.6	13.2
市政领导人	10.7	6.0
社会部门	9.4	37.1
市政官员	8.9	12.4
其他级别议会议员	8.8	27.0
医务工作者	7.3	13.7
专业人士	7.2	27.8
公务员	6.1	41.0
总和	100.0	18.6*

数据来源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155.

* 指的是全部地方议会议员中由政党提名的议员占比

市政领导人和市政官员在议员中占了 19.6%，他们同样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部分议员的当选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金钱和社会服务供应基础上

① Henry E. Hale, "Explaining Machine Politics in Russia's Regions: Economy, Ethnicity, and Legacy", *Post-Soviet Affairs*, 2003, Vol.19, No.3, pp.228-263.

的庇护关系。他们不需要借助政党的力量来赢得选举。这一点从戈洛索夫的统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发挥作用的限度和范围，取决于候选人对其需要的程度，实际上就是其自身拥有资源的多少。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地方政治中，绝大多数资源仍掌握在体制内的政治、经济精英手中。相对于政党，他们拥有相当的优势，这导致占议员半数以上的体制内精英团体，对依靠政党助选并没有兴趣，而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在与这些精英的较量中也难以占到上风。

2. 制度设计因素

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的制度设计，也是造成政党龙套化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联邦主体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是地方的行政机关而非立法机关。制度需要以权力作为支撑，也反映权力的利益。在地方行政机关掌控制度安排方向的情况下，这些制度会有利于谁，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了。

制度设计对政党参与地方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具体的选举制度设计和相对宏观的地区政体制度设计两方面。在选举制度方面，有两项制度设计不利于政党参与选举。首先是政党以外的社会政治组织可以参与地方选举。在1999年版的《关于提供对公民选举权和参与全民公决权利的基本保障法》正式施行之前，俄罗斯地方选举中活跃着大量的利益集团组织，他们在1999年以前的地方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政党也不是唯一的提名主体。其次，从1993年联邦中央颁布《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国家权力代表机关选举基本规定》到2003年普京强制在地方议会中推行混合选举制的十年间，绝大部分联邦主体选择了多数代表制，其中包括单席位选区制和多席位选区制。只有个位数的联邦主体选择包含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选举制。莫拉斯基发现，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主体对选举制度的选择，与该地方政权的性质及地方精英竞争程度有密切关系。在由旧体制精英掌权、政治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主体，往往选择多数代表制。而区域内存在激烈政治竞争和精英分裂的地方主体，则倾向于在制度设计中

加入比例代表制的元素。^①因此，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关本身就强势的联邦主体，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选举理论认为，比例代表制相较于多数代表制更有利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在第二、第三选举周期均使用混合选举制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的情况印证了这一观点，尤其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形成了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相对稳定、健全的政党政治。^②

在地方层面，联邦主体的政治体制设计也限制了政党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一时期，大多数联邦主体选择了半总统制的政体。^③尽管具体制度设计各有差别，但其包含的核心要素，是议会对行政机关拥有相当可观的人事任免权。按照通常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议会制和半总统制要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政党的发展。但从本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的实践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原因是，正因为议会所拥有的制约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使地方行政长官有很强的动机对议会进行控制，以免其成为对自身执政地位的威胁。在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可供地方行政长官达成这样目的的操作方法有很多。举例而言，地方行政长官通过将同一行政区划为一个选区的方式，可以较容易地确保该区域自治机关的领导人当选为议员。而在当时，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往往是由地方行政长官任命的。鞑靼斯坦和巴什基尔是这种操作手法的典型例证。戈洛索夫的定量研究显示，行政区和选区同构的程度与地方议会权力的大小正相关，这提示我们，恰恰是议会权力较大的联邦主体倾向于采用这种便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议会的制度。不过，由于后来联邦中央对选举规定的修改，这种手法受到限制，只在部分联邦主体继续使用下去，大多数的行政长官则选择直接扶持自己的人马通过参选进入议会，从而形成对议会的控制。曾任国家杜马议员的柳波夫·斯利斯卡指出，地方行政长官主要有四种主要手段：一是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提供可观的媒体支持，包括指示由地方政府控制的电视台控制竞争对手信息的投放，加大本方候选人竞选广告的投放力度等。

① Bryon Moraski, *Elections by Desig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9.

② Vladimir Gel'man, Grigorii V. Golosov, "Regional Party System Formation in Russia: The Deviant Case of Sverdlovsk Oblast",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998, Vol.14, No.1-2, pp.31-53.

③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161.

其二，“官方”候选人可以获得更多举办公共集会、与选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因为这样的集会一般都在工作场所或公共设施举行，地方行政长官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提供便利。第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的手段，提升其所支持候选人的声望；选民如果选择支持其他候选人，则可能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惩罚。最后，直接的选举腐败也可能被地方行政长官使用。^①

从俄罗斯地方政治的实践来看，以上手法行之有效，有相当多的地方行政长官成功地将自己安排的人选送进议会，从而实现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同时，大多数俄罗斯地方立法机关内并没有建立起党团或议员团，采取的是专业委员会的结构，这就进一步压缩了政党的活动空间和政治影响力，加强了议会的行政和技术色彩。即使是部分俄共成功占据多数的议会，也因为这种结构设计，使俄共议员不得不同地方行政长官进行合作，限制了俄共通过地方议会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

3. 政党选举功能因素

由于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权力结构以及受其影响形成的具体制度，政党选举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是其沦为“龙套”角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政党与大规模选举相伴随出现（尽管不一定是普选）。从欧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治史看，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拥有选举权人数的增多，旧式“俱乐部型”政党已无法满足争取更多选票的需要。一个政治集团要在选举中获胜，就要依赖现代政党这样的组织。^②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政党自其诞生之始，就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即服务于大规模选举。选举工具也成为现代政党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之一。一般认为，政党在大规模选举中发挥着以下几个功能：

首先是选举的动员。选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开支已经超出了个人或企业乃至其他一些组织所能承担或募集的能力。在这种情况

^①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p.189-190.

^② 周淑真：《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下，只有政党这样专注于选举、拥有庞大人力和财力资源网络的政治组织，才可能为候选人和政治集团募集到足够的资源，为参与选举提供物质保障。

其次是议程的塑造，并提供政党标签和政党认同。这一功能以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为支撑。政党将其意图争取选民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形成一套相对完整、具有内在逻辑的诉求集。这就像商品的标签，能够降低选民挑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或政治人物所要花费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议程，还将塑造出选民的政党认同。政党认同能够为政党提供相对稳定的支持人群。对于候选人来说，由于政党本身所带有的议程、标签、认同，其选择以政党身份参与选举，本身就展示出了自己的政见，从而大大减低了他们宣传自身政见和议程的发声与降噪成本。

从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的实践看，政党在选举中的这两项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首先，政党的选举动员功能在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并不突出。原因在于，在选举市场上，存在大量能同样起到政党作用且效率不亚于甚至更高于政党的替代品。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的语境下，政党的选举动员功能具体表现为三方面：提名候选人、收集签名和助选，包括组织拜票、集会等活动和募集资金等。

这一时期政党并非是提名候选人的唯一途径。候选人可以由一组选民、自己的同事等提名，且在不少联邦主体并无人数限制，部分地方甚至允许自我提名。^①签名的收集同样有许多政党以外的行为体可以完成。比如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可以使用自己的“政治机器”。^②如果候选人既不是官员也非企业家，他们也仍然拥有政党以外的选择：不少人，尤其是大学生，将收集签名作为他们的兼职，一个签名一般价值 1-1.5 卢布^③，这样的价格完全在候选人的承受范围之内。

政党的助选活动，通常来说包括逐户拜票、组织公共集会、张贴海报散发传单、媒体宣传这几种方式。对于政党来说，其比较优势更多地在依赖人

①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p.114.

② Henry E. Hale, “Explaining Machine Politics in Russia’s Regions: Economy, Ethnicity, and Legacy”, pp.228-263.

③ 需要说明的是，一位选民可以为多位候选人签名。

力的前三种形式上。即便如此，这三项内容也并非所有政党都能很好地实施。从当时的情况看，只有为数不多有比较健全基层组织的政党能担当此任。在张贴海报、散发传单的问题上，则有不少学生以此为兼职，无须政党也能完成。媒体方面，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形式：电视台，或直接国营，或由于地方行政机构所拥有的审批权等而被间接控制，实际上是由地方行政长官使用的资源，少有政党能取而代之为己所用。

除了上述四种形式外，政党还可以作为直接组织者参与选举。从常理推断，熟稔选举的政党提供的咨询、指导、组织等服务，正是一些缺乏相关经验的候选人所需要的。但是，在俄罗斯，除政党以外，还有不少专业的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他们被称作“政治技术人员”、“政治公关公司”等。他们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咨询师十分相似，其中比较有名的公司包括“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KKOLO-M）、高效政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Politics）等。^①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几家大的全国性公司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性公关公司。这些公司深度介入选战，为雇主提供保姆式的全方位服务，很大程度上代替甚至超越了政党在这一领域所发挥的功能。

而在塑造议程、提供政党标签和政党认同方面，俄罗斯政党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党政治处在野蛮生长的初创期，呈现出政党数量多、发展不成熟、政见相互雷同的特点。许多政党尽管名义上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但其更多的是精英出于政治目的创建的产物，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常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摇摆不定。有的政党实际活动时间很短，几年内就销声匿迹，部分甚至是一次选举失利就不再活动的“一次性政党”。而在政党数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其相互之间的政见、意识形态，甚至名称等也难免雷同。这些都导致民众难以辨别为数众多的政党。另一方面，今天我们再观察当时相当多政党的议程设计和意识形态时，可以发现，那些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等空洞口号，并不能满足当时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大城市以外民众的诉求，这导致民众并不会形成对他们的认同。两方面因素结合，使得政党相较于其他参选主体本应具有的独特优势，并没有能

^① Andrew Wilson, *Virtual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49-72.

够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参与程度和效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造成这一时期出现政党龙套化现象的原因，来自政党本身各方面实力的孱弱和地方政治中体制内精英所具有的强势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央基本上不具备调节地方政治的手段，对地方政治干预不多，因此地方政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内部的权力结构。而从行为者本身的权力来源看，本时期地方权力结构当中的两方，主要是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的社会力量。由于体制内精英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及可供他们选用的地方上的各种能发挥与政党相似功能的替代品，他们无须借助政党参与政治。这一时期的政党，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就政党而言，它是产生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民主化乃至俄罗斯独立以后的新生事物，其自身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而其代表的社会力量，在从旧时代比较完整地承继下来的地方政权面前，也是弱小的。同时，在政权主导下形成的允许非政党行为体参与地方政治的制度安排，使得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与西方民主国家完全不同。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是经由政党政治产生的，而在俄罗斯，部分政党是地方政权创造出来的工具，没有这样背景的政党则与政府/政权呈现出一种并行的、相互对抗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对抗性关系和这一时期政权力量压倒社会力量的权力结构当中，新生的、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政党，很自然地被边缘化了。

三、统俄党的兴起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

从 2004 年起，随着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的废除，俄罗斯的地方政治走上了同叶利钦时期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单从制度设计来看，政党得以从地方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能够在地方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只有统一俄罗斯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政权重塑了整个俄罗斯的政党格局。除了受到中央政权高度控制的统俄党外，只有体制内反对党和政权的卫星党保留了下来。这也意味着政党尽管走到了地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却时时刻刻处于受到中央政权控制的状态。尽管 2012 年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重启，建立政党的条件也被放宽，但这样的格局在政权一系列的调控

措施之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本节我们从普京执政以来对地方政治、政党政治和央地关系等一系列调控措施出发,考察这些措施所达到的效果以及政党角色由此发生的变化。最后,对政党的性质及其角色转变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

(一) 重塑央地关系: 普京的任务与措施

在对叶利钦时期地方政治的讨论中,联邦中央以缺席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这一时期俄罗斯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悬浮”于地方政治之上的,而斯通纳-维斯则将其概括为中央被隔离于地方政治之外。^①在中央层面的政治中,叶利钦作为总统有一定的权威,但他的这种权威对地方影响有限,各联邦主体自行其是。中央的政策和意志在地方很难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呈现出“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叶利钦作为总统缺乏干预地方事务的有效抓手。因此,地方政治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呈现出“自说自话”的地方性特征,来自中央的影响和干预是比较微弱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行政长官实力愈发壮大,逐渐成为地方政治中的绝对核心。与此同时,地方行政长官开始试图干预联邦中央层面的政治。地方行政长官掌握的政治机器,在全国性选举中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在1999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得到了充分展示。^②因此,这种中央的悬浮性,地方的封闭、独立性以及央地关系的失衡性,成为叶利钦留给普京的重要政治“遗产”。地方势力通过联合组建政党、利用“政治机器”操纵联邦层面选举结果等手段,逐渐开始影响联邦层面的政治,这对中央政权的稳定和普京的执政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因此,调整和重塑央地关系,成为普京执政以后的当务之急。

1. 普京第一任期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普京第一任期,更准确地说是别斯兰事件之前,俄罗斯地方政治,尤其是政党在其中的参与情况,仍然基本延续着叶利钦执政时的模式。但普京第

① Kathryn Stoner-Weiss, “Central Weakness and Provincial Autonomy: Observations on the Devolution Proces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o.1, pp.87-106.

② K. Matsuzato, “From Ethno-Bonapartism to Centralized Caciquismo: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s of the Tatarstan Political Regime, 1900-2000”,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1, Vol.17, No.4, pp.43-77.

一任期俄罗斯联邦中央层面政治的面貌，相较叶利钦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地方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制度安排上也做出了不小的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在其第一任期内暂时还未在地方政治中看到效果，但为之后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尤其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我们将普京第一任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表现和这一任期的调整措施，分别放在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进行论述的原因。

在政党制度方面，最重要的调整是《政党法》的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人数、地方分支数量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规定不允许建立地方性政党，不允许根据职业、种族、民族或宗教属性建立政党；政党如在5年内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或候选人名单参加选举，将被取消其注册资格等。^①《政党法》的一系列规定，对叶利钦时期建立的大量小党和地方性政党是致命打击。这一调整实际上消除了地方领导人创立作为自己工具的地方性政党的可能，使政党成为一种归属于联邦层面的政治力量。政党数量的减少带来了政党集中程度的提高。这种集中化和之前提到的“联邦化”，降低了政权对政党进行规制的成本。

这一时期选举制度方面最重要的调整，是于2002年颁布、2003年正式施行的新的《关于俄罗斯公民选举权和参加全民公决权的基本保障法》。该法案强制性地地在俄罗斯地方议会中推行以政党名单为基础的比例代表制，以法律和制度设计的形式，为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参与提供了保障。

在与央地关系直接相关的联邦制方面，普京也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建立联邦区，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领导人担任联邦委员会委员的权力等，削弱了地方上层精英通过议会上院对联邦层面政治进行干预的能力。此外，普京还取得了在特定情况下罢免地方行政长官和解散地方议会的权力。在行政维度上，联邦对强力部门改行垂直领导，削弱了地方行政长官对强力部门的干预和控制能力。由于强力部门在俄罗斯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作用，这一安排对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着显著意义。财税制度也

^① 转引自刘淑春等：《当代俄罗斯政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8-64页。

进行了调整，大部分收入由地方掌握转为收归中央，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地方。此外，联邦政府还掌握了地方国有媒体领导的任命权，削弱了地方行政长官对本地区舆论的影响能力。^①

从别斯兰事件以前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系列调整在地方层面的效果仍不理想。上节谈到，此时已作为联邦政治力量的政党，在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的参与度不但没有提升，还表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统俄党在地方尚未获得与其在联邦层面的表现相匹配的影响力。此时的地方对中央而言仍是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普京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使地方“犯上作乱”的现象大为减少，但中央尚不能对地方政治实施有效的影响和干预。面对这种情况，从别斯兰事件开始，普京决心通过对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机制、地方选举制度、政党制等一系列制度的调整，借助统一俄罗斯党，彻底撬开地方政治的盖子。

2. 普京第二任期与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采取的措施

这一部分涵盖的是从2004年9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俄联邦中央采取的政策调整措施。这一时间段开始于别斯兰事件，结束于梅德韦杰夫在2011年第六次国家杜马选举后宣布采取加强政治竞争的新措施。在这一时期内，为扭转长期以来地方的封闭性和央地关系的失衡状态，俄罗斯联邦中央在梅、普治下^②，打出了包括调整地方行政长官产生制度、地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多方面措施的组合拳。

首先，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最初代之以总统代表推荐、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的方式。之后，经过2005年和2008年两次修改，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的推荐权，最终被完全赋予了地方议会的第一大党，其有权向总统推荐三名候选人。这与这一时期政权党——统俄党——在地方议会中优势地位的逐步形成是同步的。

^① Andrew Konitzer,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p.226.

^② 我们将梅德韦杰夫任总统的4年也算作普京执政的时期，因为在这四年中，梅德韦杰夫基本仍沿着普京时期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施政，普京本人也仍然在当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

在政党政治方面，也作了新调整，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俄党的优势地位。2004年的《政党法》修正案，进一步提高了政党登记的门槛，并且只设置一年的过渡期。这使得现有政党的规模进一步被压缩，政党数量从2003年的44个缩减为2009年的7个。^①政党格局也得到了固定，因为筹建新政党成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此外，中央政权还直接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部分政党施压设限，或进行“定点清除”。^②

在地方选举层面，中央政权也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性的调整措施。首先，选举联盟被禁止。选举联盟在2004-2005年的地方选举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是政权党统俄党和同中央政权关系疏离的地方行政长官及其他规模较小的政党都借重的重要竞选工具。选举联盟因此一度成为区域性政党被禁后地方精英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使用的政党替代品。但随着统俄党实力的增长，其逐渐可以不再借助选举联盟的力量。反而是地方行政长官同其他政党结成的选举联盟，在这一时期的地方选举中表现抢眼，阻碍了统俄党在地方层面的进一步扩张。^③

其次是地方议会中完全比例代表制的兴起。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联邦主体选择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实行完全的比例代表制，至2010年，已有11个州转为完全比例代表制。部分联邦主体甚至开始在市政甚至农村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采用混合或完全比例代表制，而这一级别的选举当中往往并没有政党政治的传统。地方层面转用比例代表制的缺陷要更胜于联邦层面，这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非党途径，也根本扼杀了实力较弱的小党通过单席位选区进入地方议会的可能。

第三是地方选举委员会的构成与组织形式的改变。根据2005年颁布的第93号法案，政府官员和政党成员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比例限制，由原先的三分之一提升到了一半，且在国家杜马比例代表制部分获得席位的政党，拥

① Cameron 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s Regional Assemblie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3, p.438.

② Alexander Kynev, "Party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Regions: Competition of Interest Groups under the Guise of Parties", in *The Politics of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ed. Vladimir Gel'man and Cameron Ross, Burlington: Ashgate, 2010, p.141.

③ Cameron Ros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4, p.646.

有提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特殊地位。^①选举委员会内部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上级选举委员会拥有了任命下级选举委员会领导的权力，也就是说，中央选举委员会有权任命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而原先这一权力属于地方行政长官。^②这样的变动，使得政权党统俄党以及联邦中央对地方选举进程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第四是进入地方议会门槛的提高。2003 年推行强制半比例代表制时，大部分地方议会的得票率门槛设在 5%，只有少部分联邦主体设置在 7%及以上。2005 年出台的新办法明确规定，地方议会的得票率门槛最高只能设置到 7%。但从实际效果看，在这一规定颁布后，反而出现了一股提升得票率门槛的浪潮。截至 2010 年，有 46 个联邦主体地方议会的门槛被提升到了 7%，在全部联邦主体中已过半数。得票率门槛的普遍提升，很难被视为各地方政权孤立、自发的行为。^③门槛的提升能最大限度地将部分实力较弱、但在某些地区仍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小党挡在门外，彻底堵死他们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活动的通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有关地方议会选举的制度调整，有相当多采用的是突然袭击的方式，即，在选举开始前较短的时间内通过立法并立即执行。一般而言，一项新的选举办法，至少应在下次选举前一年投入实施，为参选各方提供相对充裕的适应调整和准备时间，但在俄罗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 2006 年 10 月至 2010 年 3 月举行选举的 65 个联邦主体中，只有 6 个是在选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1 июля 2005 г. N 93-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выборах и референдумах и и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② Cameron Ros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pp.646-647.

③ 以下两个案例或许可以揭示出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2007 年 10 月 18 日，新版《萨哈共和国选举法》颁布，其中议会比例代表制的得票率门槛被规定为 4%。但仅仅 3 周后的 11 月 8 日，萨哈共和国又通过了另一部法案，其唯一的内容就是将得票率门槛从 4%提升至 7%。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是什么力量能够促使该共和国匆忙修改刚刚制定的法律？科斯特罗马州的遭遇也许可以揭开谜底的一角。科斯特罗马州的得票率门槛是 4%，是仅有的三个初始得票率门槛低于 5%且之后也没有变动的联邦主体之一。但根据该州议员斯韦特兰娜·沙克琳娜的说法，总统办公厅的官员向他们打招呼，要求提高门槛，她本人接到过四个这样的电话，参见 Arkady Lyubarev, "Electoral Legislation in Russian Region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3, pp.420-421.

举前一年以上修改选举规则，有 27 个联邦主体是在选举前一个月内对选举规则进行修改。更有甚者，秋明州和罗斯托夫州曾经在选举前 5 天修改选举规则，莫斯科州则是在选举前 3 天进行规则修改，公然违背了要求变动选举规则的法律至迟需在生效前 10 天公布的联邦法律。^①这种在下届议会选举开始前才临时修改选举规则的方法，其最大受益者只可能是事先知情、并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在当届议会占多数的政党。他们通过这种手段，进一步获得了对其他政党的优势。

通过上面对这一时期俄罗斯各项有关地方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调整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时期中央政权调整的逻辑是清晰的。即，一方面中央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将现有的由政权党、政权卫星党和体制内反对派政党组成的相对可控无害的政党格局固定下来，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难以控制的反对派政党进入联邦中央和地方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则压缩其他政党的生存空间，限制其在地方的政治参与，为统俄党在地方议会活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完成之后，中央政权通过将地方行政长官批准权交给议会，提名权逐步交给政党，以制度设计的方法使政党开始站在地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自此，联邦中央终于拥有了自己干预地方政治的工具——统俄党，并实现了对地方政治的介入。这一系列调整可谓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二）统俄党的兴起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转变

政权党统俄党的兴起及其逐步在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长官两方面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是 2004-2011 年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治发生的最重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是当时俄罗斯中央政权一系列政策调整的直接结果。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依然从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两个角度，对统俄党的优势地位进行分析。伴随着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的取消和中央政权对统俄党投入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长官加入了统俄党。在 2003 年 12 月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有 27 个州长同意被列入统俄党的政党名单，但其中正式党员仅有 15 人。在别斯兰事件发生的 2004 年 9 月，有

^① Arkady Lyubarev, "Electoral Legislation in Russian Regions", p.425.

23 名州长为统俄党党员。^①但随后，这一数字急剧攀升，到 2005 年 10 月，超过半数的地方行政长官加入了统俄党，至当年年末，这一数字进一步提高到 67 人。至 2010 年 10 月，俄罗斯 83 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行政长官中只有 6 人不是统俄党党员，而其中有 2 人公开支持统俄党。下图可以为我们更为直观地展示这一时期统俄党地方行政长官数量的变化情况。通过这一系列数据的列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普京第二任期，统俄党强势介入俄罗斯地方政治，统俄党地方行政长官数量节节攀升，并最终控制了俄罗斯绝大多数的联邦主体。从地方行政长官的维度说，统俄党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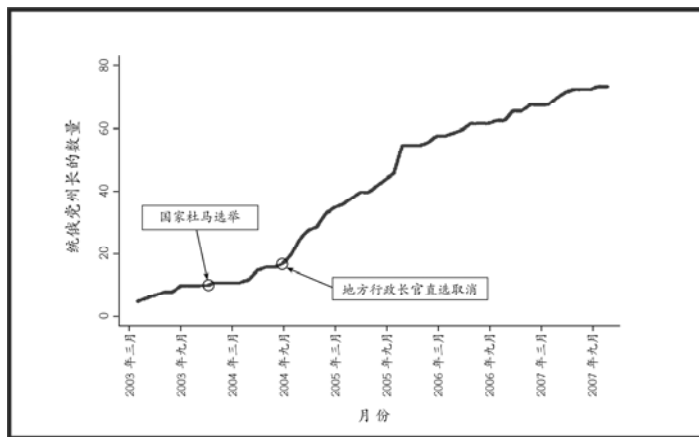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07 年统俄党地方行政长官的数量变化

图表数据来源 Ora John Reuter, “The Politics of Dominant Party Formation: United Russia and Russia’s Governors”.

地方立法机关方面呈现出基本相同的情况。首先我们看统俄党一党的表现。图 2 详尽统计了 2004-2010 年统俄党在各联邦主体地方议会中所占席位的变化。从 2004 年到 2010 年，统俄党席位过半的地方议会数量从 20 个攀升到 82 个，仅在圣彼得堡未能过半；席位达到三分之二的地方议会则由 8 个攀升到 62 个。可以说，在 2004-2010 年的 6 年间，统俄党已经彻彻底底

^① Ora John Reuter, “The Politics of Dominant Party Formation: United Russia and Russia’s Governors”, *Europe-Asia Studies*, 2010, Vol.62, No.2, p.209.

地掌控了全俄的地方议会。而从地方议会中的党员结构看，统俄党的优势也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议会的 3899 名议员中，统俄党党员有 2845 人，占全部议员的 73%。排名第二的俄共议员仅有 401 人，占 10.3%。公正俄罗斯党议员 286 人，占 7.3%。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员 161 人，占 4.1%。这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个大党的情况，其他一些小党的情况更加糟糕：爱国党仅在 7 个联邦主体有议员，共 22 人；正义事业党仅在 2 个地方议会内各有 1 名议员，亚博卢则无一人当选。^①结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统俄党在地方立法机关内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其他党派尽管也参与了地方议会，但这种参与仅仅是形式上的，即使是叶利钦时期一度在几个联邦主体拥有本党行政长官的俄共，此时在地方的势力也被扫荡殆尽，基本失去了同政权抗衡的实力和活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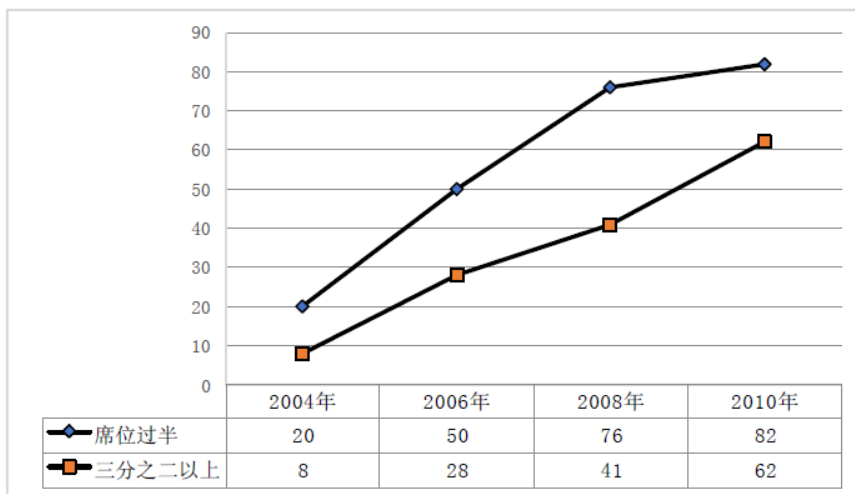


图 2 2004-2010 年统俄党在地方议会所占席位情况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 Graeme Gill, James Young,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Routledge, 2012.

^① Cameron 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s Regional Assemblies”, p. 446.

普京时期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权党统俄党的兴起，使得这一时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首先，相较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处于边缘位置、仅扮演龙套角色的叶利钦时期，这一时期政党得益于联邦中央的制度设计，得以至少在形式上开始在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2003年强制推行混合选举制的改革，使政党能拥有地方议会的半数席位；从之后的实践情况看，独立候选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地方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都来自政党。而在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过程中，议会作为政党的主要活动平台，被赋予了批准总统对地方行政长官提名的大权，而政党则逐步掌握了向总统推荐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力。这与叶利钦时期地方行政长官选举过程中政党影响力的微弱，形成了强烈对比。

以政党整体为视角考察这一时期其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政党参与地方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明显提升，得以从地方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从“龙套”转变为“主角”。但是，政党的这种“主角”地位只是一种表象，地方政治中的政党实际上转变成了政权的“傀儡”。首先，政党对地方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基本上是统俄党的“独角戏”，对于其他政党来说，他们在地方政治中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提升非常有限，仍然处在地方政治舞台的边缘位置。俄共在地方的影响相较叶利钦时期更是大幅下降。当然，这同其在联邦层面，尤其是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表现也是相一致的。其次，由于这一时期政权对政党政治的规制和调节，统俄党以外能够存活下来的政党，或者本身就是政权的卫星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或者受到政权巨大压力不得不成为“忠诚的反对派”（俄共）^①，实际上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为中央政权所控制。至于统俄党本身，则成为中央和地方政权手中的工具。对于统俄党这种工具性质的详细分析，将在后文完成。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政党得益于制度调整，得以由地方政治舞台上的“龙套”转变为“主角”，但实际上，伴随着政权对政党政治的规制和统俄党的兴起，在地方政治中活动的政党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中央政权的“工具”。

^① Vladimir Gel'man,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6, pp.913-930.

（三）统俄党的“工具”性质

统俄党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其是一个政权党。目前在学术界，政权党是一个尚未得到公认的概念，但一般而言，是指那种政权为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而创设的支持自己的政党。政权党同其他政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同权力的关系。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党，党与权力的关系都是党产生权力，权力来源于党，党掌握政权（尽管在不同政体中其方式有所不同）。而对于政权党（统俄党）来说，其同权力的关系是党来源于权力、依附于权力，为政权所掌握。这种与权力的反向关系，是理解政权党性质的关键所在。具体到俄罗斯和统俄党，这种倒错的权力关系反映在俄罗斯学者格尔曼概括的统俄党三大特点当中。^①

其一是统俄党的外部治理性，即党的核心领导权并不在党内。统俄党权力机关的工作仅限于处理党的日常性、行政性的事务。真正拥有对重大战略性、政治性问题决策权的，是以总统办公厅为具体表现形式的中央政权。统俄党类似于一家管理层不持股的公司，公司的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做出，公司的高管可以轻易地被实际持股的董事会更换。这种外部治理性，是组织社会学意义上统俄党同政权关系的清晰反映。

其二是统俄党缺乏属于自己的、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统俄党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同中央政权及普京保持一致，很少提出本党的观点，更多的只是中央政权用以宣传自己意识形态的工具。2007年杜马选举前，统俄党的口号是“投票给普京的计划”（Голосуй за план Путина），而对“普京的计划”具体是什么，则避而不谈。2009年，统俄党将“保守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意识形态，这也只是对当局提供的意识形态产品的一种被动接受。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统俄党这种去意识形态化、中派路线的策略，本身也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第三个特点，也是最能反映其地位的特点，是统俄党在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所处的次要位置。俄罗斯宪法的制度设计，意味着议会多数党没有组阁权。而统俄党也没有能够额外同政权或政府建立起机制性的联系，它们之

^① Vladimir Gel'man,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间的关系是疏离的。总统方面，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期间始终与统俄党保持着距离。普京更是选择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 2018 年的总统选举。政府方面，以普京第三任期的新政府为例，总统办公厅的 32 个部门首长中，只有两名统俄党最高委员会成员，7 名副总理和 17 名部长中各只有 3 人是统俄党最高委员会成员。^①而且，这些统俄党籍阁员获得所在职位的原因是其同总统的关系，而非同统俄党的关系。他们的被任命与其统俄党成员身份并没有关系。在政权的决策过程中，统俄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很难参与进来，但政策出台后却必须拥护，并为政权分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因此可以说，在俄罗斯的政治过程中，统俄党基本上是一个次要的、工具性的角色。结合统俄党与政权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外部控制性、弱意识形态性、在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次要性三个特点，我们可以认为，统俄党更多的是起到选举动员和控制议会的工具性作用。

以上对统俄党的讨论是从联邦层面出发，那么统俄党在地方同地方政权有着怎样的关系？其何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横扫全俄，并在几乎全部联邦主体内确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下面我们即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统俄党在地方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来源于中央政策调整下地方行政长官自身的策略考量。地方行政长官与统俄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造成其关系演变的核心变量，是央地的实力对比、政权本身对统俄党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双方互动策略的变化。美国学者路透（Ora John Reuter）认为，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作为政权党建设方的政权和作为政权党参与方的地方精英之间的可信承诺问题。即，地方精英需要确认政权有足够的诚意和实力投入到政权党统俄党的建设中去，从而使他们有利可图；政权则需要确认地方精英不会背叛统俄党。而可信承诺的形成基础，在于双方实力的相对平衡和双方各自清晰、明确的意思表示。^②在普京第一任期，央地实力对比的天平偏向于地方行政长官一方，他们仍然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手握大量的

① Sean P. Roberts, “United Russia and the Dominant-Party Framework: Understanding the Russian Party of Powe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28, No.3, p.231.

② Ora John Reuter, *The Origins of Dominant Parties Building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行政资源。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地方行政长官加入统俄党，但这部分地方行政长官往往自身实力偏弱，因此才选择投身统俄党。而本时期政权对统俄党的态度并不明朗，出现过统俄党支持的候选人没有获得总统办公厅首肯和背书的情况。到普京第二任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普京执政四年后，国家能力得到恢复，得益于国际油价上涨，中央政权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大大增加；本时间段内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禁止选举联盟和地方性政党的制度调整，大大削弱了地方行政长官在地方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地方议会的控制能力。这种客观现实，迫使他们寻求同统俄党的合作。但这种央地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远未达到颠覆性的程度。此时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多植根当地多年，形成了自己的庇护网络和政治机器。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政府工程、税收优惠和政府津贴等手段，对地方工商业活动及企业主有很强的影响力，进而形成了对相关企业雇员的选票动员能力。而在财政供养人员方面，地方行政长官则通过其拥有的对地方行政机关官员广泛的任命权进行控制。总体而言，地方行政长官与地方精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庇护关系。地方行政长官的受庇护人，通过庇护关系可以获得在经济和职位升迁等方面的好处，同时以其自身的资源确保其庇护人的执政地位。^①从 2003-2004 年举行的本时期最后一轮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对这批地方行政长官的成色有一个直观的把握。本轮举行的 45 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有 9 场现任地方行政长官未参选，5 场败选，其余 31 场选举中时任地方行政长官均获得连任，可见当时地方行政长官对地方政治拥有高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正因为地方行政长官仍拥有较为雄厚的选举动员能力和对地方广泛而有效的影响力，政权选择同他们进行合作。具体方式是邀请他们加入统俄党，并在选举中为统俄党进行动员、背书，而回报则是获得普京的再次任命以及在转移支付、国家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偏袒。这一时期，相当数量的地方行政长官受到两届的任期限制，即将面临下台的困境。而新的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实行，意味着他们的任期将得到重新计算。同时，地方行政长官也感

^① Ora John Reuter, "Regional Patrons and Hegemonic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3, Vol.29, No.2, pp.101-135.

受到了央地实力对比的变化和普京规制地方的决心及相应措施。他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不如合作。因此，废除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并没有碰到来自地方行政长官方面太大的阻力。

从实际情况看，地方行政长官同统俄党的合作经历了一个过程。根据路透的研究，决定地方行政长官加入统俄党先后顺序的核心因素，是地方行政长官自身拥有资源的多少。他发现，具有庇护网络复杂、执政时间长、上次大选中表现出色、民族地区这四种属性的地方行政长官，往往比其他行政长官更晚加入统俄党。^①由此可见，统俄党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席卷各联邦主体，是因为地方行政长官在中央的压力和诱惑下，选择了同中央合作。叶利钦时期和普京第一任期“地方强中央弱”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影响了地方行政长官同中央互动的策略选择。由此，地方行政长官开始“带艺投师”。统俄党这一时期在地方的优势及抢眼表现，既来源于中央调控措施对其他政党的压制，也来自地方行政长官资源的加盟，且发挥更多作用的是后者。^②一个反映统俄党与地方行政长官实力对比的例证是，在这一时期，当统俄党地方分支的领导人同地方行政长官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统俄党地方分支领导人被调走，换上地方行政长官满意的人选。^③安德烈·瑞斯金（Andrei Riskin）针对这种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政权党来说，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远比一打忠诚的党员重要”。^④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站在地方政治舞台中央的看似是统俄党，实际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地方行政长官及其庇护网络，只不过套上了统俄党的外壳。

统俄党在地方议会的活动，则反映出其同地方行政长官以外的地方精英的关系。随着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变，地方议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统俄党在部分联邦主体议会选举的比例代表制部分

① Ora John Reuter, “The Politics of Dominant Party Formation: United Russia and Russia’s Governors”, *Europe-Asia Studies*, 2010, Vol.62, No.2, p.209.

② Ora John Reuter, “Regional Patrons and Hegemonic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③ Darrell Slider, “How United is United Russia? Regional Sources of Intra-Party Conflict”,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10, Vol.26, No.2, pp.257-275.

④ Andrew Konitzer,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pp.221-222.

中，推出由地方行政长官领衔的名单，并获得上佳效果。另一方面，则开始吸纳以地方大型企业领导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和以首府和重要城市市长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但这种对地方精英广泛吸纳很快带来问题。地方精英背后各集团的利益争端，并不随着他们加入统俄党及统俄党的胜选而消失。统俄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精英利益纠纷的协调平台，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功能的发挥是有限的。统俄党在地方议会的统治地位，使得地方派系之间的斗争由政党间转变为政党内。同时，在统俄党地方分支内也开始出现党内派别活动，而在地方次一级的市政或其他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则开始出现统俄党的内部分裂、本党候选人自相残杀的情况。^①因此，从表面上看，统俄党通过将地方实力派精英吸纳入党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对地方各级政权的占领。但实际上，由于组织建设的薄弱和政党自身资源的匮乏，政党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吸纳入党的精英进行整合和利益协调，原先地方政治中以党际形式出现的斗争转入党内，体现为党内的派别斗争，地方政治的形态发生了转变，内容却没有变化。统俄党看似控制了地方各级政权，实际上不过是一具没有实际内容的空壳。

通过以上对统俄党同中央政权、地方行政长官、地方精英三方面关系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统俄党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政治实体。在联邦层面，其作为政权党，所有重大决策都受到来自党外政权的控制，缺乏自己的政策主张，是政权的“复读机”和“传声筒”。在地方层面，一方面，其取得的选举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其合作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资源；另一方面，其通过大规模吸纳地方精英的方式，取得了在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优势。但这些精英没有能得到有效整合，反而将原先的矛盾带到了党内。统俄党在地方的活动，不过是为原先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各势力的活动罩上了统俄党的外壳，其实质并没有多少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统俄党只是各方用于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联邦层面受中央控制，地方层面则主要为地方行政长官所操纵。

^① Alexander Kynev, “Party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Regions: Competition of Interest Groups under the Guise of Parties”, in *The Politics of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Russia*, ed., Vladimir Gel'man and Cameron Ros, Burlington: Ashgate, 2010, pp.146-147.

四、地方政治中政党格局的常态化 ——2012年以来的制度调整与政党活动

（一）制度的新调整

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启之际，看似平静的俄罗斯政坛实则暗潮涌动。当局在此前12年内形成的一整套曾经行之有效的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需要进行调整。中央政权这一时期做出的调整是多方面的，但限于本文“地方政治”和“政党政治”的主题，我们主要对这两方面的改革进行论述。当然，事实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领域的主要变化，也确实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政党制度方面，这一时期建党门槛被大幅降低。2012年的《简化政党登记手续法案》将登记政党的党员最低人数，由4万人降至500人。^①改革的直接后果是政党数量大幅度增加。在司法部登记的政党由2011年12月的7个急剧增长至2015年9月的78个。政党改革既回应了社会的呼声，释放了之前一个时期积攒的政治压力，又分化了反对派的力量。同时，通过允许他们建党，进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也可以起到对这些反对派的言论和行为的规制作用。

从2013年起，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固，当局又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再次加强对选举进程的控制，以抵消2012年政党改革带来的部分不利影响。俄罗斯学者将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称为“反改革”。^②例如，2014年5月，政党名单中候选人征集提名签名的制度被恢复，在地方层面的选举中，其门槛被设置在该联邦主体总人口的0.5%（尽管这一要求比上次实行此项制度时的要求低了1.5%），而对单席位选区候选人提名签名数量的要求则由0.5%上升至3%。尽管这样的签名数量要求仍不算高，但重新设置签名的要求本

① 转引自李永全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② *Партий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контрреформа 2012-2014 годов: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д ред. Н.А. Борисова, Ю.Г. Коргунока, А.Е. Любарева, Г.М. Михалевой;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акультет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исслед. Комитет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му изучению партийных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Москва: «КМК», 2015. С.90.*

身，就再次为政权提供了进行干预和操作的空間。因为借口候选人签名存在问题而拒绝为其进行选举登记，正是各级政权在选举中排除其不满意或有威胁的候选人的常用手法。^①这表明，尽管降低了建党门槛，也确实出现了大量新建政党，但这些政党想参与政治生活仍然困难重重，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对那些有可能威胁到统俄党选票的新政党，更是被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限制。这些改革措施对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制度方面，这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的恢复。2012年的《直接选举地方行政长官法》规定：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由政党提名或个人自荐，然后由当地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者须征集支持者签名，签名数量须达到该联邦主体总人口的0.5%—2%，具体比例由各州自行决定；如无候选人获得50%以上选票，则举行第二轮选举。

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尽管被恢复，但中央政权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央地关系仍在其掌控之中。首先，新地方直选制中设置了三道“过滤网”。第一道是对联邦主体内居民签名的收集，尽管数额不高，但对一些资源较少的小党来说已经形成一道障碍。并且当局可以通过操控地区的选举委员会判定签名征集存在问题，进而不予登记，阻止相关候选人参加角逐。第二道是“市政过滤器”，即对市议会会议员信任签名的要求。由于统俄党此时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有的优势以及地方行政长官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控制，如无当局的

① 根据亚历山大·基涅夫统计，在2014年的选举中，有28.2%的候选人被拒绝登记，在2015年的选举中有20.7%的候选人被拒绝登记。他收集的另一组数据或许可以揭示出其中多少人被拒绝登记与签名收集有关：那些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达4%因而无须征集签名的政党的候选人，在2014年和2015年的选举中分别仅有3.9%和2.1%被拒绝登记。对于那些需要征集签名的政党的候选人，这一数字竟高达74.2%和89.4%。戈洛索夫则注意到，在2017年地方立法机关选举的55份提名名单中，有10份因签名收集问题被拒绝登记。分别参见Yury Korgunuk, Cameron Ross, Sergey Shpagin, “Party Reforms and the Unbalancing of the Cleavage Structure in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2012-2015”,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Vol.70, No.2, pp.156-157 和 Grigorii V. Golosov, “Russia’s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Disguise of Democratic Federalism: Evidence from the September 2017 Sub-National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2018, Vol.21, No.3, p.239.

授权，统俄党以外政党的候选人很难通过这道过滤器。^①因此，政权不满意或可能对统俄党背景的候选人构成威胁的候选人，往往都被挡在了这一关。最后则是“总统过滤器”，总统可以对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提出质疑。此外，2013年3月，当局又出台了《关于联邦主体自行决定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方式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各联邦主体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通过直选方式产生地方行政长官，如不实行直接选举，则进入联邦主体地方议会或国家杜马的政党，有权向俄罗斯总统提名本党三名地方行政长官的人选，总统可以从中挑选出三名候选人交地方议会审议，再由地方议会从中选出一人作为该联邦主体的地方行政长官。^②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和之前并无太大差异，只不过将推荐候选人的权利，从地方议会第一大党扩大到地方议会和国家杜马内的所有党派。这一制度更多地在民族共和国得到实施。除了以上制度性手段外，普京还采取了一些技术性手段，以防止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直选恢复前，普京利用自己拥有的合法权力，集中撤换并重新任命了一批任期即将届满的地方行政长官，使他们可以不用参加迫近的选举，能有一个任期的时间进行调整和准备。正因为有上述各项制度设计和举措，使得当局在面临政治压力、仓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对地方政治进程的控制力，维系了地方层面的政治稳定。

（二）普京第三任期：既有格局的延续

在普京第三任期，尽管发生了2011-2012年的政治风波，并随之进行了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地方行政长官产生制度等方面的调整，但统俄党仍然牢牢保持着其在地方的统治地位。普京第一、二任期和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时期形成的地方政治中统俄党独大、其他体制内反对派政党作为陪衬的政党格局，非但没有削弱，在普京第三任期还有加强的趋势。

从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来看，2012-2017年，俄罗斯共举行了95场，统俄党提名的候选人或身份为统俄党党员的候选人获胜的为89场，占总场

^① Helge Blakkisrud, "Governing the Governors: Legitimacy vs. Control in the Reform of the Russian Regional Executiv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5, Vol.31, No.1, pp.104-121.

^② 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0-121页。

数的 93.7%。其中统俄党胜选但得票低于 65%的仅有 21 场，占总场数的 22.1%。其他党派胜选的只有 5 场，且都是在统俄党没有推出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在这 6 年间的 95 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里，统俄党参加且败选的只有 1 场，即 2015 年统俄党在伊尔库茨克州败给了俄共候选人谢尔盖·列夫琴科。应该说，尽管普京第三任期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但统俄党仍然维持了之前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绝对控制。

表 4 2014-2018 年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情况

年份	总场数	统俄党胜选	统俄党胜选 但低于 65%	统俄党败选	其他党派胜选
2012	5	5	1	0	0
2013	8	7	3	0	1
2014	32	29	6	0	3
2015	24	22	4	1	1
2016	9	9	3	0	0
2017	17	17	4	0	0
以上总计	95	89 (93.7%)	21 (22.1%)	1 (1.1%)	5 (5.3%)
2018	22	15 (68.2%)	7 (31.8%)	3 (18.2%)	2 (13.6%)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从地方立法机关选举来看，2012-2017 年，俄罗斯共举行了 92 场，统俄党在全部 92 场选举中都取得了议会半数以上席位，并在其中的 86 场赢得了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约占全部场数的 93.5%。从这一时期全部议席中统俄党议员的占比看，普京第三任期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统俄党议员占据了全部议员的 81.5%，俄共议员占 8.4%，自由民主党议员占 5.9%，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占 4.6%，其他政党议员总共占 1.8%。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一时期政权大幅降低了建党门槛，也出现了不少新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在地方立法机关选举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统俄党仍然保持着对地方议会的绝对控制，俄共、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在地方议会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反对党在全部的议员中占比超过 10%，其在地方议会中所起的作用，基本是点缀、陪衬及显示政治竞争性尚存。

表 5 2014-2018 年几个主要政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席位情况

年份	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共产党	自由民主党	公正俄罗斯党	其他党派	议会内议员总数
2012	305 (82.7%)	27 (7.3%)	7 (1.9%)	8 (2.2%)	8 (2.2%)	369
2013	637 (77.2%)	73 (8.8%)	32 (3.8%)	36 (4.4%)	26 (3.2%)	825
2014	560 (82.4%)	43 (6.3%)	25 (3.7%)	16 (2.4%)	9 (1.3%)	680
2015	371 (80.5%)	39 (8.5%)	20 (4.3%)	24 (5.2%)	2 (0.1%)	461
2016	1314 (75.0%)	157 (8.9%)	153 (8.7%)	96 (5.4%)	12 (0.7%)	1763
2017	241 (78.0%)	24 (7.8%)	10 (3.2%)	12 (3.9%)	13 (4.2%)	309
2012-2017 总和	3428 (77.8%)	363 (8.2%)	247 (5.6%)	192 (4.4%)	70 (1.6%)	4407
2018	472 (59.90%)	157 (19.92%)	78 (9.9%)	48 (6.09%)	20 (2.5%)	788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表 6 2014-2018 年统俄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席位情况

年份	总场数	统俄党占半数以上	统俄党占三分之二以上	统俄党占半数以下
2012-2017	92	92 (100%)	86 (93.5%)	0 (0%)
2018	16	12 (75%)	4 (25%)	4 (25%)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因此，在 2018 年选举之前，统俄党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和绝大多数地方立法机关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席位，可以说同 2004-2011 年统俄党在地方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太大区别。从 2014-2017 年的地方议会选举结果看，甚至有优势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建党门槛的降低和地方行政长官直选制度的恢复，没有冲击原先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格局。原因既在于中央政权对统俄党的大力支持，也在于其出台的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俄罗斯地方的政治机会结构^①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统俄党以外的政党，仍然难以在地方政治中有所作为。这些政党本身也在参与地方政治的过程中，受到当局强有力的规制，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还需要主动配合当局在地方的政治安排，可以说是进一步“傀儡化”了。统俄党本时期尽管在自身建设上有所发展，但其依附于政权的基本属性没有发生任何

^① 政治机会结构是社会运动理论的一支。其侧重于研究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运动参与者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强调法律政策的变动、政治制度、精英的同情等如何影响抗争者的行动策略、抗争潜力、抗争频率和组织形成等。

改变，也仍然是政权的傀儡。因此可以说，本时期地方政治舞台上的绝大多数政党，仍然是由政权操控的傀儡。当然，这也是同普京第三任期，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活主题的转变相联系的。从 2013 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进一步加强。当局加大了对反对派和体制内其他政党的政治压力，加强了对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的控制，以求确保对局面的掌控。在控制性加强的总主题下，央地关系和政党政治都进行了新的、更有利于中央政权的调整。尽管 2018 年的地方选举出现了风波，但也不过是舞台上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体制内反对党人员进入了舞台中央，他们仍然受到中央政权的制约。总体上看，地方政治中统俄党一家独大、其他体制内反对党作为陪衬的格局，没有改变。

（三）普京第四任期开启以来地方政治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从 2018 年和 2019 年举行的两场地方选举来看，俄罗斯地方政治在普京第四任期开启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在 2018 年的地方选举中，联邦中央和统俄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体制内反对党则意外成为统俄党失利的受益者。在当年进行的 22 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有四场原任地方行政长官遭遇失败，其中三场选举是统俄党候选人被击败。自 2012 年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恢复以来，统俄党仅被击败过一次。此次击败统俄党的候选人，分别来自俄共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他们自身并没有雄厚的背景和地方支持，甚至在大选前都没有被视作统俄党候选人的威胁，其成功当选得益于本次选举出现的“抗议性投票”现象。投票者为表达对当局及其化身统俄党的不满，将选票投给了任意的非统俄党候选人，而与该候选人本身的情况无关。^①在 16 场地方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在哈卡斯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四个联邦主体的议会中席位未能过半，这是整个普京第三任期都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另外 12 个联邦主体议会中，只有 4 个议会统俄党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与普京第三任期统俄党在 93.5% 的议会占有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反差。从总选票数来看，统俄党仅获得 38% 的选票；单席位选区方

^① Andrey Pertsev, “Depoliticization in Russia: The Growth of the Protest Vote”, 14. 09. 2018,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7254>

面，统俄党获胜的比例从 2015-2016 年的 92%、2017 年的 87%，下降至 2018 年的 72%。与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情况相似，几个体制内反对党（尤其是俄共），是统俄党败局的最大受益者。尽管统俄党在 2018 年遭遇失败，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政党格局。绝大部分州长仍然来自统俄党，当选的非统俄党州长也都来自俄共、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这三个体制内政党。这些政党或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政党，或是政权的卫星党^①，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规制，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扮演”反对派角色。虽然在养老金改革爆出后各反对派政党都表现活跃，但在此次地方选举之前，他们都非常“识趣”地做了一些“配合”统俄党的安排：包括主动撤换或不提名较有竞争力的本党候选人，而换上籍籍无名、资源较少的候选人等。^②此次俄共和自由民主党的成功，并不代表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们的成功完全来自于民众对统俄党的愤怒和失望，民众选择他们，是延续 2011 年“投给统俄党以外的任何政党”这一策略的一种无奈选择。

2019 年 9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反映出俄罗斯政党政治可能的变化趋势。尽管选前在莫斯科和俄罗斯部分城市出现了一些风波，但从最终结果看，政权基本没有重蹈 2018 年地方选举的覆辙，实现了对地方选举进程的重新掌控。具体来说，在 2019 年举行的 19 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俄联邦中央政府推出的候选人均顺利当选，没有被拖入第二轮选举的情况。在 13 场地方议会选举中，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外，政权党统俄党在其他所有地方议会中均获得多数席位。在备受关注的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统俄党背景的候选人赢得 45 个席位中的 26 席，相较 2014 年下降了 12 席，俄共席位由 5 席升至 13 席，公正俄罗斯党和亚博卢各赢得 3 个席位。

单从结果来看，本次地方选举似乎又回到了普京第三任期时的经典模式。但是在具体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本次选举中，

^① Vladimir Gel'man,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Vladimir Gel'man,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Russia: 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2, pp.177-191.

^② 关于这种操作的具体案例，参见《俄罗斯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吴德堃：“垂直权力体系下的俄罗斯地方治理——以 2018 年地方选举为视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92-110 页。

部分联邦主体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去政党化”现象。2018年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公布后，统俄党的支持率就不断下滑。因此在本次选举中，不少统俄党候选人隐藏了自己的政党背景，转而以独立候选人的面目参加选举。甚至部分参加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代理州长，也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现。部分联邦主体也在政策上做出调整，扩大了以单席位选区形式产生的议员数量。在莫斯科市地方议会选举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统俄党没有提名任何候选人的现象。市长索比亚宁甚至直接表示，不希望统俄党提名候选人。最终，统俄党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也选择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不过，从莫斯科市地方议会选举的实际结果看，纳瓦尔内设计的“聪明投票”（smart vote）策略^①，有力地对冲了统俄党候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策略。反对派在选前识别出了所有的统俄党背景候选人，并给出了相应的非统俄党候选人选项。

这样的“去政党化”现象，可能是俄罗斯政党格局调整的一种预兆。统俄党为不得人心的退休年龄改革承担了全部责任，形象受损，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严重下降。这样的统俄党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局的负资产。统俄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更像是政权执掌权力的工具和制度安排。在本文结论部分我们会谈到，俄罗斯独立以来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安排，出于巩固政权控制能力的目的，在反复地进行变动、调整。因此，统俄党这一制度安排也面临着被调整、甚至被抛弃的可能。有分析人士在选前就指出，统俄党这一苏尔科夫的产物，逐渐不再适应基里延科技术官僚和公司治理式的政治调节，面临着“全俄人民阵线”式“人亡政息”的可能。^②英国俄罗斯问题学者山姆·格林更是在选后直言，统俄党将被普京放弃，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可能成为政权依赖的新政党。^③

政党格局调整的另一表现，是政权对体制内反对党的进一步规制。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由于民众的抗议性投票，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共收

① 这一策略是指，反对派识别出隐藏自己政党身份的统俄党候选人，并在选前一段时间向曾在反对派网站登记过的选民发送信息，以此种方式使统俄党候选人败选。

② Andrey Pertsev, “Kremlin’s Rejection of United Russia is Rejection of Politics Itself”, 16.07.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9505>

③ Sam Greene, “United Liberal Democratic Russia?”, 09.09.2019, <https://moscowonthames.wordpress.com/2019/09/09/united-liberal-democratic-russia/>

获了意外之喜。但随之而来的是当局对他们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典型例证就是 2018 年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格鲁吉宁的遭遇：尽管他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对政权的忠顺，但其仍受到了政权的压力。2018 年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战胜统俄党的体制内政党候选人，也不断被政权施压^①，尽管他们的当选并非自己积极争取的结果，而完全是抗议性投票的产物。

俄罗斯政党格局的可能变化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一方面，统俄党恶劣的政治形象，的确可能成为当局的包袱，其作为政权政治调节手段的地位将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另一方面，在之前的十多年中，中央政权为统俄党投入了大量资源，将统俄党建成了目前俄罗斯规模最大、政治影响力最强、组织建设最完善的政党。这与“全俄人民阵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央政权不会轻易放弃统俄党这个普京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因此，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之前俄罗斯当局对统俄党的“品牌重塑”甚至“重组”等动作，有可能是下一步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风向标”。统俄党的困境对体制内反对党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在“人在家中坐，票从天上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客观上确实得到了增长。忧在与自身影响力增长相伴的，可能是政权更高强度的规制和政治压力。如何在统俄党实力相对下降的机遇中争取政权的倚重、利用而非打压，是目前几个体制内反对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五、选举威权主义的全国化与政党角色的转变逻辑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普京时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和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我们将其称为政党的“傀儡化”。这样的角色转化，从本质上说，是俄联邦中央通过统俄党的建设和其他一系列举措，从而实现对方行政长官的控制、对地方政治的规制以及对央地关系的重构，正符合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选举威权主义政体^②自身的运行逻辑。

^① Andrey Pertsev, “Kremlin Scapegoat: Russia’s In-System Opposition under Attack”, 09.04.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8813>

^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威权这一词汇在本文中并不附有任何价值判断，仅用于指代政治进程中体现出某些相似特点的一类政体。

2002年起，随着托马斯·卡瑟罗斯宣布“转型范式的终结”，学界对混合政体的研究逐渐提上日程，选举威权主义正是混合政体中的一种。^①在选举威权主义政体中，尽管定期举行并非虚假的选举，但这些选举在政权或现任政府的影响下，并不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和公平标准，进而导致现政权可以在选举中反复获得胜利。^②具体手段包括制定歧视性的选举规则，排除反对党和候选人进入竞选舞台，侵犯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强迫或引诱他们放弃反对派的立场，或者通过选举舞弊重新分配选票和席位等。^③与传统的威权主义政体不同，选举威权主义政体的矛盾在于，其合法性需要获得一场真实选举的确认，尽管政权可以在选举中利用自身的资源营造一个不利于对手的并不公平的选举环境。换言之，在俄罗斯，选举是为了赋予现政权合法性，而不是为了政府的更替。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在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因此，选举威权主义政体延续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政权的力量在选举中获得理想的结果。

叶利钦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本身的孱弱，其自身不具备充足的实力进行高强度的选举干预，只能通过政治交易在部分亲总统的联邦主体内，使用当地地方行政长官的政治资源进行助选。因此，在联邦层面的政治中体现出了较多的竞争性。在中央无力干预的情况下，地方层面的选举体现出非常明显的选举威权主义，甚至传统威权主义的色彩。在任行政长官大肆使用行政资源为自己一方助选，而在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中也存在很多不规范行为。格尔曼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次国家威权主义。^④这一时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边缘地位，正是这种以体制内精英为核心的地方选举威权主义的直接结果。但这种威权主义并不具有全局性意义，联邦层面的选举当中仍然存在体制性的不稳定因素。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使用地方行

①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1, pp.5-21.

② Yonatan L. Morse, “The Era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World Politics*, 2012, Vol.64, No1, pp.161-198.

③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6, p.3.

④ Vladimir Gel'man, “The Dynamics of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Russian Politics & Law*, 2010, Vol.48, No.2, pp.7-26.

政长官手中的政治机器和其他资源。从 1999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和 2000 年的总统选举看，已经出现了地方行政长官联手、试图对联邦层面政治进行干预的现象。这对中央政权确保自己的权力是非常不利的。

普京时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角色的转变，既是全国层面选举威权主义体制建设的手段，同时也是这一体制建成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俄联邦中央以制度设计的手段，使政党得以在法律和制度上居于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政权一系列政策调整措施和直接的政治压力之下，原先居于舞台中央的地方统治集团不得不同中央合作，形式就是支持作为中央政权工具的统俄党。但是由于地方统治集团仍然握有的大量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统俄党也成为他们的工具。换言之，政党角色的变化，反映的是普京时期央地关系的重构。统俄党既是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权同以地方行政长官为代表和核心的地方统治集团构建稳定的合作与共谋关系的平台，从而在央地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枢纽性的作用。普京之所以如此重视地方政治和央地关系，就是在选举威权主义中，政权需要通过地方政权的政治动员和其他操作，获得理想的全国选举结果。普京时期当局在联邦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中做出一系列调整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在地方政权掌握动员选票能力的情况下，使绝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和实力派地方精英只能同政权党统俄党进行合作，以彻底剥夺其他政治势力利用地方政权能力的机会。最终，政权党统俄党的建设为整合地方精英、实现央地制度性互动搭建了平台，中央政府得以更为稳定地获取到地方精英手中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也就是说，这种央地关系重构的实质，是将原先仅具有地方意义、不稳定地为联邦中央政权服务的地区性选举威权主义，转变为全国性的选举威权主义。

因此，俄罗斯选举威权主义政体的形成过程，在联邦层面是依赖统俄党，在地方层面则是依赖与地方政权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又正是围绕着统俄党所展开的。政党在地方政治中作用的演变、地方政治生态的变迁，以及央地关系的调整与重构，这三个方面正是这样环环相扣，在事实与逻辑两个维度，与选举威权主义在俄罗斯从地方向全国的转变联系在了一起。

结 语

在结语部分，我们尝试着回答第三个问题，即从政党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当中，反映出独立以来俄罗斯政治的哪些特点与怎样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政党始终不能在俄罗斯地方乃至联邦层面的政治中占据主要的位置。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俄罗斯独立以来总体上的权力结构，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出发。从逻辑出发，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存在四种情况：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和弱国家弱社会。在强国家强社会中，两方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各安其位，相互制约。在这样的国家，政党一般是大众政治的产物，其来源于市民社会，自然也代表着社会的力量。俄罗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俄罗斯，国家（政权）-资本的力量向来远远强于社会的力量。苏联时期，在全能主义（totalism）政体之内，国家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几乎没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寄居”于国家之内。^①苏联解体以来，虽然全能主义政体不复存在，但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尤其在直接承袭了苏联遗留下来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政权面前，其力量更是弱小。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国家和社会两极之外，资本的力量也越发重要。在源自西欧的经典资本主义中，资本，或者具体地说，工商业集团，产生于社会。而 20 世纪以来，资本越来越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其自身利益同社会的总体利益之间也呈现分化的趋势。在俄罗斯，资本的来源与西欧显著不同。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大企业和所谓“寡头”，基本上都产生于叶利钦时期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换言之，他们是脱胎于国家而非社会。尽管叶利钦时期资本的力量一度俘获了政权，但其经营的方式决定了其对政权的高度依赖。普京时期，政权更是重新取得了对资本力量的控制，呈现出“权力与资本结为一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资本的力量常常是政党重要的经济资源，

^① 薛福岐：“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基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5期，第21页。

但俄罗斯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叶利钦时期，资本力量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基本上都是直接对政治进行干预，没有使用政党作为中介。在地方上，资本力量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大中型企业，本身就通过发挥政治机器的功能而成为政党在选举市场上的替代品。普京时期，政权对资本力量干政的行为高度警觉，霍多尔科夫斯基以资助政党的形式参与政治，结果遭到政权的严厉打击。^①这充分说明，资本或者选择与政权结盟，保持对政权的依附关系，或者远离政治。其如果想独立地对俄罗斯政局产生影响，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力量远胜于它的执政者清除。

在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政党进行独立政治参与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真正的政党很难获得来自政权以外力量的扶持。而由于政权所具有的绝对实力优势，在俄罗斯语境中，甚至不存在能够独立于政权、真正意义上站在政权对立面的政党；政党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者存在。政党想要与政权保持距离，就意味着会被边缘化，甚至在政权的打压中消失。而类似统俄党这样的政党，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只是政权手中的傀儡。政党在俄罗斯地方政治中的这种次要和边缘地位，是俄罗斯政治中的权力结构，亦即国家-资本-社会之间的性质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此外，俄罗斯社会的未分化状态，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对派力量弱小、执政集团得以板结成一体，从而形成对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倒性优势的局面。在未分化状态下，社会成员的处境相似，核心利益诉求集中。具体而言，就是有庞大数量的俄罗斯民众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国家，他们对政权的主要期待就是能够维持国家稳定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高油价为政权带来了实现这二者的资源。^②换言之，谁掌控了国家机器，谁就能够满足俄罗斯绝大多数民众的核心诉求。由于社会未分化，诉求集中，因此很容易出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集中的政治力量，即统俄党。俄罗斯民众的诉求相当程度上被统俄党“代表”了，其他政治势力因此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统

① Grigory Yavlinsky, *The Putin System: An Opposing Vi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68-69.

② 聂侯诚：“诺思悖论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4期，第87页。

俄党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但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短期利益（而非长期的和根本性的利益），而这也正是统俄党的目的所在，苏尔科夫就明言，俄罗斯不需要一个商人的政党……一个面面俱到的统俄党，就能够代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利益。^①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独立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安排在反复地进行变动、调整。那么，这样的变动何以可能呢？我们认为，俄罗斯国家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为这种具体制度安排的反复变动留下了空间。萨克瓦将俄罗斯概括为一个“双重国家”（dual state）^②，他认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不仅有由宪法构成的宪政制度，还有一套与之平行的制度（para-constitutionalism），后者的核心是“政权”（administrative regime）。简单来说，就是在正式的宪政制度框架外，存在着许多对政治生活起着关键影响且与宪政精神相悖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的生产者和受益者则是执政者本身。在萨克瓦眼中，类似联邦区、国务委员会等制度设计就是平行制度的典型例证。我们认为，俄罗斯庞大无比的总统办公厅、按照政权意愿反复更改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也可以被视作平行制度和双重国家的表现。萨克瓦认为，在俄罗斯这个双重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民主制度仍然处在中心位置，是政权极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但是在民主制度之外，政权及平行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抵消和管控民主制度带来的政治竞争性以及对现政权继续执政的威胁。

双重国家形成的原因，仍然可以通过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关系来解释。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确定的西方三权分立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殊的转型时期直接移植而来的。换言之，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空中楼阁，而其又确实具有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掌握权力的统治集团就通过建设平行于宪政制度的制度体系，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

① Richard Sakwa, *The Crisis of Russian Democracy: The Dual State, Factionalism and the Medvedev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

② 本节内有关萨克瓦双重国家理论的论述，请参见 Richard Sakwa, *The Crisis of Russian Democracy: The Dual State, Factionalism and the Medvedev Succession*, pp.1-51.

俄罗斯独立近三十年来，国家-社会之间的实力对比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权力结构的变动主要发生在国家，或者说政权的内部，体现为政权内不同集团，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执政集团之间实力的消长。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会冲击宪政制度，它既是具体制度安排变动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 Abstract 】 Since its independence, Russia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undergone a status evolution in local politics from the fringe to a position regul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spite being at the center. During the Yeltsin period and Putin's first term, political parties basically did not play any role in local politics and were quite marginal. It is because of the power structure where old ruling groups had absolute advantages in local politics, in addition to corresponding system design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Since Putin's second term began,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local politics has experienced historic transition. By means of system design, the regime enables political parties to play a key role in local politics. Nevertheless, meanwhile it is the highly-controlled United Russia Party that indeed has a place on the local political stage. This process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from 2004 till 2012, and continued during Putin's third term. The role chang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local politics is both the reason and result of Russian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moving from regional to national level. Through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has built a platform for integrating local elites and realizing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a result, the Russian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serve itself more stably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owned by local elites. The national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system has thus been built.

【 Key Words 】 Russian Local Politics, Russian Local Elections, Russia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Росси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етерпели эволюцию от периферии к центральн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 хотя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лись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Во время Ельцин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не играли роли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крайне маргина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Причиной была структура власти, в которой старая правящая группа в то время имела абсолю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как следствие этому, структура системы и её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унк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 момента начала втор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ро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етерпе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и помощи системн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позволи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артиям играть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днак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менн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ая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ла влияние на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цене.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был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вершён в 2004-2012 годах и продолжался в течение третье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Изменение ро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является как причиной, так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ереход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г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от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В качестве средств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регионами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создала платформу дл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естных элит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регионам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могло более стабиль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которыми владеют местные элиты,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завершило созд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го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с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местные выборы,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区域身份构建

身份认同与地区政治经济发展 ——以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为例*

谢尔盖·比留科夫**

【内容提要】从俄罗斯内部的联邦主体来看，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鞑靼斯坦共和国，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非常特殊。作为主体民族的巴什基尔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但是与同宗且邻近的鞑靼人之间在认同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目前，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俄罗斯所有共和国中人口最多的地区，但人口外流，特别是青年人外流问题明显。在内部政治方面，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形成了以地方首脑为核心的、凝聚力强的精英群体，这有助于该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在经济上，该共和国主要依托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工业，这种格局既成就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济上的辉煌，也造成了发展路径依赖、产业结构单一、转型艰难的后果。2008-2009、2014-2016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该共和国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关键词】俄罗斯地区问题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巴什基尔 俄罗斯石油化工

【中图分类号】D85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101(2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景下的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32）的阶段性成果。

** 谢尔盖·比留科夫（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引言

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级别的联邦主体(根据俄联邦宪法, 具有一些国家属性)^①, 同时也是俄罗斯伏尔加联邦区和乌拉尔经济区(大区)的成员。巴什科尔托斯坦毗邻彼尔姆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奥伦堡州、鞑靼斯坦共和国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与原巴什基尔(Башкирия)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首都乌法是俄罗斯最大的工业、科技和文化中心之一。

该共和国的名称, 取自土著居民“巴什基尔人”(башкорт)。“башкорт”一词来自于“баш”(头, 首要的)和“корт”(蜜蜂)的组合, 意思是“蜂王”。众所周知, 养蜂是巴什基尔人的传统。巴什科尔托斯坦有理由被视为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地区。远在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之前, 巴什基尔人就已在此居住, 并形成了历史文化认同。^②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地理意义上属于欧亚地区, 坐落在乌拉尔山脉(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的南侧, 位于欧洲与亚洲交通线路的交汇点。该共和国的土地处于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与鄂毕河盆地, 南北长 550 公里, 东西长 430 公里, 面积 14 万平方公里, 是俄罗斯领土面积最大的共和国之一。巴什科尔托斯坦居民数量为 406 万(2018 年数据), 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共和国。^③人口密度是 28 人/平方公里, 即便是按照俄罗斯欧洲地区的标准, 也是一个很高的人口密度水平。城市人口占 62.07%(252 万), 农村人口占 37.93%(154 万)。同时, 总人口的 29.87%(100 多万)居住在共和国的首都乌法市及其周边地区, 在此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发达的人口聚集地。而共和国的其他大城市(地区级别的), 如斯捷尔利塔马克(Стерлитамак)、萨拉瓦特(Салават)、涅夫捷卡姆斯克(Нефтекамск)、十月镇(Октябрьский)和别洛列茨克(Белорецк)等, 在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上, 远逊于乌法, 无法形成任何集群效应。

① Еникеев З.И.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и. Уфа: Гилем, 2002.

② Антонов И.В. Башкиры и Башкирия по данным ал-Идриси// Ватандаш. 2008. №.4.

③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Башкир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гл.ред. М.А. Ильгамов. Уфа: ГАУН «Башкир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5-2019.

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其位于俄罗斯伏尔加地区和邻国哈萨克斯坦的交汇处的位置有关，它同时处于“斯拉夫”和“突厥”世界。^①这种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影响，使得巴什科尔托斯坦在欧亚一体化进程和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凸显。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是巴什基尔人国家性的一种外在形式。需要记得，巴什基尔人是欧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公元前 1000 年，在南乌拉尔就形成了独立的巴什基尔族群，这是整个欧亚地区突厥共同体的一个分支。^②巴什基尔族群的基础，是伏尔加地区七个突厥部落的联合。公元 10 世纪，伊斯兰教在巴什基尔传播，后来成为主导宗教。巴什基尔人在获得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多个世纪以来，巴什基尔人都是作为突厥世界中有影响力的国家组织——如保加利亚汗国、金帐汗国、喀山汗国等——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这尽管丰富了巴什基尔人的政治经历，但是却给保持族群身份造成了困难。巴什基尔人在突厥共同体之内，失去了原初的族群特质。16 世纪中叶，巴什基尔与伊凡雷帝政府达成协议，成为年轻且不断扩大的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的一个部分。这与喀山汗国的鞑靼人不同，鞑靼人是在被莫斯科征服之后才臣服的。^③然而，随着沙皇政府的融合政策日趋严苛，巴什基尔人也会奋起反抗。18 世纪末，巴什基尔人积极参与到了以普加乔夫（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为首的农民起义之中。在 17、18 世纪，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曾有多次使巴什基尔人归化基督教的努力（出于政治目的），但是此后帝国政权放弃了强力政治同化的做法，默许巴什基尔人（就如同此前对待鞑靼人一样）保留其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并赋予巴什基尔人一定的权力，可以自行处理巴什基尔穆斯林社区内部的事务。虽然历经艰辛，巴什基尔人还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民族特质一直保存了下来。但是根据巴什基尔学者的看法，巴什基尔人的穆斯林宗教认同程度，不如其同宗的邻居——鞑靼人。也与此相关，众所周知的是，

①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Док. ист. наук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Шульгина, МГПУ, 2003. С.252.

② Трепавл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Ногайской Орды.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1. С.210.

③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и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Уфа, 2007.

由于各种矛盾的心理，巴什基尔与邻近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即，与相同血缘和信仰的鞑靼族群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甚至影响到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政治层面。鞑靼斯坦方面也有责任，鞑靼精英释放的信息和政策主张，往往质疑是否存在巴什基尔这一族群。

同时，与邻近的鞑靼斯坦不同（鞑靼斯坦的族群-政治关系，是由鞑靼人和俄罗斯人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一个多族群的共和国，在以“巴什基尔”命名的共和国中，巴什基尔人的人数却不是最多的。三个主要族群（巴什基尔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之间和平、和谐共处，保障着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族群-政治关系的平稳、平衡。根据 2010 年全俄人口普查的数据，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民族构成情况是：俄罗斯人占 36.1%，巴什基尔人占 29.5%，鞑靼人占 25.4%，楚瓦什人占 2.7%，马里人占 2.6%，乌克兰人占 1%，其他民族占 2.7%。^①俄罗斯人和鞑靼人，是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族群团体；而巴什基尔人则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政治和管理系统内，保持了主导性的地位。

从经济上看，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目前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生产中心。同时，巴什科尔托斯坦还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原料型地区。在该共和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石油产区（近 200 个已探明和注册的产地）、天然气产区（预期储量超过 3000 亿立方米）、煤矿产区（近 10 处，5 亿吨储量）、铁矿石产区（20 多处，储量近 1 亿吨）、铜矿产区（15 处）、锌矿和金矿（50 多处），以及岩盐，高质量的水泥原料等。^②经过苏联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化，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工业经济发达且成体系，是该共和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工业结构中，与石油相关的产业（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是主导性的。冶金也是巴什科尔托斯坦重要的工业领域，占工业生产的 44%。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潜力，整体上，伏尔加的许多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都是如此。

① Какие народы населяют Башкирию? <http://www.bolshoyvopros.ru/questions/3044514-kakie-narody-naseljajut-bashkiriju.html>

②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11 октября 2007. <http://xn--80aa2bkafhg.xn--p1ai/12954/Prirodnie-resursi-respubliki-Bashkortostan>

关于巴什基尔身份认同的争论 及其相对于鞑靼民族“次等”地位的辨析

需要承认，在与邻居鞑靼斯坦的关系方面，巴什科尔托斯坦时不时会被定为“次等”“小兄弟”的身份。部分鞑靼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与鞑靼斯坦前政界高层关系密切），不仅试图重新叙述鞑靼人的民族历史，还想据此重新解说全俄罗斯的历史。^①

2002年4月，在世界巴什基尔人大会（忽里勒台，курултай）前夕（会期定于6月14-15日），在鞑靼斯坦媒体上，用两种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语言发表了系列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时任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政治问题国务顾问、历史学家哈基莫夫（Рафаиль Хакимов）。系列文章的总标题是“鞑靼人，你是谁？对于时代变迁的痛苦追忆”。^②在文中，作者令人震惊地坦言，“在后苏联空间，原本没有目前的这些突厥民族，只有一个突厥-鞑靼（金帐汗）群体，这是明显无可争议的。”哈基莫夫追溯历史，“在金帐汗国时，只有一个民族。”在这位鞑靼斯坦前总统顾问看来，这个民族群体的自然继承者，就是当代的鞑靼人。他认为，其他的突厥族群是冒牌的，是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构建”出来的：

斯托雷平在任时，建议鞑靼人的每个族群构建自身的文化和语言，以此来瓦解鞑靼族群……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执行了这个政策，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出现在地图上……巴什基尔语言文字和其他民族“属性”被迅速制造出来。巴什基尔的名片，是一种特别的骑手舞蹈，骑手头戴着用狐狸尾巴装饰的帽子。该舞蹈的杜撰人和出品人是一位名叫加斯卡罗夫（Файзи Гаскаров）的鞑靼人。此人在喀山没有分到房子，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去了乌法。巴什基尔人就是这么被构建出来的，不过，是为了政治目的。

循此逻辑，哈基莫夫的结论是，拒绝承认巴什基尔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

① Бурганов А. Татары против// Огонёк. 2001. №.25. С.21.

② Вера Постнова. Башкир придума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месте со Столыпины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06.2002. http://www.ng.ru/regions/2002-06-11/4_kazan.html; Рафаиль Хакимов. Кто ты, татарин?// Восточный экспресс. No.17-18. 26 апреля-2 мая 2002 года.

存在，仅仅承认巴什基尔人有一些“地方性的身份认同”。“至于巴什基尔鞑靼人或米沙尔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或阿斯特拉罕鞑靼人，他们虽然在语言上有差别，但都是鞑靼方言，没有超出鞑靼语言的范围。”“作为比较，没有人承认哥萨克方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尽管哥萨克人的自我认知比巴什基尔人更强，历史渊源更深。”同时，哈基莫夫承认巴什基尔人有构建族群身份认同的权力，“如果巴什基尔人喜欢说自己的语言，那么没有人能够拦阻。”^①哈基莫夫的重点，是强调与巴什基尔人和其他伏尔加地区的突厥人相比，鞑靼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权，因为“鞑靼人在13世纪之前就定居于此地了。金帐汗国时期，在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从伏尔加到乌拉尔，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地带。”哈基莫夫想要证明的是，巴什基尔人不是居住在乌拉尔南部的古老族群。这引发了巴什基尔知识分子的强烈回应，他们坚称巴什基尔民族的历史悠久性和政治主体性。

同时，另外一些与哈基莫夫观点接近的鞑靼斯坦知识分子（哈基姆，С. Хаки́м；米努林，Т. Ми́нуллин；伊斯哈科夫，Д. Иса́ков；吉利亚佐夫，И. Ги́лязов，等等），他们的主张和理想是，形成一个鞑靼-巴什基尔联盟。在这个鞑靼族群联盟中，巴什基尔是“小弟”。他们希望巴什基尔人自愿承认其根源和身份是鞑靼人（作为鞑靼族群的一个特殊分支）。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喜欢援引国内战争期间的先例，当时出现过这样的鞑靼-巴什基尔联盟。他们所指的是昙花一现的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3月22日，正值国内战争时期。对此，哈基莫夫认为，此种想法是否有可行性，需要加以反思：“在伏尔加地区，这个俄罗斯联邦多元文化汇聚、交通要道云集的战略地区，组建一个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的联邦主体（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联邦中央能够许可和容忍吗？”此言一语中的。

需要指出，建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最早设想，是由鞑靼民族运动领袖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和苏丹-加利耶夫（Мирсаид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积极推出的。这实际上与艾德尔（伏尔加）-乌拉尔军团（Идель-Урал）的理念，如出一辙。这个军团由鞑靼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成立，其性质，传统上被苏联历史学家认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

① Рафаиль Хакимов. Кто ты, татарин?

子的组织。为了防止该组织宣布成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准国家，苏丹-加利耶夫率领一群布尔什维克逮捕了鞑靼自治区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舒罗（Милли Шуро）。此举粉碎了艾德尔（伏尔加）-乌拉尔军团建立资产阶级准国家组织的全部计划。布尔什维克战胜对手之后，迅速掌控了局面，并与瓦利季（Ахмет-Заки Валиди）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区。由此，鞑靼-巴什基尔联盟没能成型。此后，政治主动权落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布尔什维克推行的方针是，把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分开，建立各自独立的民族自治区。^①

应该承认，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分别被安置在两个民族共和国之内，客观上终止了两个相邻的突厥族群精英之间的纷争，在 20 世纪 20 年代起到了稳定伏尔加地区民族-政治形势的作用。然而，按照一些鞑靼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的观点，当时分割成两个共和国的做法，没有考虑到两个族群定居点的边界，比如，西部地区（包括乌法市）有很多鞑靼人，但是却被划到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后来，随着人口政策、定居点建设，以及文化政策和身份意识宣传，巴什基尔人在乌法市，乃至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比例，整体上都得到了逐步提高。

作为回应，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历史学家也引用证据证明，在鞑靼斯坦定居点，也有不少的巴什基尔人，而且不仅是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也有这种情况。^②显然，行政和权力因素，在巴什基尔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乃至今天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族际关系结构方面，都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在俄罗斯联邦的伏尔加地区存在着两个独立的突厥共和国，虽然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很难被质疑什么，因为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① №.451. Соглаш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с Башкир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о Советск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Башкирии. Рас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63 Извести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оветов от 23 марта 1919 года. <http://istmat.info/node/38502>; Кульшарипов М.М. Призн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ью Башкирск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2014. №.1. С.27-32.

② Башкиры или Татары? http://asekeevo.com/3_bash-tat.pdf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政治地位及其在联邦中央的影响

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影响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成功作为：作为俄联邦的一个行政主体，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获得了莫斯科乃至其他民族共和国眼中关键地区的地位。

稍加回溯，就可以知道巴什科尔托斯坦是在当代俄罗斯土地上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共和国。1917 年 11 月 28 日，“巴什库尔季斯坦”（Башкурдистан）共和国成立。1919 年 3 月 20 日，签署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自治苏维埃的协议》，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其地位，并载入了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90 年 10 月 11 日，随着国家主权宣言的通过，该共和国的名称改为“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从 1992 年 2 月 25 日起，使用的名称改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并一直延续至今。^①

1991 年，巴什科尔托斯坦举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最高委员会发言人穆尔塔扎·拉希莫夫（Муртаза Рахимов）获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复杂的转型时期，拉希莫夫把共和国的政党、经济和行政精英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建立起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稳定的政治制度。藉此，拉希莫夫成为在俄罗斯联邦层面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特别是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政治精英中，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有着相当的身份和地位。

1992 年 3 月 31 日，巴什科尔托斯坦（与近邻、政治和经济对手鞑靼斯坦不同）签署了联邦分权条约。这个条约是界定俄联邦中央权力机关与共和国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这个条约还有一个附件，是专门针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给予巴什基尔额外权限（在行政与经济领域）的特殊安排。1993 年 12 月 24 日，通过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宪法，其中设定了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从 2015 年起，改称共和国“首脑”，因为联邦法规不再允许共和国领导人使用“总统”的称谓）。

额外“主权”的获得，进一步推动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内部政治和行政精

^① Башки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стояла у исто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изма—эксперт. 20 марта 2017. <http://www.bashinform.ru/news/972999-bashkirskaya-sovetskaya-republika-stoyala-u-istokov-rossiyskogo-federalizma-ekspert/>

英的凝聚，进而使得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依托一个团结的精英群体，维系巴什科尔托斯坦在俄罗斯联邦中的特殊地位。正如鞑靼斯坦政治学家加利亚莫夫（Р. Галлямов）所指出的，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政治中“爆发”出一个全新的、特殊的现象，即，各联邦主体，特别是民族共和国的精英，向国家的政治制度发起了挑战。

在民族共和国，包括巴什科尔托斯坦，在党政和经济领域内，苏联时期的干部“罗名制”^①影响仍然存在。20 世纪 90 年代兴旺一时的俄罗斯民主运动团体和代表，并没有进入到罗名制下的精英团体之中。相反，在精英队伍构成方面，“民族化”进程（保障共和国族裔干部优先）气势强大，效果明显。共和国的精英们娴熟地依托“共和国主权”，在共和国内部建立起一套独立且高度自治的权力和管理机制。此外，受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共和国精英的理念与其他联邦主体（如州和边疆区）精英的理念，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更注重在自身地位、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领域内，强调和突出作为共和国的合法性及特殊地位。^②

加利亚莫夫把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精英从地位上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共和国的“最高”政治精英，他们拥有最重要的权力，可以决定共和国精英队伍的构成，并且不受其他群体的控制；第二个群体，主要是巴什科尔托斯坦政府的成员和领导人，他们从属于上一个精英群体，拥有执行权力，在共和国全境推行最高政治精英制定的政策；第三个群体，是地区精英，主要是由城市或者地区的一把手组成，直接受最高精英领导，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第二个精英群体。

由此，巴什科尔托斯坦（与邻近的鞑靼斯坦一样）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权力和管理体系，其特点还不仅仅是“自治”，而且还有着俄罗斯其他联邦主体（州和边疆区）所不具备的特征：（1）这是一个独特的权力空间，其基础是执行权力与立法机构之间的联合，并且立法机构完全服从于共和国最高

① 关于苏联“罗名制”的研究，可参阅[俄]Д·谢泽：“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 1985-1989 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59-88 页——编译注。

② Галлямов Р.Р. Правящ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ласти(на примере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и Татарстана). <https://pandia.ru/text/78/437/1899.php>

政治领导人。(2) 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严格的监督系统, 监督城市和地区层面的自治机构, 使其几乎完全处于共和国的管理之下。(3) 在地区或者城市一级, 行政首长的职位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代议机构的主席或者是通过正式的选举产生, 或者是以指派的方式任职。(4) 共和国的行政机关实际上要听从于执法与财政机构(如司法部、税务机关、税务警察等)。巴什基尔还有“自己的”监控组织: 国家监督委员会^①。该机构被用于处理共和国内部安全部门之间的政治冲突。(5) 共和国的统治精英或者成功地使司法部门屈服下来, 或者是建立自己“原始”的司法系统。(6) 共和国层面的选举体系, 极有“特色”: 选举委员会高度依赖共和国总统办公厅, 实际上这意味着共和国领导人控制着整个选举进程。(7) 地方媒体、定期出版物, 完全服从共和国的领导人。(8) 政治和政党反对派, 在缺少发达的民主程序的情况下, 只能按照“影子”规则而行, 不敢使公开的政治斗争“浮出水面”。(9) 随着巴什基尔族群人口比例的提升, 共和国权力机关的族群特征也日益明显。巴什基尔人在共和国“最高”政治精英和政府部门中的比例, 迅速增加, 在干部队伍中也是如此。1999 年, 在 7 个关键的职位上, 有 5 个(总统、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国务秘书和忽里勒台大会领导人)是巴什基尔人, 都讲巴什基尔语; 另外 1 个是俄罗斯人(上院主席), 最后 1 位是鞑靼人(立法院主席)。21 世纪以来, 随着俄罗斯联邦中央的收权, 巴什科尔托斯坦失去了相当多的主权权限, 但是上述特征, 基本上都保留着, 且在延续。(10) 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建立的这套封闭式、威权式的干部罗名制, 以及苏丹式的政权结构, 熄灭了该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政党热”, 使得政党成了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多余”成分。三大族群(巴什基尔、俄罗斯、鞑靼)之间的某种分离和竞争, 也不能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干部任命传统进行有效的制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地方干部的任命, 被牢牢地掌握在共和国总统的手中。^②

总之, 巴什科尔托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管理精英群体, 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层级式的、并且相对“封闭”的系统, 新的成员很难进入。拉希莫夫在

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нтро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② Галлямов Р.Р. Правящ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ласти(на примере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и Татарстана).

20 世纪 90 年代成功地把共和国精英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层面，他是一位显赫人物。

1993 年之后，作为共和国总统，穆尔塔扎·拉希莫夫自动成为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并与当时的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沙米耶夫一道，是俄罗斯“参议院”（俄罗斯议会上院）领导人之一，与俄罗斯总统的垂直权力机关、甚至与叶利钦本人，讨价还价，为本地区争取额外的权力和资源。在某些议题上，还时不时地反对和挑战国家领导人。^①

此种地位使穆尔塔扎·拉希莫夫和其他几个民族共和国首脑一致支持、创建了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以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为首。在 1999 年 12 月的选举中，祖国-全俄罗斯输掉了议会选举，不敌当时支持普京总理的团结党。在这种情况下，拉希莫夫改变了策略，被迫收缩此前的野心。拉希莫夫深谙与俄罗斯新总统建立关系之道：他与巴什科尔托斯坦精英达成一致，降低本共和国的政治雄心和目标，取消共和国宪法中与俄联邦宪法相冲突的内容。在联邦中央的同意下，巴什科尔托斯坦总理鲁斯泰姆·哈米托夫（Рустэм Хамитов）接替拉希莫夫担任总统。这样，拉希莫夫这位多年活跃于政坛的“重量级”人物，被相对非政治化的技术管理官僚所取代。鲁斯泰姆·哈米托夫的政治影响力无法与拉希莫夫相比，因此，联邦中央更容易对巴什科尔托斯坦进行政治上的管控。但是需要指出，在拉希莫夫下台之后，巴什科尔托斯坦政治、管理和经济精英仍然是团结的，继续团结在共和国执行权力机关以及首脑个人的周围。虽不能与此前相比，但巴什科尔托斯坦仍然维持着形式上的“主权国家”地位。巴什科尔托斯坦统治精英的组成，还是多族群性质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巴什基尔族群。当然，需要指出，进入共和国精英群体的标准，最主要还不是所属族群的性质，而是要融入精英互动体系之中，尊重统治“阶层”的利益，并忠实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纲领。

同时，巴什科尔托斯坦政府在联邦权力机关层面仍然有着相当的地位，能够有效地在联邦层面为共和国的利益游说。其中，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① Солник С. Торг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субъектами Федерации о структуре но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90-1995// Полис. 1995. №.6. С.95.

派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机构（该机构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受政府领导），在莫斯科的工作和运转相当成功。^①

巴什科尔托斯坦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影响很大。与鞑靼斯坦不同（该共和国的代表无视 1993 年的联邦议会选举，因为当时尚未解决宪法争端），巴什基尔的代表在联邦级别的立法机构中，没有缺席过。来自巴什基尔的议员，利用各种技术渠道，在联邦层面为本地区的利益进行游说，并与所有主要的联邦部委（财政部、经济发展部、司法部等）的代表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本届（第七届，2016–2021 年）杜马成员中，来自巴什基尔的代表为 12 人（前一届是 8 人），其中两个杜马委员会分会主席的职位由巴什基尔代表担任。^②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前总统拉希莫夫（自 1993 年）等人。此外，巴什科尔托斯坦总统还是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济

根据专家的评价，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属于经济多领域相对平衡发展且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③巴什基尔传统的经济行业是石油化工和农业。近年来，经济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降低了“原料”的程度。^④比如，矿业开采在共和国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8.1%^⑤降到 2012 年的 2.9%。^⑥但与此同时，巴什基尔主要的经济领域仍然是加工业，其中首要

① 该机构（Полномоч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的官方网址：<http://bashpredmsk.bashkortostan.ru/>

② 进入第七届国家杜马的巴什基尔代表有前总统拉希莫夫等人。第七届国家杜马代表名单，可参阅 Сост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седьмого созыва. <http://duma.gov.ru/duma/deputies/>

③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2015-2017г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Уфа, 2018. http://bashstat.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ts/bashstat/resources/41d8c60045e1be4fb46efcedfce35b80/i000001r.pdf

④ Николай Евдокимов. Рост за счет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уменьшенной ее копии в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е// Регионы Онлайн. 20 июня 2017г.

⑤ Паспорт Региона: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http://www.marketcenter.ru/content/file.asp?r={7CB1ECA8-2EFA-4FFD-B607-C21946DB8888>

⑥ https://economy.bashkortostan.ru/netcat_files/File/valovyi%20regionalnyi%20produkt.pdf; <http://info.minfin.ru/passportr.php>

的是石油加工。巴什基尔在成品油、汽油和柴油的产量方面，在俄罗斯都居第一位。目前，巴什基尔大型的工业中心有乌法、斯捷尔利塔马克、萨拉瓦特、涅夫捷卡姆斯克、图伊马济、十月镇和别洛列茨克等。巴什基尔的农业经济体系完善，在牛的数量、牛奶产量和蜂蜜产量方面，都是俄罗斯的领头羊。^①此外，该地区的粮食、甜菜和向日葵的产量也很高。但是，需要对农业经济进行技术和工艺现代化更新，也需要对其私人农场经济加以系统性的扶持。鉴于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领域的重要性，下文将重点加以分析。

（一）石油工业

巴什科尔托斯坦经济结构的基础，即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奠定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并延续至今。20 世纪 20 年代发现的伊希姆拜石油区^②，如今还在运营。在俄罗斯的石油开采和加工行业中，巴什基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石油产量方面，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排在秋明州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之后，位居俄罗斯第三位^③，主要是“巴什石油”公司（Башнефть）开采的。该公司是俄罗斯石油开采企业中的十强之一，2015 年的石油开采量是 1990 万吨。“巴什石油”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 27 个地区以及鞑靼斯坦共和国和临近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进行勘探和开采工作。目前，该公司的代表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遍及俄罗斯主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以及俄罗斯的近邻国家；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芬兰、加拿大、比利时等国的大型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目前，石油开采仍然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关键工业领域，保障着 16% 的税收收入。但是，该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动力不容乐观。关键的问题是，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石油总开采量在缩减，同时，开采的难度上升。实际上，这个问题从 1981 年到 1994 年就有了。当时，石油采掘部门的经理们被迫采取措施，抑制老油矿开采量

①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в тройк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по поголовью крупного рогатого скота// ИА DairyNews. 19.06.2014. [https://www.dairynews.ru/news/bashkortostan-v-troyke-rossiyski-kh-liderov-po-pogo.html](https://www.dairynews.ru/news/bashkortostan-v-troyke-rossiyski-kh-liderov-po-pogo)

② 伊希姆拜石油区（Ишимбайское нефтяное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是巴什科尔托斯坦以及南乌拉尔第一个石油产区。

③ Владимир Хомутко.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добычи нефти в Башкирии. <https://neftok.ru/strany/bashkiriya-neft.html>

的下降，并开发新的采油点，同时从外部运油进来，以缓解颓势。^①通过上述努力，到 2001 年，巴什基尔石油开采量下降幅度控制在 2.3% 的水平，这已经是自 1981 年以来最好的情况了。^②巴什基尔的采油企业，在巴什基尔范围之外，也在开拓新的油矿，如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及其他地区，并在这些地区获得了关键的开采权限。

在石油加工量方面，巴什基尔在俄罗斯处于最高水平。俄罗斯七分之一的石油，是该共和国的企业所加工的；六分之一的汽油和柴油、七分之一的燃料油，是该共和国的企业所生产的。巴什基尔最大型的石油加工企业落户在乌法市、伊希姆拜市和萨拉瓦特市。除了“巴什石油”之外，“乌法石油化工”（Уфанефтехим）也是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的石化企业，生产各类高品质的燃料油、沥青和化学产品，40% 的产品出口国外。“新乌法石油加工厂”^③也是一家十足的俄罗斯大型石油加工企业，已经有 40 年的发展历程。不过，并非只有巴什基尔本地的企业，随着俄联邦层面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大规模扩张（它们同时拥有联邦层面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富油地区的开采和加工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巴什基尔的企业，很难再从其他地区运进石油，然后在本地加工了。此外，石油加工企业的现代化更新，所需资源只能从巴什科尔托斯坦自身找寻了。这尤其困难。因为随着俄联邦财税体系的中央集中化，巴什基尔失去了此前的税收优惠地位。共和国的财政出现了赤字。巴什基尔的石油行业，曾几何时是整个共和国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的保障，现在沦落到本身的现代化都严重需要补给的地步。

（二）金融工业集团在巴什基尔的所有权结构和地位

巴什基尔地区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所有权的结构以及在此经济空间内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对巴什科尔托斯坦所有权结构的分析表明，在 2000 年之前，该共和国绝大多数的工业行业，以及服务行业，如贸易、建筑、交通等，企业法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共和国本地，或者是长期

① Яруллин К.С. Состояние нефтедобычи и пути повыш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поисковых работ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Уфа, 1998; Карпов 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Москва, 2011.

② См.: Журнал «Ватандаш» за 2001, 2002, 2003 годы. Раздел: Крупнейш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фтехими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③ Ново-Уфимский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在该共和国经营的外地企业。这是因为，自 1990 年代初以来，该共和国享有较高的“主权”权利，其权力机构相较于俄罗斯其他联邦主体（如州或边疆区），有更高的自主权和特殊地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行政权力为中心，实现了精英（包括商业精英）的联合。当然，政治-行政精英控制着商业精英群体，当时出现了“将所有权交给信任之人手中”^①这一过程。由此，在复杂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共和国保持住了许多重要资产，主要是生产方面的。这是很重要的。但一个负面的效果，是限制了地区之外的资本，影响了该共和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从 2000 年代初期开始，全俄罗斯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巴什科尔托斯坦的行政和商业精英成功地保持了相当大份额的企业产权。但与此同时，也被迫向大型的首都财团（金融工业集团）开放敏感与高盈利的经济领域：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2010 年以来，金融工业集团在巴什基尔扩张的趋势持续进行，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对共和国的许多工业领域产生的冲击增强。以拉希莫夫为首的巴什基尔前领导人，运用自身在全俄罗斯政治中的权重，曾成功地平衡和制约着金融工业集团在当地的影响程度，即，不允许其活动影响和损害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利益。拉希莫夫的接班人，鲁斯泰姆·哈米托夫，也是出身于巴什基尔当地的行政精英，基本上有能力继续保持这种平衡。不过，2018 年 10 月，他的权力棒交接给了得到俄联邦中央支持的拉季·哈比罗夫（Радий Хабиров）。

哈比罗夫曾任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г. Красногорск）市长。联邦中央委任此人做巴什基尔的代理首脑，可能是希望他给当地经济带来起色。这是因为，哈比罗夫不仅得到了巴什基尔共和国层面精英的信任，也有着来自大型金融集团经理人（驻巴什基尔代表）的支持。

巴什基尔虽然经历了两次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政治局面仍然保持稳定，这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近年来，俄罗斯主要的金融工业集团在巴什基尔的分公司，收入不断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带来的（2016 年之后价格攀升）。共和国本地的石油开采和

① «Довер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ход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надежные руки».

石油加工工业，也同样获益，收入提高。巴什基尔依托于强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以及利用俄罗斯对西方农产品的反制裁措施，其农业控股公司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①

巴什科尔托斯坦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因素，就是上文提及的，在共和国的经济中，在关键的商业利益集团之间，有着平衡和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在哈比罗夫就任之前，根据专家的看法，在巴什基尔大型的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就已经有着相对平衡的关系。哈比罗夫本人也倾向于倚重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大型商业集团没有理由冒犯新上任的地区领导人。

在巴什基尔，最为重要的全俄罗斯性的公司有，谢钦的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 Игоря Сечина）、米勒的天然气工业公司（«Газпром» Алексея Миллера）、切梅佐夫的俄罗斯技术集团（«Ростех» Сергея Чемезова），以及阿列克佩罗夫的卢克石油公司（«Лукойл» Вагита Алекперова）。其他比较重要的企业还有米赫尔松的西布尔公司（«Сибур» Леонида Михельсона）、托卡列夫的石油管道运输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 Николая Токарева）、马赫穆托夫的乌拉尔矿业冶金公司（«УГМК» Искандера Махмудова），以及叶夫图申科夫的“系统”金融股份公司（АФК«Система» Владимира Евтушенкова）等。与这些“联邦级别”的公司相比，产权和股份属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及其居民的企业，力量显得单薄得多。

在巴什基尔的地方企业中，盈利水平最高、对地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巴什石油”（«Башнефть»）。该公司 2017 年的销售额同比提高 17%，达到 5585 亿卢布，占巴什科尔托斯坦所有本地公司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强。^②需要指出的是，从 2000 年之后，“巴什石油”的所有权不再完全由巴什基尔人控股了（主要的控股人曾是前总统的儿子乌拉尔·拉希莫夫，Урал Рахимов）。目前，“巴什石油”最大的股东是俄罗斯石油市场的领头羊、谢钦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其拥有的股份占 57.66%。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拥有 25%的股

① Тимур Рахматуллин. «Та же добыча Радия?»: кого кормит башкирская земля// Реальное время. 06. 12. 2018. <https://realnoevremya.ru/articles/121963-top-100-kompaniy-bashkirii-po-godovoy-vyruchke>

② АНК Башнефть. <https://o-zavodah.ru/zavody/pao-ank-bashneft/>

份，由该共和国的土地与财产部^①持股。很明显，这是共和国行政与商业精英做出的让步。此外，俄罗斯石油公司还通过其分支公司，控制着另外一部分的股份。加在一起，谢钦实际上拥有“巴什石油”62%的股份，由此，他垄断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市场。“巴什石油”公司的经理是希什金（Андрей Шишкин），但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是费奥多罗夫（Павел Федоров）。费氏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第一副总裁。^②不能排除的是，随着哈比罗夫这位强者（其在莫斯科州工作期间，以强硬作风闻名）的到来，“巴什石油”公司董事会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在不影响公司股份平衡的情况下，安插进来一些共和国的代表。

（三）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巴什科尔托斯坦经济发展的指标，长期以来都很稳定，无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转型时期，还是在 2000 年代联邦中央权力扩张的阶段。即便如此，其经济还是无法逃脱全球经济波动和全俄罗斯经济危机。因此，难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巴什科尔托斯坦经济适应危机的能力如何？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怎样？

在制定反危机战略的时候，巴什科尔托斯坦政府不仅要考虑到客观上的限制，如财政能力与权限（从 2000 年代开始，共和国主权的等级下降），同时更要面对其他深层的因素：危机的周期性特征，不仅是市场波动造成的，更是具有结构性质的。

经济危机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去工业化，以及地区生产潜能的损伤。恢复生产能力，走出危机，只能通过制定有吸引力的发展规划，吸引共和国之外的大规模投资来实现。如果一个地区在危机的境况下，无所事事，保持原样，那么就会错失深化改革、实施反危机规划的良机。而且，会徒然耗尽该地区在丰年的积累。

巴什科尔托斯坦相对成功地克服了 1998 年全俄罗斯的通胀和经济危机。其地区生产总值在 1999 年增长了 4.4%，2000 年增长了 3.9%。^③2001

①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земельных и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② Тимур Рахматуллин. «Та же добыча Радия?»: кого кормит башкирская земля// Реальное время. 06. 12. 2018.

③ Эконом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http://mirznanii.com/a/142542-4/ekonomika-bashkortostana-4>

年，巴什科尔托斯坦被授予长期信用等级，当时是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中最高的级别。这充分证明了其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外部市场行情的波动，巴什基尔再次遭遇困境。这就是 2008–2009 年的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巴什基尔经济中的问题。该共和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以重工业及与此相关联的采掘业、能源加工业为主导。在危机局面下，结构（失衡）问题与技术（老化）问题同时出现：重工业（化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工艺与技术复杂，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才能更新和发展。外部能源市场的不稳定，加剧了巴什基尔的困境，因为其产品多是原料型的，与邻近的其他地区相比，巴什基尔更加依赖出口。由此，危机蔓延至整个共和国的经济体系，致使其进入到一个深远、长期衰退的境况之中。^①石油及其加工品价格的下跌，显著降低了巴什科尔托斯坦的财政收入，进而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领域问题的出现和紧张。其程度之深，远超邻近的其他地区。

巴什基尔在 2008–2009 年这轮危机中，还发出了另一个警示信号，即，共和国没有自己的“反危机钱包”（类似于联邦中央的稳定基金）。2008 年上半年，共和国有 50 亿卢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该年年底，同样的数字，性质却成了财政赤字。企业经营状况也急速恶化。2008 年 5 月 1 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企业，有 12% 是亏损的，总亏损额为 63 亿卢布；2009 年年初，亏损企业上升到 19.9%，亏损额为 175 亿卢布。生产加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采矿等全部亏损，可见危机具有结构性和全面性的特点。^②共和国银行系统的问题也在危机中浮出水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国外银行的许多分支机构遍布巴什基尔，虽然也有一个“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③，但实际上共和国本身没有自己的银行系统。^④危机之中，非巴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 Евгений Рудаков, Аркадий Шафран. Сырьев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уйти нельзя остаться// Энергорынок. Ноябрь 2012 года. <http://www.ipem.ru/news/publications/554.html>

② Есть ли панацея от кризиса?//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167. 30.08.2012. https://resbash.ru/stat_m/2/2405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ан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с 2014 年 9 月 17 日起更名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анк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Уральского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从属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管理。

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от 2 февраля 2006 г. N 21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ектор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https://base.garant.ru/17711096/>

什基尔的银行分支，尽量把资产从共和国转移出去。危机也表明，在把关键企业的股份移交给联邦金融工业集团及其控股公司之后，共和国实际上失去了对机械制造和冶金行业的有效影响。这两个行业是继石油开采与石油化工之后的关键经济领域。机械制造和冶金行业形势的恶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依赖这两个行业的“单一城市”工人工资下降，如别列别伊（Белебей）、乌恰雷（Учалы）等地区。

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共和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因素都非常明显，体现为：整个地区经济体系以及制度设计，偏向于原料行业，同时生产工艺和技术日益陈旧。这些问题实质性地降低了巴什基尔整体经济生产的效率，使地区经济无法高质量稳定发展。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需要寻找到结构调整的有效措施，需要对整个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现代化更新。

（四）巴什基尔经济：一些初步的结论

从整体上看，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人口数量以及苏联时期工业化的积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至今仍然是俄罗斯联邦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单位，是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从经济总量来看，在伏尔加联邦区的范围内，仅次于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石油化工、机械生产和农产品生产，规模庞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期间，巴什科尔托斯坦在“向市场的渐进转型”战略^①框架内，实行了特殊的保护性的社会政策，即，利用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工业的收入，进行二次分配，支持社会领域和农业经济。同时，也得益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俄联邦内的特殊地位，并由此享受相应的经济和税收上的特权。因此，在转型期间，当地民众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政权和管理精英层的忠实度，相当之高。与此同时，由于共和国行政官员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和影响，企业经理人则表现出了不满情绪。

进入 2000 年代，巴什科尔托斯坦继续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优先任务是保障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时，共和国的非生产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在健康、教育、社保、科研、服务、信贷等领域的投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政策的实行，帮助巴什基尔成功避免了社会领域内的危机，客观上有助

① Стратегии «мягк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在 1990–2000 年代，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发展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领先梯队，是为数不多的联邦预算收入供给地区（当然，巴什基尔相较于其他的州和边疆区税收负担较轻）。在工业生产方面，在此期间，也是俄罗斯地区的前十名；农业产量则是前三强。

稳定和渐进发展，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拉希莫夫时代以来的发展路径。拉希莫夫以及共和国的精英们所选择的这条发展道路，其特点是可管理性，以及社会与经济领域平衡发展。这有其优点。但同时，这种保守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某些方面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延缓了技术更新和现代化的进程。这在 2008–2009、2014–2016 年的经济危机中，都暴露出来了。

2000 年代初期，俄罗斯整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全俄罗斯性的金融工业集团也开始向地方大规模投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也在此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2001 年上半年，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同比增长了 9%。但是这种积极增长态势的取得，主要是依靠石油加工工业。而其他的工业领域，表现平平。能源领域的发展，客观上提高了巴什科尔托斯坦在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空间内的地位。但是危机暴露了问题。2008–2009 年危机表明，巴什基尔经济结构不平衡，工业领域和农业经济适应危机的能力弱。2014 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再次打击了依靠能源的巴什科尔托斯坦经济。只是依托于此前的积累，使得巴什基尔渡过了危机时期，避免了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①2016 年以来，在俄罗斯整体经济形势稳定的背景下，巴什基尔经济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从大型企业的总收入情况来看，2016 年巴什基尔 100 家最大型企业的总收入为 1.71 万亿卢布，2017 年这个数字是 2.06 万亿卢布，增长了 20.5%。同时，在 2014–2018 年间，巴什基尔的地区总产值在伏尔加联邦区范围内，仅次于鞑靼斯坦，高于下诺夫哥罗德州等其他联邦主体。^②但是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目前，按照相关专家的看法，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也是长期问题，包括：（1）经济多元化水平相对较低，即，该地区实际上

①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отчет по развитию ситуации в отраслях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финансовой сферах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за январь-июль 2015 года. Уфа, 2015. https://economy.bashkortostan.ru/upload/iblock/d0b/monthly_report_january_july_2015.pdf

② Тимур Рахматуллин. «Та же добыча Радия?»: кого кормит башкирская земля.

高度依赖 4-5 个工业部门；（2）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成本高，为此需要大规模的国内外投资；（3）共和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急需更新；（4）该地区的能源产品（包括石油）质量低，特别是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相比；（5）共和国的中小城市去工业化，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都已经是在实际上去工业化了；（6）在共和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中，创新产品的比重低；（7）需要完善共和国的教育系统，中等技术水平的专家和熟练工人缺乏；（8）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持续外流。其他的不利因素还有，地处欧亚大陆内部，远离海港；在可见的未来，难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自身也没有资源投入到地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之中。

结 语

可以认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上，在族际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巴什基尔人不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住了自身的“民族主体”地位，也一直持守着自身的族群认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治上的特权（2000 年以后，其“特殊地位”受到了联邦中央的有效约束），也在制度层面保障着巴什基尔人的地位。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群体。这个群体愿意执行俄罗斯联邦中央的政策，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网络对联邦权力机构施以影响，维护地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中央也不打算实质性地更换这个精英群体，以此来交换他们对中央领导权的忠诚。

从伏尔加联邦区的范围来看，由于巴什科尔托斯坦自拉希莫夫以来就一直有很强大的游说中央的能力，以及从苏联时期继承下来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农业和科研实力，有理由认为，该共和国是伏尔加联邦区内最有影响的领先地区之一。在综合实力上，仅次于其“兄弟邻居”兼竞争对手——鞑靼斯坦共和国。与此同时，在 1990-2000 年代，为了确保共和国内部的精英利益和社会稳定，巴什科尔托斯坦错过了对经济进行结构性、实质性改革的机会，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目前，该共和国的总体经营管理水平急需提高和完善，生产技术需要现代化更新，需要建设新的工业领域，更新农业经

济的技术水平，提高社会政策的效率，更新基础设施，发展科学技术，等等。此外，面对这些需要，巴什科尔托斯坦本地却没有能力满足，需要吸引长期的、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包括国外投资。为此，巴什科尔托斯坦应该改变经济政策，制定新的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充分发挥该地区的资源等各类潜能。

(翻译 肖辉忠)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federal subject within Russia,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and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are very special in terms of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al status. Bashkir, as the main ethnic group,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bu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and competition in identity with its neighboring Tatars who share the same clan. At present, Bashkortostan is the most populous region among all the republics of Russia, but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outflow, especially the outflow of the youth, is quite obvious. In terms of internal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there appears a cohesive elite group with local leaders as the core,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in this region. Economically, this republic mainly relies on petroleum exploitation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n the one hand, this pattern has led to the success of this republic in econom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caused such consequences as development path dependence,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ifficult transition. The economic crises of 2008-2009 and 2014-2016 exposed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is Republic's economy.

【Key Words】 Russian Regional Issues, 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Bashkirs, Russia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и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 занимают особое место в плане культур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Башкирский народ как основная 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имеет давнюю историю и традиции, но у него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 сфер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соседствующими татар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густонаселённым регионом среди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однако отток насел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 среди молодёжи, проблематичен.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сплочённую группу элиты со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ием власти в руках местных лидеров,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опирае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на нефтедобывающую и нефтехимическую отрасли, 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лав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но и привело к та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как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днообраз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сложнос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кризисы 2008-2009 гг. и 2014-2016 гг. выявил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Башки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фтехим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责任编辑 崔 珩)

撤稿声明

本刊 2020 年第 1 期刊登了周超的论文“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激进化——基于匈牙利青民盟的案例分析”，根据有关举报并经专家认定和编辑部比对，系抄袭国外学者的文章。经与作者沟通，作者对此抄袭行为予以承认。编辑部对此行为予以谴责，对此稿件作撤稿处理，自声明刊登起 5 年内拒绝接受该作者的投稿。

本刊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现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本刊将加大对外文期刊的检索查验力度，欢迎广大读者关注并给予监督。

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多维话语建构*

葛静深**

【内容提要】尽管北极宏观区域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具有显著的战略重要性，但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地图中，“北极”尚未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空间概念而存在。这既与“区域”概念的复杂性、动态性相关，也是由北极宏观区域自身地缘环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俄罗斯北极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导致该地区长期居住的人口稀少，缺乏形成共同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俄罗斯北极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同样不存在自然状态下生成的、较强的关联，因此对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来说，基于共同性自我身份识别过程的、“自下而上”式的身份建构路径相对缺失，而更多依赖于政策层面的官方主导。在“自下而上”式身份建构方式相对缺失的背景下，稳定的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建构、维持和传播，需要更多依赖官方政策话语之外的其他建构因素的支持。尤其是需要更多话语主体长时间、多维度的持续性话语建构。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存在多种身份话语，主要包括“北方（Север）”话语、“极地（Заполярье）”话语和“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多种身份话语的同时使用，一方面说明在俄罗斯官方和民间层面，缺乏有关北极宏观区域的组成部分、边界以及相关意义体系的统一、连贯的既定看法；另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北极地区作为宏观区域身份的复杂性。

【关键词】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 俄罗斯身份构建 俄罗斯多维话语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124(38)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013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葛静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俄罗斯是最重要的北极国家之一，随着世界各国对于北极关注的不断增长，北极地区在当代俄罗斯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俄罗斯联邦内部重要宏观区域的北极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该地区联结了诸多拥有共同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边界（如共同的海洋空间，大量矿藏和资源，严峻的气候条件等）的不同联邦主体。^①

近年来，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以及全球气候的显著变化，北极地区在全球语境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北极宏观区域在俄罗斯也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其他联邦地区的特殊地位。传统上，俄罗斯与北极地区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自然地理层面，而非国家、区域身份的自我与他者认同层面。奥莉加·赫鲁晓娃（Olga Khrushcheva）等曾指出，俄罗斯北极地区人口稀少，在多数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对于北极并无明确的身份认同感；俄罗斯领导人需要创建一个“叙述”，向俄民众解释北极对于俄罗斯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话语建构俄罗斯国家身份同北极地区之间的独特关联。^②为了推进北极战略及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北极空间相关的身份建构问题，成为当代俄罗斯北极战略及相关政策顺利实施的核心议题。

现阶段俄罗斯与北极空间相关的身份建构^③过程，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外部层面的国家身份建构，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

①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Назукина М.В, Михалева А.В, Бедерсон В.Д, Клешёв Д.В, Мартьянов В.С, Киселе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ктика в поисках интег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О.Б. Подвинцев. Москва, 2016. С.4.

②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4, pp.547-566.

③ 有关现阶段俄罗斯与北极空间相关的身份建构问题，请参考 Назукина М.В. Образ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в официальном дискурсе: Поиск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2013. №.11. С.39-49; Назукина М.В. Арктические смыслы в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Лабиринт. Журнал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3. №.5. С.059-068; Мартьянов В.С. Переосмысляя арктику: Дина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Научный ежегод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Урал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3. Т.13. №.1. С.83-96;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Elana Wilson Rowe, Helge Blakkisrud, “A New Kind of Arctic Power? Russia’s Policy Discourse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the Circumpolar North”, *Geopolitics*, 2014, Vol.19, No.1, pp.66-85.

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就是国家内部层面的北极宏观区域身份建构。其中，国内层面的进程，主要与俄联邦内部临近北极的联邦主体相关，主要体现为两大议程：一是俄北极宏观区域维度，即俄联邦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建构、识别问题，涉及“北极”联邦主体与“非北极”联邦主体之间的关联与区分；二是俄北极宏观区域内部的地方维度，涉及俄联邦北极宏观区域内各联邦主体内部，以及联邦主体之间“北极身份”的建构与争夺行为。在当代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一方面，“北极地区”尚未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统一、明确的空间概念而存在；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话语主体，正在加入到“北极身份”相关的话语交锋、意义争夺活动中来。本研究将从区域身份的视角出发，详细探讨当代俄罗斯联邦内部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

一、身份视角下的“区域”概念重构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至 70 年代初，“区域”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开始进入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针对“区域”这一概念，国际政治学者们曾进行大量讨论。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区域是“基于地理上的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而导致有限数量的国家联系在一起”。^①布鲁斯·卢塞特(Bruce M. Russett)基于行为主义的方法，将区域界定为“地理上的临近性、社会和文化相似性、共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相互依赖等因素的综合”。^②坎托瑞(L.J. Cantori)和斯皮盖尔(S.L. Spiegel)则将区域界定为“包含两个以及更多的、在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方面不断互动的国家”^③，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区域的界限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以欧盟的建立和发展为标志性事件，

①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p.vii.

②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7, pp.1-13.

③ Louis J. Cantori, Stev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70, pp.6-7.

“区域”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心；关于区域边界的不确定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论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区域”概念在全球、区域和国家等不同层面上，以复杂的形式不断“消失”和“重现”，学者们开始以“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等概念，论证区域边界的模糊性与变化性。^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建构主义^②为发端，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发生了语言转向，为“区域”的界定与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视角。

奥努弗（Nicholas G. Onuf）最初提出“建构主义”这一概念，批判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的静态物质论视角，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和变化性。从这一视角出发，国际政治中的“区域”概念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动态性，区域可以看作是“想象的共同体”，由有共同经历、共同身份、共同风俗、共同实践的国家 and 人们组合在一起。^③“区域”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通过共同制度和经济纽带得以不断加强的认知结构。^④现代语言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事实和社会知识由语言建构，理解社会事实就是揭示社会事实是如何被语言建构的过程。^⑤如菲尔克（K.M. Fierke）就坚持认为，国际关系的不同现象是行为者之间进行的不同语言游戏，因此语言游戏是理解语言如何建构社会事实的核心概念。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区域的形成是一种规则、规范建构的结果：行为者通过语言符号构建出不同的与“区域”相关的游戏规则，进而从认知层面到现实层面，不断建构出不同层次的宏观区域、微观区域和各种地缘环境。国际政治中各行为体的言语行为均具有规范的含义，各行为体之间

① Levis Martin,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50-154.

② 根据伊曼纽尔·安德勒（Emanuel Adler）的界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包括：现代建构主义、现代语言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参见 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96-98.

③ Emanuel Adler, “Imagined Security Communities: Cognitive Reg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1997, Vol.26, No.2, pp.249-277.

④ 王在亮、高英彤：“国际政治学中‘区域’概念重构及现实考量”，《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 24 页。

⑤ 聂文娟：“现代语言建构主义及‘实践性’的缺失”，《国际政治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的沟通交流过程，就是对规范进行解释、应用并寻求主体间共识的过程；因此与“区域”相关的国际制度、法律体系，均与行为体的言语行为密切相关：言语行为建构规则、规范，规则、规范形成制度，制度作用于社会现实层面，并最终形成“区域”。

后结构主义、后建构主义则倾向于将“身份”和“语言”（话语、叙述）视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问题的关键，也为“区域”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后结构主义基于语言的本体作用，强调语言的认识论意义，认为可以通过话语来分析行为体的身份与对外政策，通过研究话语来认识身份与政策的互构关系及演变过程。^①语言具有建构性、政治性和社会性，具有本体意义。因此，包括国家、“区域”在内的一切事物，只有通过语言的建构才能被赋予意义，并获得特定身份，不存在语言表象之外的“客观”意义；而语言所体现出的差异性与相关性，对建构特定身份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有在一系列“我-他”关系的区分与关联过程中，身份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并逐渐清晰化。从这一角度说，在语言表象之外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区域”概念，“区域”在各行为体的话语中不断获得其特有的意义与身份，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也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界限。身份和政策通过话语相互建构，因此身份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动态性，通过话语建构的“区域”身份，同样具有不稳定性和动态性。通过对区域内各行为体的话语及政策的研究，可以对该区域概念进行解构，并不断为该区域身份赋予新的意义。

以马特恩（J.B. Mattern）为代表的后建构主义，则进一步突显了语言和身份在理解国际秩序和创造国际制度方面的核心地位^②，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语言力，是一种权力，语言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③与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目标不同，后建构主义承认宏大叙事，重点强调语言产生的整体叙述、叙述间的语言和逻辑，以及权力对行为体行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认为身份是国际秩序的充分原因，是通过彼此叙述产生的一种主体间认同，是社会语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258页。

② Brian McCormack, “Uncovering the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5, Vol.7, No.3, p.500.

③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言建构的结果，在实践中需要通过语言叙述来维持和发展。^①因此，在后建构主义理论视域中，区域是在该区域内的各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彼此叙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主体间认同：语言造就了一种叙述结构，这种叙述结构可以约束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从而影响区域内部行为体的集体身份和行为；任何区域的存在，都需要其内部行为体通过不断的语言叙述来维持，而通过语言的使用，区域的身份内涵能够得以调整和改变。区域的相关规范可以通过语言力的各种表现形式（权威、说服、吸引、操控、表象力等）^②，在区域内部以及外部空间得以传播。

“身份”概念对于北极宏观区域相关行为体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以及相关战略的制定以及具体政策的实施，均有着极佳的解释力。在“身份”视角下，本文讨论的“北极宏观区域”并不具有绝对客观、稳定的内涵与边界，而是一个与主体间认同相关的、由语言（话语、叙述、言语行为等）建构的“认知结构”、“宏大叙事”和“话语体系”。以2019年4月结束的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为例，普京在其发言中指出：“……俄罗斯不是北极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购买力平价和体量方面排名第一……就购买力平价和经济体量而言，我们现在排在第六位。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我们排在第六位。”^③很显然，在自然地理意义上，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并不能被列入北极国家的行列。但在此次论坛上，普京通过巧妙的叙述策略，通过话语，为中国等国家建构了一个与主体间认同相关的“北极身份”，从而将更多的国家纳入了北极地缘空间之中。从这一角度看，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和区域身份，具有极强的关系性和话语性，需要通过对“自我”和“他者”的叙述建构出来。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320页。

② 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3-14.

③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9 апреля 201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250>

二、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宏观区域身份的话语建构

在当代俄罗斯的现实语境中，虽然北极宏观区域作为该国特殊的战略区域，官方层面认可北极对当前俄罗斯国家战略、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北极”也越来越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构“大国”身份的关键所在。但是，北极地区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其在当代俄罗斯国家内部的宏观区域身份，仍然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仍然存在很多因素阻碍“北极”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概念而独立存在于俄民众的认知之中。这既与“区域”概念的复杂性、动态性相关，也是由北极宏观区域自身地缘环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事实上，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宏观区域身份的识别、认同与建构的复杂性，并不只有北极宏观区域这个个案。

一个区域可以被理解为与其他既定区域边界分离的独立领土空间，是一个区域社群与其共有文化记忆、“世界图景”之间的交流系统；区域发展并不受既定的行政空间边界的限制，可以在行政区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稳定的宏观区域身份。^①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基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俄罗斯宏观区域及其身份，在保留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不断重构的过程之中。因此，俄罗斯一些宏观区域的历史名称与现实名称存在差异，而同一名称的内部、外部认知，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同时，政策层面的行政区域划分同样经历着变化。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层面的区域划分与认知层面的区域身份认同，并非一直处于平衡状态。这种身份与政策的非平衡状态，经常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并反映在话语层面。

以俄罗斯中央联邦区为例。根据2000年5月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②，中央联邦区下辖18个联邦主体：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弗拉基米尔州、沃罗涅日州、伊万诺沃州、卡卢加州、科斯特罗马州、库尔斯克州、利佩茨克州、莫斯科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坦波夫州、特维尔州、图拉州、雅罗斯拉夫州和莫斯科市。

①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Назукина М.В., Михалева А.В., Бедерсон В.Д., Клещев Д.В., Мартынов В.С., Киселе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ктика в поисках интег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5.

② 刘向文：“谈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全权代表制度”，《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而根据 2019 年 2 月出台的《2025 年前空间发展战略》，中央联邦区的 18 个联邦主体分属中央宏观区域（Центральный макрорегион）和中央黑土宏观区域（Центрально-Чернозёмный макрорегион）。联邦区与空间发展战略不同的领土划分方案，可以理解为政策出发点的差异。即，联邦区的设立主要以国家治理相关的中央-地方权力体系为导向，空间发展战略中的宏观区域则更多基于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关联性。事实上，无论是中央联邦区还是中央宏观区域、中央黑土宏观区域，俄罗斯的这一以“中央”命名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实际位于俄罗斯联邦的西部。该区域的外部、内部身份认同层面，实际涉及了“中央（Центральная）”和“中部（Средняя）”两个概念，指向不同的身份认知。这一宏观区域在媒体话语中，经常被称为“俄罗斯中央地区”（Центр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这一概念首先是非常明确的历史性身份话语，关联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历史中的核心地位^①（如“政权改变，沙皇崩溃，苏维埃政权离开，叶利钦主义消失，但俄罗斯中央地区仍然贫穷，比其周边地区更加贫穷”^②）。同时，在现实语境中，这一地区的领土围绕着俄罗斯联邦的首都，在当代俄罗斯占据着“中心”的地位（如“在下瓦尔托夫斯克的汉特曼西自治区政府，《消息报》被告知，这里是西西伯利亚，不是莫斯科也不是俄罗斯中央地区”^③）。另一方面，在这一宏观区域内部，尤其是在俄乌边境的森林草原区，“中部地带”（Средняя полоса）似乎是一个更受当地居民认可的概念。^④它指向一个较为模糊的、没有明确边界的地理概念，同时作为身份话语的“Средняя”弱化了“Центральная”的历史性与政治性，更倾向于框定该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如“俄罗斯游客偏爱的传统目的地如下：最喜欢的永远是俄罗斯的中部地带，其次是埃及、

① Горизонтов Л.Е. Внутренняя Россия и е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воплощ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тратеги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и опыты обновления. Воронеж, 2004.

② Израэль Шамир. Русский марш в никуд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5 ноября 2013. <https://www.kp.ru/daily/26154/3043105/>

③ Светлана Субботина.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 составил антирейтинг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ов// Известия. 11 февраля 2014. <https://iz.ru/news/565385>

④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Назукина М.В., Михалева А.В., Бедерсон В.Д., Клещев Д.В., Мартьянов В.С., Киселе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ктика в поисках интег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С.11.

滑雪度假村、土耳其、阿联酋、泰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①；“在这一地区持续高压的影响下，整个中部地带，从西部边界到乌拉尔山麓的丘陵地带，都会继续呈现出平静的金秋风貌”^②）。官方和民间不同话语主体的身份话语选择，很好地反映出了在当代俄罗斯现实语境中，区域政策与区域身份自我认同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而两种身份话语综合作用，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共同持续建构了当代俄罗斯内部的宏观区域身份。

后结构主义认为，身份通过语言建构，具有政治性、关系性、社会性等特征^③：身份建构是争夺意义的过程，充满权力斗争；身份的建构同建构“自我”与“他者”密切相关；身份需要通过一系列集体主体间认可的符号才能建构完成。话语主体的不同主观诉求，往往能够导致截然不同的话语行为，不同的身份话语选择也往往能够区分不同身份的话语主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和“北高加索”概念一起，“俄罗斯南部”（Юг России）或“俄罗斯的欧洲南部地区”（Европейский Юг России）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二者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形成了一对竞争性的身份话语。

从身份视角出发，围绕着“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两个竞争性身份话语展开的话语互动，反映出的是两个话语主体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一方以该地区长期以来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共和国为主，另一方则以该地区说俄语的移民群体为主。北高加索各民族共和国分离主义倾向的滋长，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军事活动，使得“北高加索”概念经常和“动荡”、“恐怖主义”等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一地区又是俄罗斯传统的移民区（如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由于历史上中亚国家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动乱，使大批移民拥向这个温暖、富足的地区，形成了一些移民社区^④）；长期在这一地区居住的说俄语的居民，在认知和话语层面，希望同“北高加索”这一不安定地区保持距离。因此，“俄罗斯南部”

① Анна Попова. Новый год россияне проведут дома// РБК Daily. 14 ноября 2015. <https://www.kp.ru/daily/24405.3/579753/>

② Фонд Фобос. Адожди ещё летние// Труд-7. 29 сентября 2005. http://www.trud.ru/article/29-09-2005/94351_a_dozhdi_esche летnie.html

③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63页。

④ 戴艳梅、刘肖岩、徐祗朋：“《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解读与分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4期，第53页。

成为一种参与身份建构的核心话语，围绕着这一核心话语产生的话语策略、叙述策略即是通过“俄罗斯南部”这一概念的使用，建构与“北高加索”以及相关“他者”身份不同的“自我”。而且，“俄罗斯南部”概念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为这种有意识的身份建构行为提供了施动性空间，为解构既有主导话语和既有事实提供了可能性。移民地区的俄语社群有一定的意愿，将“俄罗斯南部”的概念进行拓展性叙述，在身份话语中弱化“高加索”而突显“俄罗斯”因素；通过话语将这一地区由“民族区”（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регион）框定为“移民区”（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进而达到以“俄罗斯南部”取代“北高加索”概念的目的。

作为“俄罗斯南部”身份话语建构的结果，“俄罗斯南部”在当代俄罗斯语境的一些文本中获得了和“北高加索”并列的地位。如，“俄罗斯南部和北高加索地区，已经成为天然气燃料使用方面的领导者：在许多地区，大多数公共交通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气燃料，私家车主也越来越喜欢这种类型的燃料”^①；“温诺梅斯克地区发电站是为俄罗斯南部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提供能源的四个发电厂之一”^②；“她是‘俄罗斯南部’和‘北高加索’文化艺术协会协调委员会成员，是该政府组织中唯一的非官方人员”^③等。

“俄罗斯南部”和“北高加索”这一对身份话语的交锋，同样延伸到了政策层面。在2000年5月首次划分联邦区时，最初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仅仅存在了一个月之后，便更名为“南部联邦区”；直到2011年1月，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命令，将南部联邦区的若干区域划分出来，组成了俄罗斯第八个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联邦政策层面的这一系列行为，一方面体现出了这一地区对于俄联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这一地区两个基本身份话语之间的意义争夺在政策层面的反映。这体现了身份话语本身的不稳定性：话语达到绝对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政策和身份之间的联系或是对

① Юг России и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активно переводят транспорт на газомоторное топливо. 31 октября 2017. <https://tass.ru/ekonomika/4691146>

② Мария Жебит, Владислав Кузьмичев. Итальянцы добавят энергии Олимпиаде в Сочи// Известия. 17 июля 2011. <https://iz.ru/news/494802>

③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а. В Доме кино покажут фильм «Страсти по Владиславу»// Известия. 06 ноября 2012. <https://kino.rambler.ru/movies/16250065-v-dome-kino-pokazhut-film-strasti-po-vladislavu/>

身份的表达也不会绝对稳定。一旦身份与政策处于不平衡状态，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并显著反映在话语层面。比如 2012 年 12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一项联邦目标计划“俄罗斯南部（2014–2020）”，该计划是联邦目标计划“俄罗斯南部（2008–2013）”的延续，其主要对象就是北高加索联邦区：如“减轻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由于教育机构缺乏、人口医疗服务水平不足，而导致的社会紧张状况”等。^①“俄罗斯南部”和“北高加索”两个概念频繁交替使用，导致了有趣的话语交锋，例如，有媒体讨论了“俄罗斯南部（2014–2020）”计划对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使用了标题《北高加索加入了“俄罗斯南部”》，并引述时任俄罗斯联邦地区发展部部长伊戈尔·斯柳尼亚耶夫（Игорь Слюняев，后更名为伊戈尔·阿尔滨 [Игорь Албин]）的评论：“北高加索地区是我们活动的战略方向之一……去年 12 月通过的‘俄罗斯南部（2014–2020）’联邦计划绝非偶然。”^②

另外，作为当前俄罗斯重要战略区域的远东地区，其宏观区域身份在 21 世纪以来，也正在经历着非常大的转变。在远东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地区人口稀少，主要由西伯利亚居民、哥萨克人和农民构成。随着 19 世纪中叶起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远东其他大城市逐步建立，在自然环境、民族来源、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与“流放”、“监狱”等特定历史事实相关的文化定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远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民族社群。“远东”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身份开始广泛传播，即使在该地区居民移居其他地区或者海外后，仍然会在其认知中保留这一独立身份的特征。^③进入 21 世纪以来，远东地区越来越走入俄罗斯国家战略的中心地带，成为俄罗斯最为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尤其是 2012 年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成立之后，远东地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对俄罗斯联邦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的宏观区域身份。而另一方面，“远东”概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6 декабря 2013 г. №.1297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целевой программе Юг России (2014-2020 годы)»// ГАРАНТ.РУ. <http://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456942>

② Олег Пономарев.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вступил в «Юг России». http://kavpolit.com/article/s/severnyj_kavkaz_vstupil_v_jug_rossii-3867/

③ Куминов 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и---как новая этниче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http://polusharie.com/index.php?topic=98087.0>

念在人们的认知中，经常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历史层面的诸多负面联想相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与现阶段该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形成了一种非平衡关系，阻碍了新的宏观区域身份的形成与传播。

当前远东地区的宏观区域身份正处于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之中，并开始表象于话语层面。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巴克拉诺夫(П.Я. Бакланов)曾指出：“远东这一名称本身就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另外，远东联邦区的区域发展依赖太平洋。从这一角度看，‘俄罗斯太平洋区域’要比‘远东’这一名称，能更好地体现出这一区域的海洋属性。”^①而德米特里·罗戈津(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也曾发表过对远东地区进行重新命名的言论，并提议将远东地区命名为“俄罗斯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如何正式命名它，而在于我们对俄罗斯这一最有希望的领土的态度和关注……21世纪的命运将由亚太地区决定，而俄罗斯的东方地区对于我们来说不应该是‘远’的。新的发展将从那里开始。”^②关于远东地区更名问题的讨论，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即是宏观区域身份的话语性：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叙述中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来实现。“远东”概念通过“远”这一用语，突显了这一地区同俄罗斯联邦其他主体之间的差异；而“俄罗斯太平洋区域”则将该地区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太平洋”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赋予了这一地区以“中心”的地位，重构了该地区的身份。

可以看出，对当代俄罗斯宏观区域身份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作，因为区域身份本身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并且和官方政策层面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政策的制定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处于不断重构过程中的身份，以获得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2019年2月，俄罗斯联邦《2025年前空间发展战略》的正式出台，以及“远东发展部”正式更名为“远东与北极发展部”，是近期俄罗斯官方层面上与宏观区域身份建构相关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与前文讨论的“俄罗斯中央地区”、“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

① Аверченко В. Ребрендинг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Expert Online. 30 ноября 2012. <http://expert.ru/2012/11/30/rebranding-dalnego-vostoka/?n=172>

② Рогозин объяснил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ереименовать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ИА Новости. 15 ноября 2013. <http://ria.ru/politics/20131115/977142756.html>

“远东”相比，俄罗斯北极地区无疑是更具复杂性的一个宏观区域。传统上，“北极”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范畴，通常和西伯利亚、远东等地区一起被讨论。近年来，由于丰富的矿物储备（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全球气候的显著变化，北极地区在全球语境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北极地区在俄罗斯也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其他联邦地区的特殊地位。在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北极正重新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语境中的热点议题。俄罗斯北极地区独立的宏观区域身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来源于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需要。俄罗斯北极地区人口稀少，因此该地区的宏观区域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独特性，在于“自下而上”的、来源于民众内部的身份认同相对缺失，而更多地依赖于政策层面的官方主导。这种“自下而上”身份认同的缺失，客观上决定了该地区宏观区域身份的建构必须有更多话语主体的加入，通过更多维度，在更广范围内将该地区与其他不同“自我”、“他者”的并置，通过更多层次的区分过程和关联过程，才能让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宏观区域身份趋于清晰化。

三、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建构的官方政策导向

从当代俄罗斯宏观区域身份建构的视角看，2019年2月正式出台的《2025年前空间发展战略》^①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一份涉及俄罗斯最高战略规划的文件，是一份重组俄罗斯空间的计划。在俄罗斯联邦的最新历史中，为规划其171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系统重组，做出了首次尝试。根据该战略，俄罗斯基于领土特征被划分为12个宏观区域：中部宏观区域，中部黑土宏观区域，西北部宏观区域，北部宏观区域，南部宏观区域，北高加索宏观区域，伏尔加-卡马宏观区域，伏尔加-乌拉尔宏观区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宏观区域，南西伯利亚宏观区域，安加尔-叶尼塞宏观区域以及远东宏观区域。该战略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时期的经济区域化经验，增强了这些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以及俄罗斯广大领土的连通性。一方面有

^①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о 2025 года. 14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government.ru/docs/35733/>

利于恢复经济区域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创造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茹拉夫廖夫（Дмитрий Журавлёв）认为，该战略从概念上确立了每个宏观区域将具有的主要发展方向，但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期不同，“没有宏观区域预算，也没有宏观区域税收和宏观区域发展目标”，因此宏观区域战略在现阶段更多具有一种象征性意味。^①但在未来，该战略或许预示了俄罗斯国家治理方向的一种转变。近 20 年来，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治理制度，“实际上是由莫斯科这一单一控制中心统一起来的”；“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由于其自然、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多样性，由单一控制中心管理所有进程往往会适得其反”^②；而《2025 年前空间发展战略》的出台，是俄罗斯当局尝试为现有管理系统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在这一替代方案的语境中，俄罗斯各大宏观区域，将在俄罗斯联邦整体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主体性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各宏观区域身份在未来的转变与重构，无疑将成为俄罗斯官方关注的重中之重。

波德温采夫（О.Б. Подвинцев）等学者认为，宏观区域身份可以分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建构方式和相应的研究方式。一是价值-情感范式，即区域身份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个地区的人口因素和领土因素，而是在获得与特定的文化历史现象相关的共同特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基于共同性的自我身份识别过程。^③正如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言，行为体身份是靠族群的集体记忆、神话叙述、风俗仪式等内在的历史现象建构的。^④因此，这种身份建构即是前文所述的“自下而上”式的建构方式，基于区域-地缘因素和民族-社群因素，是一个社群在某一区域内长期共同生活、实践而形成的一种共同“自我感觉”。

俄罗斯北极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导致在该地区内长期居住的人口稀少，缺乏形成共同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自发性集体记忆、神话叙述等历

① Макрорегионы РФ: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пы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йонирования? 15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2573657.html>

② «Попытка вернуть управляемость»: о разделении России на макрорегионы. 15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573908.html>

③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Назукина М.В., Михалева А.В., Бедерсон В.Д., Клещев Д.В., Мартьянов В.С., Киселе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ктика в поисках интег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5.

④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 210 页。

史现象形成的族群基础也相对缺失，造成的结果就是，来源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内部的、“自下而上”式的身份认同缺失。基于同样的原因（自然环境、人口），俄罗斯北极地区同俄罗斯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同样不存在很强的、自然状态下生成的关联。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并不为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所熟知，导致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在内部身份认同缺失的同时，同样也缺乏来自俄罗斯其他非北极地区的外部身份认同。因此，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第二种区域身份建构方式，聚焦于区域空间内部身份意义的创造、设计和操控的实践^①，即，更倾向于探讨外部因素在区域内部身份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政策层面**对于区域身份意义的“创造、设计与操控”。

在《2025年前空间发展战略》中，北极地区对于俄罗斯联邦显著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了确认：“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法令被列入或部分列入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联邦主体或部分主体”，被认定为俄罗斯联邦的**地缘战略优先区**。但有关这里的“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联邦主体或部分主体”，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俄罗斯官方在北极宏观区域的区域划分、身份识别与建构等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不够稳定和完美。到目前为止，有关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基本法还没有出台。在俄联邦总统于2008年9月签署的《2020年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则》中，根据1989年4月22日苏联部长会议北极事务国家委员会^②的决定，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被定义为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萨哈共和国、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涅涅茨、亚马尔-涅涅茨和楚科奇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领土；而对于1926年4月1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法令中规定的“位于北冰洋的苏联领土”，以及与之毗邻的土地和岛屿、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

①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Назукина М.В., Михалева А.В., Бедерсон В.Д., Клещёв Д.В., Мартыанов В.С., Киселев К.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ктика в поисках интегр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5.

②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Арктики.

大陆架，俄罗斯依据国际法均拥有主权和管辖权。^①2014年4月，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的《2020年前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对之前的文件进行了修订。其中“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土地构成”，只包含四个完全属于“北极地区”的联邦主体：摩尔曼斯克、涅涅茨、亚马尔-涅涅茨和楚科奇自治区。阿尔汉格尔斯克只有北部属于北极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只有三个自治市属于北极地区，萨哈共和国则有五个北方的乌卢斯（улус，萨哈共和国境内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属于北极。因此，根据这一规划，对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萨哈共和国而言，官方层面的“北极”只是其边缘地区（根据2019年5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萨哈共和国内部的“北极地区”增加到了13个）。另外，科米共和国的沃尔库塔市也被列入了“俄罗斯北极地区”。^②2014年5月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令“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陆地领土法令”，确认了这一区域范围。^③2014年4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④于2017年8月进行了修正，时间节点延长到了2025年。^⑤在该版国家规划中，俄罗斯北极被划分了8个发展“支柱区”：科拉地区（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涅涅茨地区、沃尔库塔地区、亚马尔-涅涅茨地区、泰米罗-图鲁汉斯克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北雅库茨克地区和楚科奇地区。2017年11月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提交的“有关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的法律草案（之后该法律草案被搁置），同样确定了以上8个“支柱区”。基于以上8

①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 и дальнейш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рта 2009 г. <https://rg.ru/2009/03/30/arktika-osnovy-dok.html>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 апреля 2014 г. N 366 г. Москва.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апреля 2014. <http://www.rg.ru/2014/04/24/arktika-site-dok.html>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2.05.2014 г. N 296 «О сухопут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8377>

④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AtEYgOHutVc.pdf>

⑤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 апреля 2014 г. № 366. 31 августа 2017.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GGu3GTtv8bvV8gZxSEAS1R7XmzloK6ar.pdf>

个“支柱区”，俄罗斯的北极地区计划将建设成为一个“丰富而成功的工业宏观区域”。该“工业宏观区域”的区域范围，与之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陆地领土法令”所确认的“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尽管“北极地区”在《2025年前空间发展战略》中被整体框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战略优先区”，但另一方面，虽有专家曾建议将北极地区列为单独的宏观区域以维持政策的统一性与连贯性，但是在此次出台的战略文件中，**单独的“北极宏观区域”并未出现**。比如摩尔曼斯克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涅涅茨地区，就分属西北宏观区域和北部宏观区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位于安加爾-叶尼塞宏观区域；亚马尔-涅涅茨和楚科奇自治区，则分属乌拉尔-西伯利亚宏观区域和远东宏观区域。

远东与北极发展部的成立，是近期俄罗斯官方层面对于北极宏观区域身份意义建构的另一项标志性事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专家学者提出了类似于“远东”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提议，即“将北极地区的所有问题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宏观区域，并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管理对象”。^①这一议题在2019年也获得了俄罗斯官方层面的回应，普京于2019年2月26日签署总统令，批准成立“远东与北极发展部”。之后在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普京表示，“我们远东发展部的权力得到了延展：现在北极已经成为这一部门职责的一部分。”^②俄罗斯官方正在积极塑造一种必须将北极与远东地区一起协调管理或特殊对待的共识，进一步确认了北极地区在当代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但另一方面，北极地区在政策层面并未建立一个如之前“远东”和“北高加索”一样的独立管理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归因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界限的不明晰性，以及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通过一系列官方文件和政策的出台，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北极地区不断地从国家海洋战略、国家安全、综合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现代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安全、北极地区国际合作等各个角度，被赋予

① Арктика – наш дом. 12 октября 2012. <http://narianmar.bezformata.ru/istnews/arktika-nash-dom/8319830>

②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09 апреля 201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250>

新的内涵与意义。同时，现有政策的共性，是更多立足于俄罗斯联邦整体的国家战略，“北极”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战略地区”或者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其对于俄罗斯联邦“北极”这一区域的划分，并不是依据区域内部的历史传承性因素和主体间认同因素，而是更多从现实战略需求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将“身份建构”作为其政策制定的首要参考因素。这种依赖政策的身份建构行为，将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身份-政策二元关系过于依赖官方政策以及官方话语的维系而形成一种非稳定状态，这种非稳定状态将最终影响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俄罗斯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不断突显“北极”作为一个区域的战略价值；而在国家内部层面，在北极宏观区域的区域划分、身份识别与建构等问题上的官方立场，不够稳定和完美。“北极”作为一个区域的边界，在官方层面和民众层面，始终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俄罗斯北极地区来说，在“自下而上”式的建构方式相对缺失的背景下，其稳定的、确定的区域身份获得，需要依赖官方政策话语之外的、更多来自其他方面的建构因素支持，尤其是需要其他话语主体长时间、多角度的持续建构。

四、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多维话语建构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身份本身具有行事性，其形成实际上是一个话语过程。通过将不同的事物置于同一话语系统之内，并通过语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来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建立一种使“自我”能够被“他者”理解的集体编码，最终通过语言建构和再造某种主体性和身份，同时将其他的身份和主体性排除。费尔克拉夫(N. Fairclough)^①、沃达克(R. Wodak)^②采用后结构主义视角，把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和再现社会现实的方式。基于话语的社会实践观，沃达克把话语界定为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的陈述。

① 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Researching Language in the New Capitalism: Overdetermination,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Textual Analysis", in C. Harrison and L. Young(eds.), *Systemic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04, pp.103-122.

② R. Wodak, "What CDA is about -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GE Publications, 2001, pp.1-13.

这一定义比较适合界定围绕某一议题而产生的系列话语。^①因此，围绕“北极”相关议题而产生的话语，即可被界定为“北极话语”。

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北极话语本身即是一种与“北极”相关的完整、多元意义框架，建构了一种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相关的意义体系，框定了人们对于该宏观区域的“定位、感知、理解和标记”。^②因此，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建构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北极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该区域身份意义的“创造、设计与操控”过程，体现在“北极话语”的关系性、话语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中。尤其是在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自下而上身份建构路径相对缺失的大环境下，该区域更需要通过官方、媒体、企业和学术界等不同话语主体的长期多维话语实践，建构与“北极”相关的主体性与宏观区域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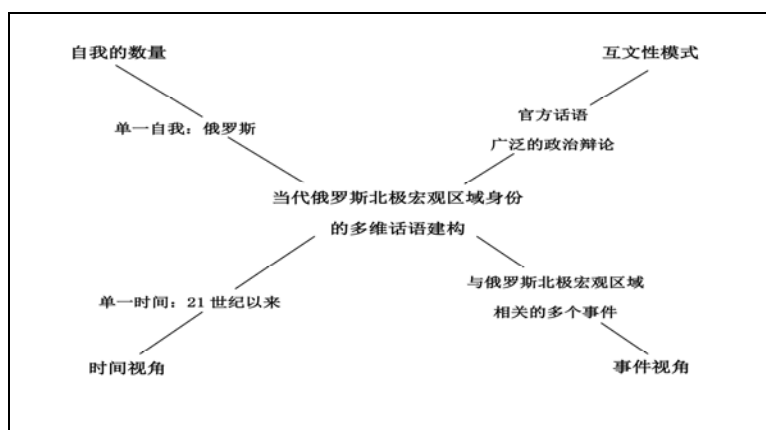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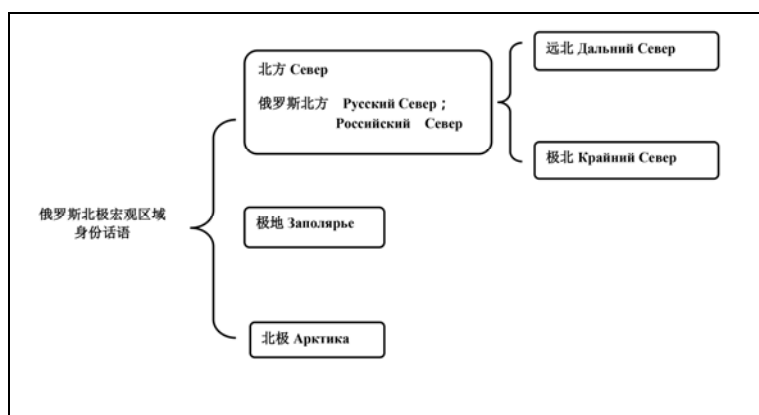
在当代俄罗斯的北极话语体系中，同时存在多个竞争性身份话语，围绕着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意义体系。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涉及不同政治行为体的一系列有关不同“他者”和多元“自我”的身份建构行为。这一过程不仅仅是通过对“他者”和“自我”使用单一特殊符号而完成，而是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北极“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之中。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最重要的三个身份话语，分别为“北方（Север）”、“极地（Заполярье）”和“北极（Арктика）”。其中“北方”在具体语境中常以“俄罗斯北方（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的形式出现，并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次级身份话语范畴：“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和“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不同的话语主体在使用“北方”、“极地”和“北极”等身份话语时，常根据不同的议题和语境选择特定的概念，展现出一定的无意识倾向。几种竞争性话语的同时存在，说明在当代俄罗斯内部，关于北极宏观地区，缺乏有关其组成部分、边界以及相关意义体系的统一既定看法，同时也为研究者从多方面了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身份内涵提供了可能。

本文的研究设计借鉴了汉森（Lene Hansen）提出的后结构主义互文研

① 赵秀凤：“能源话语研究的体系与范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1.

究模式，结合具体的研究目的（即重点探讨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而非针对具体事件的对外政策研究），大体采用“官方话语”、“广泛政治辩论”的互文研究模式。即，广泛选取俄罗斯中央及地方政府、领导人、高级公务人员等关于北极的官方话语，以及演讲、声明、媒体社论、学术文本等其他与北极相关的政治话语，尝试分析当代（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相关话语体系的内在稳定性。本文倾向于以宏观语境的视角，解读不同议题中各“身份话语”所表象的意义体系，以及在其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无意识趋势。



（一）“极北”与“远北”：空间维度的激进他者^①

有关身份政治建构的传统理论框架认为，建构一个与自我迥异的“激进他者”，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突显我-他之间的差异程度，将非常有利于建构自我的身份。从历史上看，政治领导人经常通过将其他国家、移民、特殊群体等建构为对本国安全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威胁，以赋予自身政治行为合法性。在俄罗斯北极语境中，北极宏观区域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领土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方面具有迥异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他者特征”。因此长期以来，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在话语层面是作为“他者”出现的，与作为“自我”的俄罗斯国家、俄罗斯人民等联系起来。基于“关联”、“区分”策略的不同，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在不同的文本中，被表象为“积极身份”和“否定身份”^②两种截然不同的他者身份，并且与不同身份话语的使用密切相关。

正如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所说，表述激进的他者以建构自我的身份，需要建构一系列“诸如本身邪恶的、非理性的、不正常的、疯狂的、病态的、原始的、怪物般的、危险的以及无政府状态的”^③他者特征。从这一角度出发，“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和“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这两个身份话语所指向的意义体系，与上述“激进他者”的特征非常吻合，表象出的是典型的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否定他者身份”。“远北”这一概念的产生和“远东”概念相似，尤其与沙皇和苏联时期监禁、流放等负面历史认知相关（如 20 世纪 30-50 年代参与远东、“远北”地区建设的劳改营“Дальстрой”），是较为典型的历史话语；相比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远东”概念，“远北”话语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已经较少出现。而“极北”概念因与该地区自然地理相关的客观认知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今天的俄罗斯语境中，使用较频繁。

作为身份话语的“极北”，在具体的北极话语文本中经常与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关联。在本研究中，主要通过从政治话语、学术研究和媒体新闻

① 激进他者，或称极端他者，即，负面的、否定的他者。

② [丹]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孙吉胜、梅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③ W.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p.65.

三个角度，对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极北”话语为当代俄罗斯学界（学术话语）、舆论界（媒体话语，包括社论、新闻等）所广泛使用。“极北地区”经常被框定为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一个非理性的、原始的、危险的、“不正常”的俄罗斯领土，一个在多数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没有明确身份认同感的“激进他者区域”。

在学术话语中，“极北”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与北极地区人类生存相关的自然条件、医学、健康问题、未成年人成长，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关。例如“在伴随着极端生活条件的地区，包括极北地区，改革的负面结果尤其严重，未来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将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①；“极北地区包括俄罗斯领土位于北极圈以内的部分，包括北极地区、苔原带、森林苔原带和针叶林带。极北地区的气候非常恶劣，因此该地区的公共健康受到许多不利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气象和地球物理因素、光周期特征等”^②；“人类受到极北地区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常年低气温以及长时间的极夜，将导致抑郁状态的形成”^③等。持续性、专业性、稳定性等特点，使得学术话语成为当代俄罗斯语境中“极北”，以及更广义“北方”相关宏大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建构出了稳定的背景知识，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民众对于该地区的情感认知。

与“极北”相关的学术话语，包含针对某些议题的持续性深入研究。与之相比，媒体话语中的“极北”概念表象出的区域身份，呈现出另外一些特点。首先，一些媒体话语中的“极北”同样指向该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例如，“事实上，当我只有 21 岁时，我就经历过死亡。当军队去极北地区工作之后，我开始感冒，并且有严重的并发症。然后我清楚地知道我有可能就此离开，年纪轻轻，没有成为任何人，没有任何成就地离开”。^④在以上叙

① Алексеев А.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агро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рынка крайнего севера//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дело России. 2010. №.5. С.84-86.

② Семенова Н.Б. Роль социаль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аффективной патологии на крайнем севере// Здоровоохран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2. №.2. С.23-27.

③ Петрова О.Н.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адаптации педагог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крайнего севера//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И. Герцена. 2008. №.51. С.265-268.

④ Мигулина Катя. Скромное обаяние брачной церемонии// Труд-7. 25 сентября 2008.

述中，有关“极北”这一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劣性，实际已经作为背景知识存在于文本的语境之中。有关“极北”的媒体话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更多地将“极北”与其他的地理概念并置，以区分出“极北”地区的“特殊性”。如“当代艺术展览即使在最不寻常的城市空间中，也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常见的生活特质。而在极北，摩尔曼斯克，俄罗斯，国家当代艺术中心和马拉特·盖尔曼的项目都还没有来到过这里”。^①关联了“极北”、“摩尔曼斯克”和“俄罗斯”三个不同维度的区域概念，强调该地区在艺术展览方面和世界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极北”概念无疑为这种差异提供了充分的原因。又如“将自己的生活和这些穿制服的人绑在一起，我知道这会很难。但是我们爱这些人，并且准备好追随他们去到世界的尽头。开车去极北地区，去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他们正在阿富汗和车臣等着她们。打电话，敲门——无家可归者的妻子写道”。^②这一叙述更是将“极北”同“西伯利亚”、“高加索”、“阿富汗”、“车臣”等历史和现实中的遥远的、不稳定的区域进行强关联，将这些地区框定为“世界的尽头”，并将话语主体框定为“无家可归者的妻子”。事实上，通过“远离家乡”、“战争”等因素，赋予了这些地区以特殊他者身份。这一叙述策略，同样离不开当代俄罗斯语境中与“极北”相关的负面认知和“否定身份”。

话语可以建构世界常识，可以把某些事物和身份变为一种“真理统治”（regime of truth），并在话语的传播过程中为人们提供背景能力，使得一些事物和身份作为常识被人们所接受，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图示，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远北”、“极北”相关的语境中，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被建构为遥远的、拥有极端自然条件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空间；与诸多自然的、历史的负面认知相关联，更多地表象出一种北极地区区别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常识。这也使得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被“远北”、“极北”话语建构为一种“拥有极端自然条件的”、“遥远的”、“寒冷的”，与“死亡”等意象相关的极端他者。

① Олег Краснов. Новые ходки за полярным кругом// РБК Дейли. 19 сентября 2013. <https://www.pressreader.com/russia/rbc/20130919/281835756391191>

② Елизавета Маетная. Жены бездомных офицеров написали письмо Людмиле Путиной // Известия. 03 июля 2012. <https://iz.ru/news/529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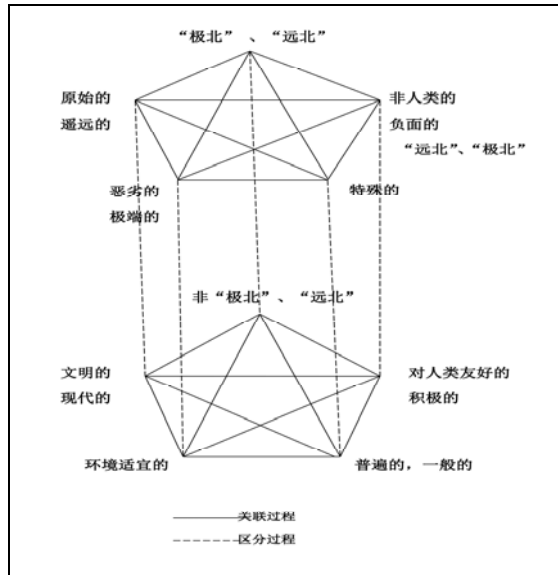


图3 “极北”、“远北”意义体系的话语建构

(二)“极地”：时间维度的积极他者

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另一个重要的身份话语是“极地（Заполярье）”。这一概念在一些文本中，同样指向了北极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且经常作为一种“标准”，用以形容残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当代俄罗斯的学术话语为例，短语“在极地条件下”（в условиях Заполярья）高频出现。如，“这在极地地区极端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那里心血管系统的负荷显著增加”^①等。而在这类话语之外，尤其是在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中，“极地”话语常常具有鲜明的时间指向性，与一些特定历史联想（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北极防线）相关联，在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建构活动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根据维夫（Ole Waever）的研究，行为体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必涉及针对空间他者的描述，而是可以以时间的自我建构为基础。比如，欧盟就不是相

① Корнев 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закевич Е.В. Клиник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больных, перенесших инфаркт миокарда, на амбулаторном этапе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Заполярья при инвазивном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м методах лечения в стационаре// Экология человека. Июля 2007. С.12-14.

对于一个外部和地理意义上的他者而建构的，而是依靠一个时间顺序，即对重返过去暴力欧洲的恐惧。^①“极地”话语同样能够在时间维度上，利用“北极符号”唤起苏联时期的大国记忆，从而建构并增强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稳定性。与同样带有历史印记的“极北”和“远北”概念相比，“极地”无疑带有更多的正面联想，尤其与卫国战争时期的北极防线相关联。因此，这一概念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苏联时期的伟大记忆具有强关联。在“极地”相关语境中，对北极宏观区域的时间性建构，超越了北极宏观区域所指向的空间范畴；与北极相关的历史性积极认知，超越了与北极极端自然条件相关的负面认知。北极宏观区域获得了“极端他者”身份之外的“积极他者”身份，并从时间维度参与了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北极性”建构。这种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他者气质”，在一些特定语境中被政治行为体所利用，用以建构积极正面的自我身份。如梅德韦杰夫总统曾在致人民艺术家安德烈·阿列克谢维奇（Андр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75岁生日的祝词中提到：“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您是为许多获得广泛认可的杰出作品的作者。俄罗斯极地区**严酷的美景**，北方民族的生活以及原始文化，都是您作品的核心主题，其中最好的一批装饰了俄罗斯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画廊。”^②

在今天俄罗斯重塑“大国”身份的时代背景下，“极地”背后所指向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怀尤为重要，并经常出现在与“军事”相关的议题中。如，“现在你可以想象保卫我们国家极地区域的战士们，有多么艰苦”^③；“他在卡累利阿地峡战斗，在极地区域战斗，执行了335次作战任务，个人战斗中击落了7架敌机，在团体战斗中击落了24架敌机”^④等。

由于俄罗斯极地区域极端的自然气候特征，在相关文本中，这一地区经常成为人类（尤其是探险家、军队等）战斗和征服的对象。极地区域赋予了

① Ole Waever,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96, Vol.34, No.1, pp.103-132.

② Андрею Яковлеву. Народному художнику России. 10 ноября 200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letters/5958>

③ Александра Лебедева. В Мур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ошло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захоронение солдат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9 октября 2013.

④ Алексей Бакуменко, Ирина Тверитинова. Останки Геро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ломали карьеру чиновника из Мур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4 октября 2013. <https://www.msk.kp.ru/daily/26145/3034749/>

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以浪漫主义色彩，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战斗历史，更是将英雄主义情结深埋于该地区的集体回忆之中。因此，很多与“极地”相关的文本，多采用浪漫式的叙述方式，渲染该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人类（军人）活动之间鲜明的对立性。用探险家的“冒险精神”、军人的“勇气”与英勇的战斗，以及艺术家笔下的“严酷美景”等，建构一种英雄主义的叙述方式、意义体系与民众心理，以适应当前俄罗斯北极地区越来越显著的战略地位，为相关战略、政策创造有效的正面语境。例如，2019年胜利日，在摩尔曼斯克“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苏维埃**极地捍卫者**^①”纪念碑群举行的集会上，摩尔曼斯克州长安德烈·齐比思（Андрей Чибис）说：“今天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是神圣的节日。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记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能够抚养后代、发展我们的国家，全都要仰仗我们的祖辈、父辈们所做出的牺牲。我们必须记住这里发生过什么，在北方，我们的英雄们在前线抗击了敌人。很难想象当时战争发生时的残酷情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整个国家如何在后方艰难地取得了胜利。”^② 极地在这里被概念化为“前线”和整个国家的“大后方”，通过与卫国战争等相关的伟大记忆，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也获得了与俄罗斯整体国家命运相关的战略性宏观区域身份。

在当代俄罗斯“重返北极”国家战略的现实语境中，“极地”话语所指向的历史身份，与俄罗斯在北极宏观区域所追求的未来身份之间具有一致性关联，“极地”话语由此获得了超时间性。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极地”话语对“极北”、“远北”话语中关于北极的负面认知进行了重新框定，超越了其指向的与北极地区极端自然条件相关的落后身份，解构了北极空间“非人类”的负面认知。“极地”话语建构的战略性宏观区域身份，在时间维度上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和未来。

① Защитн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Заполярь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② Город-герой Мурманск принял военный парад. 09 ма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society/262608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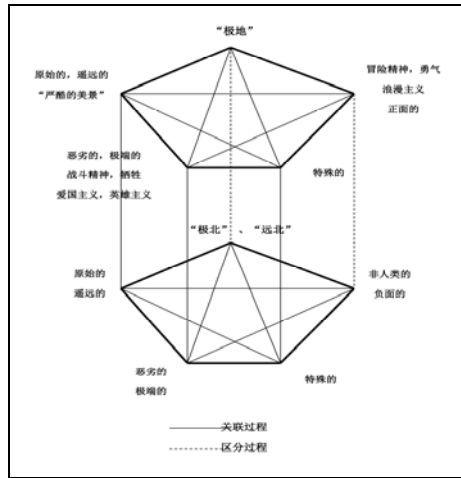


图4 “极地”与“极北”、“远北”意义体系的比较建构图式

（三）“北极”与“北方”：补充性身份与竞争性身份

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他者身份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表现出来的。这一区域拥有一个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符号建构出来的复杂身份网络，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身份话语。而“北极（Арктика）”和“北方（Север）”是这一身份网络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话语；二者都不倾向于将北极宏观区域建构为激进的他者，而是利用诸多复杂、模糊的差异符号，建构这一区域的他者身份。

在当代俄罗斯北极语境中，“北极（Арктика）”概念广泛存在于各类话语文本中，尤其对于俄罗斯官方框定“自我”的“北极国家”身份极具重要性，可被看作是最官方、最普遍的北极宏观区域身份话语，也是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核心话语。近年来，俄罗斯“北极”相关话语大体沿着“北极国家身份”、“安全”、“经济”、“环境”和“国际合作”等几条路径建构。^①其中“北极国家身份”话语链，直接参与建构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以及北极宏观区域身份；而“安全”、“经济”、“环境”和“国际合作”等话语链，以及“北方海航道”、“北纬铁路”、

^①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4, pp.547-566.

“气候变化”等相关子话语链，则都或多或少参与到了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建构过程之中。

作为身份话语的“北方（Север）”，同样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北方”在具体语境中常以“俄罗斯北方（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的形式出现，具有复杂的内涵。“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和“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两个“俄罗斯北方”概念，最初在科学语言中的内涵并不相同，一个指代自然、社会、经济区域，另一个则指代历史、民族、文化区域。^①通过对近年来俄罗斯北极话语的考察，笔者发现，“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概念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包含了“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指代俄罗斯国家的北方边界及北极空间，还指称一个独立且具有特殊价值的民族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北方”作为一个隐喻性叙述，甚至可以覆盖整个俄罗斯的精神疆域。涉及“俄罗斯北方”的研究非常多元，既包含着北方社会、民族、移民等社会科学研究，也涉及大量的文化、哲学、信仰、仪式等精神领域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学术话语为例，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主要涉及“历史研究”、“民族、宗教、社会研究”和“文化、哲学、符号学研究”三个基本话语链，并形成了“北方民族文化空间”、“北方文化哲学体系”、“俄罗斯北方元系统”和“北方文本”等系统性概念。^②

根据康诺利（W.E. Connolly）的观点，行为体的身份建构行为，可以通过一系列补充性身份、竞争性身份、反面身份和身份的非自我因素，而得以建构。^③作为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两个主导话语，“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和“北方（Север）”话语同时作为一对补充性身份话语和竞争性身份话语，出现在当代俄罗斯现实语境中。由于二者表象的他者身份的倾向性不同，在具体语境中，二者表象的身份因素有时会协同发挥作用，各自为北极宏观区域表象出一种补充性身份；而在一些特定语境中，为了建构某种特定身份话语，二者则会呈现出意义争夺的状态，从而表象出竞争性身份。

① Назукина М.В, Подвинцев О.Б.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 – втор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ядро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Пер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0.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С.9-40.

② 葛静深：“‘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3期，第83页。

③ W.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pp.8, 6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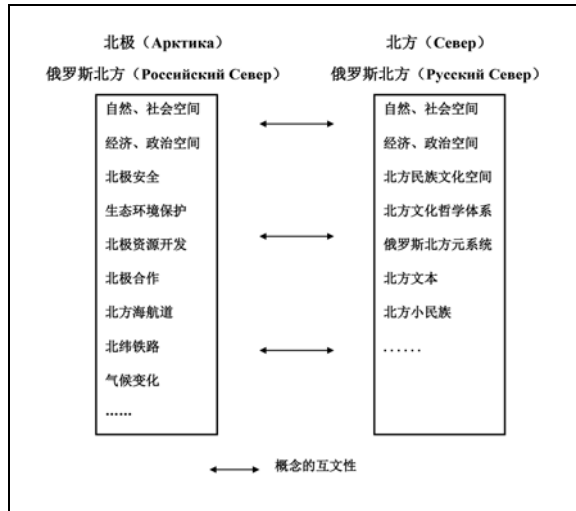


图5 “北极”与“北方”意义体系及概念的互文性

比如在当代俄罗斯北极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北方”话语可以利用“俄罗斯北方”概念作为精神文化空间的边界模糊性，将“北方”空间与俄罗斯整体精神文化进行关联，从而反向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俄罗斯北方”同俄罗斯整体领土进行关联。进而利用“北方（Север）”话语对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进行扩展性叙述，框定更为广大的俄罗斯自然与精神疆域，为相关北极政策、北极战略提供身份上的合法性。如，“我们的西方合作伙伴担心我们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这是非常奇怪的。只需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北方地区**几乎占据了我国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①这种叙述策略，需要依靠“北极（Арктика）”和“北方（Север）”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二者表象出的是典型的补充性身份。同时，这一话语策略能够得以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北极相关身份话语表象出的地理空间范畴以及宏观区域范围，并不明晰，且缺乏统一的标准。

在一些特定文本中，“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和“北方（Север）”话语则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冲突关系，根据不同的话语意图分别表象出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相关的竞争性身份。从话语主体角度看，“北极（Арктика）”

① Западy нужно привыкнуть к тому, что Росси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Арктику – эксперт// ИА Regnum. 9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608206.html>

和“北方（Север）”的相关话语，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来自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不同地方主体。由于地方层面上的“北极身份”经常意味着某种政策倾斜，因此，为了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围绕着地区层面的“北极身份”，经常上演非常激烈的话语交锋，尤其经常体现在“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与“北方（Север）”话语之间的冲突。

例如，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举办地，由阿尔汉格尔斯克迁往圣彼得堡，期间就有媒体质疑圣彼得堡并不是真正的“北极地区”。2019年2月，列宁格勒州州长德洛兹坚科（Александр Дрозденко）在索契投资论坛上签署文件，计划于2022年前在列宁格勒州的普利莫尔斯克（Приморск）建成一个多元化大型港口综合体。在“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的开幕式中，普京赋予了圣彼得堡以俄罗斯“北方首都”的地位，称之为“一个历史上与传奇的北极探险队紧密相关的城市”。^①德洛兹坚科在论坛中强调，“普利莫尔斯克海港应成为通过北方海航道接收和运送货物的枢纽港”^②，列宁格勒州可以成为俄罗斯北极地区实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利莫尔斯克海港将成为从堪察加半岛沿北方海航道运送的集装箱的重新装载点。圣彼得堡之外的话语主体，则继续将议题集中于圣彼得堡的空间位置上，如有媒体以“不在北方的北极（Несеверная Арктика）”^③为标题，报道这一事件。强调列宁格勒州并没有位于北极（Арктика）地区的领土，其本身也与北方海航道无关，而圣彼得堡正在试图“越界”促进北方地区的发展。“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萨贝塔正在争夺主要北极港口的头衔，而普利莫尔斯克在伪装之下不仅要加入到相关的信息流之中，还要在未来分走相当多的资金……列宁格勒州实施这一项目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最终将普利莫尔斯克海港项目框定为“对联邦预算的争夺”，^④通过质疑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市的“北极身份”，以消解其相关北极政策的合法性。而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09 апреля 2019.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250>

② Анна Мейзер. Порты: Ленобласть хочет в Арктику, а Белоруссия в Латвию. 14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2611505.html>

③ Там же.

④ Анна Мейзер. Арктическая Ленобласть: зачем региону новый порт? 15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2612156.html>

圣彼得堡则坚持使用“北方（Север）”话语，来建构自身的北极身份。如，2019年5月21日，有媒体以“北方首都庆祝北极探险者日”为题，报道了圣彼得堡有关北极探险家日的相关庆祝活动。^①在这一话语博弈的过程中，对身份话语“北极（Арктика）”和“北方（Север）”的使用，以及二者指向的不同身份内涵之间的互动，起了关键作用。

（四）“我们是天然的北极国家”：从模糊的他者身份到清晰的自我身份

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相关的意义与身份，是通过“北极（Арктика）”、“北方（Север）”、“极地（Заполярье）”、“俄罗斯北方（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和“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等一系列符号之间的关联以及区分过程来建构的。一方面，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他者身份，被置于这一庞大的身份网络之中而得以稳定；而另一方面，处于这一身份网络中的一系列身份话语，在空间维度上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同时，受到国家战略、国际局势、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能源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身份及其重要性，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身份的时间性变化，同样作用于不同行为体对于北极身份话语的选择，也使得北极相关身份网络的空间指向，更加复杂化和模糊化，成为一个空间上的“模糊他者”。也就是说，被这些身份话语建构的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没有统一、明确、稳定的空间边界。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话语实践层面。

比如，尽管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文本中，“极北”地区被作为“北方”地区的一个子范畴，即北方地区中最靠近北极的空间，但在一些文本中，“极北”与“北方”的空间范围发生了重合。如，“根据国内外众多专家的预测，在未来20至30年内，人类将不得不认真考虑寻找新的能源，因为现有能源的探索工作几乎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需要走得太远，因为占据俄罗斯近一半领土的极北地区，很可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来源”。^②这需要归因于“极北”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更

① В Северной столице отмечают День полярника. 21 ма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society/2632177.html>

② Виктор Сергее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важность Арктики// Известия. 11 сентября 2006. <https://iz.ru/news/317057>

多地指向一种“遥远”、“极端”、“不适宜人类”的广义空间，而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地理范畴。“极地”概念同样不是非常明确的地理空间范畴，有时作为北极、北方、极北等概念的替代用语出现，有时又与这些俄罗斯北方宏观区域身份话语并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作为补充性身份和竞争性身份的“北极”和“北方”，在话语实践中所表象的空间范畴更加灵活多变，这是当代俄罗斯北极相关身份话语动态性与不稳定性典型体现。近年来，与北极身份相关的议题，广泛地在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地方主体内部展开，而相关议题一般都与北极空间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尤其与“北极”、“北方”话语的模糊性相关。比如，北极国立文化艺术学院教授维诺库罗娃（Ульяна Винокурова）认为，“关于北极有很多刻板印象”，但是“主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人们只对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取那里的矿物感兴趣，而完全不关心住在那里的人”。她曾于2016年指出，“北极（Арктика）”的边界是最让人痛苦的问题：“将萨哈共和国的13个地区划入北极是合乎逻辑的，但官方名单中仅包括5个。这是错误的，官方版本太过严格。”她还指出，官方的北极发展框架“是完全的欺骗”，“有些项目可以在涅留格林和日甘斯克建造，而其他的一些地区却什么都没有”。^①在维诺库罗娃的叙述中，萨哈共和国居民的民生问题和城市建设问题，成了联结官方层面“北极”与“非北极”地区之间的桥梁，以统一的北方居民的群体身份，来质疑官方层面“北极身份”的划分方法。这一问题在2019年5月有了最新的进展，普京签署总统令，将萨哈共和国内部13个地区划入“北极”，赋予了更多地区以“北极身份”。

在多元身份网络中，同时作为“极端他者”、“积极他者”和“模糊他者”的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表象出了特点非常鲜明、与“自我”差别明显的他者身份。但另一方面，基于多种原因，尤其是基于现阶段北极地区对于俄罗斯国家战略的极端重要性，在当代俄罗斯现实语境尤其是政治话语实践活动中，通过宣称自我“天然的北极国家”^②身份，“北极性”越来越成为俄罗斯

①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 это полнейший обман». 14 ноября 2016. <https://regnum.ru/news/society/2204675.html>

② Встреча с журналистами Ураль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28 ноября 2011.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3705>

联邦中央和地方层面“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即，北极宏观区域这一“他者”，正在成为当代俄罗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极”这一“他者”元素，同时又是俄罗斯“自我”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当代俄罗斯北极相关身份话语的不稳定性，及其相关意义体系的复杂性。

身份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沿着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道义维度展开，并随之产生不同的责任。^①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各身份话语，在空间维度上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因此时间维度和道义维度，在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尤其是在将其作为“自我”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格外重要。即，通过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伟大历史”、民族文化以及对该地区及其人民的特殊“责任”，来建构北极相关的“自我”身份。

因此，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并不仅仅涉及对该地区极端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国的伟大记忆以及区域历史文化的建构，同时还涉及了与“人”相关的身份建构，包括“生活在那里的北方居民”、“伟大的探险家”、“军人”以及作为整体的“俄罗斯人民”。这一地区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民”（探险家、军队等）战斗和征服的对象，也是一部分“俄罗斯人民”（北方居民）世代生活的场所。对于“人”的身份建构过程，是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从“他者身份”向“自我身份”转变的桥梁，同时也涉及了该区域身份建构过程中的道义维度。

康诺利曾指出了一些群体将“异端分子”建构为极端他者的一个主要因素，即这种极端他者的身份建构行为，来源于“对于人类不公正的经历、生活的苦难以及无法避免的死亡，会产生对苦难的愤恨和必须有人要为之负责的愿望”，这一愿望即“责任所归属的地方”。^②与之相似，极端、恶劣、不宜生存的北极、北方地区，给予了“北方居民”以及更广义的俄罗斯人民以“不公正的经历”、“生活的苦难”以及死亡的威胁；而北极、北方地区，也赋予了俄罗斯及其人民以独特的“自我”身份，拥有着对抗严酷的、不公正的生活环境以及苦难的勇气、决心与毅力。而俄罗斯政府则在这一北极语境中，扮演了“对抗邪恶”、保护人民的角色，以获得负责任的“道义”身份。

①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49.

② W.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p.8.

正如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之后，伊戈尔·巴甫洛夫斯基（Игорь Павловский）指出的，“两个俄罗斯北极在圣彼得堡国际北极论坛上相遇，一个北极——庞大的数字，伟大的计划以及宇宙级的规模；而第二个北极——仅仅是一个区域，一个有人生活的区域。”^①

结 语

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中，北极宏观区域正在被建构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北极相关的话语（尤其是“北极大国”话语和“重返北极”话语），正在成为当代俄罗斯语境中的一种主导话语，涉及当代俄罗斯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一段时间以来，为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俄罗斯北极相关身份建构行为，主要围绕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通过对苏联等历史时期北极空间内“大国记忆”的历史性叙述，以及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广大海洋空间的话语表象，赋予俄罗斯“重返北极”理据性和合法性。而以2019年国情咨文和国际北极论坛为标志，现阶段普京总统在北极相关话语建设方面，更加注重北方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议题，从道义维度表象出“自我”对于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的一种责任感。这标志着当代俄罗斯北极相关政策话语和身份话语的日益完善，也是俄罗斯整体北极战略日益成熟的一种表现。

本研究认为，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存在多种身份话语，主要包括“北方（Север）”、“极地（Заполярье）”和“北极（Арктика）”。其中，“北方（Север）”在具体语境中，常以“俄罗斯北方（Российский Север,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的形式出现，并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次级身份话语范畴：“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和“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

在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和“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话语，更倾向于从空间维度建构该区域的“激进他者”身份，强调该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极地

^① Игорь Павловский. Две Арктики на один Кремль. 10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609355.html>

（Заполярье）”概念由于浓厚的历史性印记和浪漫气息，更有利于从时间维度建构该区域的“积极他者”身份。“北极（Арктика）”和“北方（Север）”概念，作为该区域最广泛使用的模糊性身份话语，在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身份建构维度上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常在多种话语中通过多重维度对该区域的“他者”身份，以及相关“自我”身份，进行综合建构。

在当代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北极”尚未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空间概念而存在。多种身份话语的同时使用，一方面说明在俄罗斯官方和民间层面，缺乏关于北极宏观区域组成部分、边界以及相关意义体系的统一、连贯的既定看法；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极地区作为宏观区域的身份复杂性，其在俄民众的心理地图中，作为统一独立的宏观区域，尚存在诸多阻碍因素。

首先，“北方（Север）”、“极地（Заполярье）”、“北极（Арктика）”等，在空间上均不是具体的、界限清晰的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随意性，而多种相互竞争的身份话语同时使用，并不利于统一区域身份的形成。其次，在自然地理意义上，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官方边界，并不是沿联邦主体延伸的；官方边界的制定标准，并非依据自然地理或者历史人文等客观因素（事实上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客观因素），而更多基于现实问题尤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政策上具有明显的不连续性，相关法律法规仍然亟待完善。

虽然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与俄罗斯整体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因素，仍然导致该地区长期以来人口稀少的客观现实，俄民众对于该区域的感知缺乏深植于历史传统中的传承性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该宏观区域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来源于民众内部的身份认同相对缺失。未来，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官方政策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身份建构行为，仍将是该区域身份建构的主要方式，最终将以各种政策、法律的形式，维持北极相关身份。

同时，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还将依赖更多话语主体长时间、多维度的话语建构活动，该区域身份将呈现出明显的由“他者身份”向“自我身份”过渡的趋势：“北极”正在进入当代俄罗斯国家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

成为俄罗斯表象“自我”身份（北极大国）的核心因素；而“北极宏观区域”，正逐渐由一个“他者”成为俄罗斯“多元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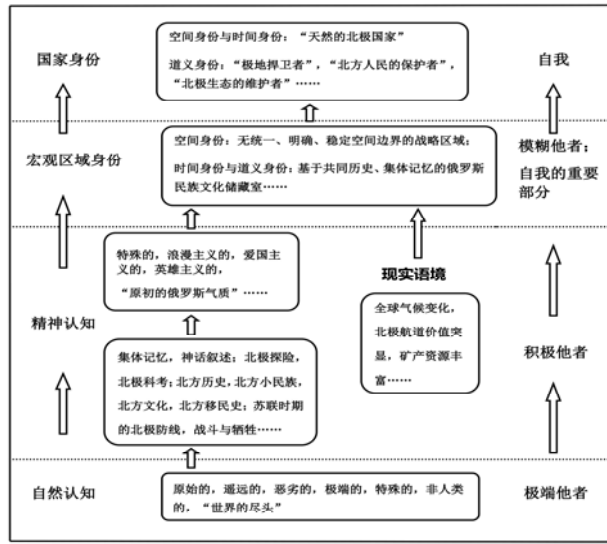


图6 当代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意义体系与身份建构逻辑

在这一过程中，“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话语指向的空间维度“极端他者”元素，将更多作用于当代俄罗斯“自我”身份的道义维度建构过程中。通过该区域的“否定他者身份”建构“自我”的“积极身份”，并在“北方居民”、“北方小民族”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中，发挥作用。

“极地（Заполярье）”话语指向的时间维度“积极他者”元素，将广泛作用于俄罗斯未来“理想自我身份”的建构行为中，关联历史上伟大的“大国记忆”，并出现在“重返北极”等相关的政治议题中。

而“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链中的“安全”、“经济”、“能源”、“生态”等元素，以及北方（Север）话语链中的“北方居民”、“北方民族文化空间”、“北方文化哲学体系”等相关元素，均能直接参与到当代俄罗斯“自我”身份的空间、时间、道义多维话语建构行为中。“北极（Арктика）”话语和“北方（Север）”话语将成为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身

份话语，“自上而下”地广泛应用于官方政治话语中；同时，二者将和“远北(Дальний Север)”、“极北(Крайний Север)”、“极地(Заполярье)”等身份话语一起，在媒体、学术和企业北极话语中，“自下而上”地参与建构更加稳定的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

【Abstract】 Although the Arctic macro-region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Russian discourse, yet on the psychological map of contemporary Russians, the “Arctic” has not yet existed completely as an independent and unified spatial concept. This relates not only to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the “region” concept, but also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rctic macro-region itself. The harsh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e Russian Arctic have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objective basis for forming a common identity. Also, between the Russian Arctic and other Russian regions there is no strong connection that would be created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Therefore, for the Russian Arctic macro-region, a bottom-up construction path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self-identification is absent and depends more on official dominance at the policy level. Accordingly, the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stable identity of the Russian Arctic macro-region relies more on other factors than official political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it requires long-term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tinuou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from more subject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Arctic macro-region, there are many discourses of identity, mainly including the “Север” discourse, the “Заполярье” discourse, and the “Арктика” discourse. The simultaneous use of multiple discourses of identity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at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levels of Russia there is no single and consistent set of views on components, borders and corresponding value systems of the Arctic macro-reg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regional identity of the Russian Arctic macro-region is extremely complex.

【Key Words】Russian Arctic Macro-region, Russi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Russian Multidimensional Discourse

【Аннотац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арктический макрорегион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на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р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рктика» ещё не полностью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ак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и едина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Это связано не только со сложностью и динами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егион», но и со сложность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сам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 Суровые прир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е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насе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 в течение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ыло скудным и не имело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основы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бщей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также в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очна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ой и другими регионами, поэтому для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низу вверх»,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общем процессе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и больше полагается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В условиях отсутствия методов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низу вверх» стабильное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её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требуют большей поддерж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и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это требует боле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ногомерного и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дискурсивного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субъектов дискурс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арктическом макрорегио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дискурсов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дискурс «Север», дискурс «Заполярье» и дискурс «Арктик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дискурсов,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в России не хватает единого,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го и устоявшегос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компонентах, границах и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ими системах значений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также иллюстрирует слож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как макро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ктический макрорегио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й многомерный дискурс

(责任编辑 崔珩)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李 暖*

【内容提要】19世纪末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俄罗斯犹太群体迁移的主要方向。1965、1990年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俄罗斯-以色列”为轴心的文化空间格局。在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以色列“大熔炉”理念带有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使当代“流散”的内涵显著复杂化，也使俄罗斯犹太群体的认同问题愈发凸显。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更加倚重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如下趋势：克服俄苏国家话语导致的记忆危机，增强历史文化记忆的约束力；保护流散地的俄罗斯传统，实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的分解与再融合；经历文化适应与对立认同阶段，逐渐向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过渡。

【关键词】后苏联流散 俄罗斯犹太群体 文化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D7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162
(27)

* 李暖，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博士。

后苏联犹太流散（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是当代流散史的核心景观，形成过程与俄罗斯犹太人漫长的移民经历密不可分。自 1882 年起，俄罗斯犹太人就已开始陆续向巴勒斯坦移民，至 20 世纪初，巴勒斯坦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多达 3 万 5 千余人。1965 年后，苏联犹太人掀起了新一波移民浪潮，以色列是主要移民方向之一，1965-1980 年约 15 万 6 千人迁入以色列，1990 年起移入达 92 万人以上。至今，居住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占该国犹太人口的 20% 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①

部分学者认为，后苏联犹太流散以“俄罗斯-以色列”的空间关系为轴心，形成了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历史文化身份分裂、交织的复杂局面。这首先与俄罗斯犹太族群的特殊性有关。19-20 世纪之交，俄罗斯领土上即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族群，直至当前，俄罗斯犹太人仍是世界第三大犹太族群。俄罗斯犹太人从 19 世纪初开始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同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俄语语言文化习惯。当代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多具有深厚的俄语文化背景，在移入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和“大熔炉”政策框架下保持俄语语言文化习惯，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难题。俄罗斯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境遇为研究者提供了具有鲜明悖论色彩的“新流散”形式，即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所预设的“流散的终结”（Конец диаспоры）并没有随着以色列建国和犹太人回归祖地而实现，移民者没有在以色列实现社会文化认同，反而陷入了新一轮身份危机和记忆校订，仍然保持着精神文化层面的流散状态。

俄罗斯犹太人历史文化身份双重边缘化导致的记忆危机，是“新流散”现象形成的根源之一。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社会需要借“过去”来自我定义，“将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想象，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②依托于犹太教和意第绪语的犹太民族集体记忆在孤立和同化的过程中被消解，导致俄罗斯犹太民

① 数据来源 Тольц М.С.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евре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массов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евреев из СССР в 1970-е и ее торможение в 1980-е// Демоскоп-Weekly. 2007. №.303-304; 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Boston: Brill Leiden, 2004, p.38; Полян П.М. Эмиграция: кто и когда в XX веке покидал Россию// Россия и ее регионы в XX веке. М.: ОГИ, 2005. С.493-519.

② [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36-137 页。

族共同体的根基被严重削弱，身份认同有赖于古犹太文化源头和“应许之地”的集体想象；在迁移到以色列后，个体面临着新的社会化过程，由语言、想象世界组成的自我身份与以色列社会建构发生冲突，亟须借助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来解决认同难题。因此，研究俄罗斯犹太人的记忆危机问题，对理解后苏联流散现象的复杂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此为突破口，剖析俄罗斯犹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难题，探讨流散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

一、后苏联犹太人流散与记忆研究评述

流散研究是西方学术界在 1960 年后全球化趋势增强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旨在探讨人口流动加速的背景下日益凸显的族裔生存策略和文化现象。^①1991 年，学术期刊《流散》(*Diaspora*) 在多伦多大学创刊，成为推动流散研究的重要平台；亚美尼亚文化研究学者托洛利安 (Khachig Tölölyan) 任主编，使这一学科具备了更加鲜明的族裔文化特色。萨福兰 (William Safran) 在《流散》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现代社会的流散：关于祖地与回归的神话》，指出族群记忆和集体想象对于理解流散内涵的关键作用：“流散群体保留着关于祖地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成就的集体记忆、意象和神话体系；将祖先的国度看作真正的、理想的故乡，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其后代一定会回归故土；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延续和维持与祖地历史的联系，其民族交往认同与凝聚力均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②

俄罗斯学术界对流散的研究起步于苏联解体后，受到上述学者研究思路的影响。1999 年，俄罗斯《流散》(*Диаспоры*) 学术期刊创刊，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加拿大同名杂志的模仿。如主编季亚特洛夫 (В.И. Дятлов) 指出的那样^③，俄罗斯流散研究具有跨学科特色，多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角度审视流散群体的历史遭际，并关注权力话语、文化身份认同等命题，将俄

① J.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4, Vol.9, No.3, pp.302-308.

② W.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Spring, 1991, Vol.1, No.1, pp.83-84.

③ Ростовцев Е.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2. Вып.2. 2014. С.106-126.

罗斯族裔移民史融入世界流散文化谱系。俄罗斯学者多赞同萨福兰的观点，反对流散理论的泛化，将目光首先聚焦于犹太民族的生存境况和移民经验。诺先科（Е. Носенко）等学者通过大规模田野调查，研究俄罗斯阿利亚运动中的移民动机、人口构成和民族观，为流散语境下身份和记忆的探讨提供了宝贵数据。苏尔坦诺夫（К. Султанов）则指出后苏联族裔文化对记忆重构的迫切要求：个体和社会对重现记忆、重构过去的要求显然与灾难性的 20 世纪密不可分，每个存活下来的族群、每个幸存者，都要求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留存，不仅包括相继离世的灾难见证者的记忆延续，还包括后代人对创伤记忆的反思、对族群记忆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再生产。^①

目前，学界围绕当代俄罗斯犹太人流散形式和性质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主要探讨犹太流散群体是否可被视为独立族群的问题。犹太史学家谢苗·杜布诺夫（С.М. Дубнов）曾以 18 世纪以来俄罗斯犹太族群的生存经验为出发点，做出著名论断：自治犹太村社是流散状态下的主导存在方式，以此为前提，即便在流散过程中，犹太族群也能保持独特性，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杜布诺夫的观点虽然在远东犹太自治州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中得到证实，但随着犹太历史经验的复杂化，当代境况出现较显著的变化。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ев）的学术成果为当代民族流散现象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古米廖夫的民族层级理论，托先科（Ж.Т. Тощенко）、恰普特科娃（Т.И. Чаптыкова）等学者认为，流散群体在分类学（таксономия）上综合了民族系统中最低一级单位“社团”（конвиксия）和“团体”（консорция）^②的特征；假如流散群体在祖地范围之外的异族环境中仍保持同一而稳定的民族渊源，且拥有社会机构，保证该共同体的发展和功能运行，则可被视为独立的族群；如果没有文化自保意识，选择同化，就

① Султанов К.К.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как регуляти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Диалог со временем. 2016. Вып.54. С.54-82.

② “团体”指由于共同目标和历史命运而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群人；“社团”的结构则更加稳定，常见的形式有村社、手工业街区、小型部落等，虽尚不具备较强的抵抗力，但如果能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得以保存，便有可能发展为亚民族。参见袁勋：“列夫·古米廖夫‘民族过程’理论评述”，《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6期，第73页。

不再具有民族意义上的独立性。^①鉴于俄罗斯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多数选择融入俄罗斯文化,按照上述观点,俄罗斯境内的犹太人流散处于不断消解的过程中,至后苏联时代已基本上为俄罗斯文化身份所同化。甚至有部分学者提出“伪流散”(квазидиаспора)的概念,即当代犹太人不再视以色列为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拥有多重文化身份,或者拥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从带有“流亡、放逐”含义的流散转变为不具备族群意义的散居状态。

第二类侧重研究流散现象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征,尝试就“流散”内涵的各个角度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义。如科洛索夫(В.А. Колосов)、波利亚科夫(Ю.А. Поляков)等认为,流散族群既包括“处于他族环境中的民族共同体”,也指“处于某个国家、但在民族起源和文化习惯上属于别国的居民”^②;卢里耶(С.В. Лурье)则认为流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居住在他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异族人。^③在此基础上,波洛斯科娃(Т.В. Полоскова)指出当代流散具有的几个典型特征:(1)民族身份;(2)文化价值共同体;(3)在力图保存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差异;(4)通过原型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共同历史起源的想象等。^④扎利泰洛(И.В. Залитайло)等学者则倾向于从文化记忆和文化差异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当代流散,认为该现象是移民导致的较稳定的共同体形式,主要特征为内部成员具有群体自觉意识、对祖先历史和往昔的记忆、民族文化意识等。^⑤季什科夫(В.А. Тишков)认为,当代的流散已蜕变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族群或民族现象,不同于旧式移民。^⑥

当代学者定义流散概念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均强调该现象在后苏联语境中的多元文化特征和多重身份的特殊性。1965年后,苏联犹

① Тощенко Ж.Т, Чаптыкова Т.П. Диаспора как объек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6. №.12. С.33-42.

② Колосов В.А, Галкина Т.А, Куйбышев М.В. География диаспор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6. №.5. С.34-46.

③ Лурье С.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логия.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1997.

④ Полоскова Т.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диаспоры. М.: РГБ, 2006.

⑤ Залитайло И.В. Природа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диаспор и диаспоральны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Ана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2004. №.2. С.194-200.

⑥ Еханурова И.Р.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понятия «Диаспора»// Вестник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6. С.104-107.

犹太人持续向以色列等国大规模移民，至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后苏联流散”。后苏联流散绝非一个单义的现象，首先取“流散”一词的本意，指仍留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尚未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此外，如我们在引言部分提到的，后苏联视域考察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散与以色列“新流散”文化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当代研究成果中，以色列被视为俄苏犹太人流散记忆的核心。从既有的理论模式来看，犹太人从俄罗斯向以色列移民的过程，与其说是“流散”，毋宁说是“回归”。然而，随着记忆研究和文化共同体研究的兴起，当代学者认为，流散研究模式虽为俄罗斯犹太移民现象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架构，但远未涵盖俄罗斯犹太移民独特性的全部。俄罗斯犹太移民的流散特征，在地域上已经打破了“祖地-流散地”的界定，而更多地指向基于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与神话的精神归属感。^①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记忆的角度理解流散对于体认当代俄罗斯犹太人的境遇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流散不仅仅是一种离开祖国、侨居各地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基于祖国历史和族群起源神话的人际关系体系和信息关联体系。“祖国历史”与族群起源神话对于流散族群的重要性，使得集体身份和集体记忆成为流散的中心概念；集体记忆的危机则促成了民族身份根基的弱化和流散含义的复杂化。

二、俄罗斯犹太人记忆危机问题探源

美国学者基特尔曼（Z. Gitelman）在专著《矛盾的世纪》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俄苏犹太人成为众多戏剧性历史事件的中心。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纪充满激情和失落。他们当中大部分并未卷入风起云涌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选择在家庭和世俗生活中沉潜，然而面临的却是更为宏大、抽象的命题。^②

尽管俄罗斯土壤上的记忆研究于后苏联时期才逐渐兴起，但纵览俄罗斯

① Дятлов В.И. Диаспора: экспансия термина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практику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Диаспоры. 2004. №.2. С.126-138.

② Zvi Gitelman,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犹太研究史即可发现，民族身份和记忆危机始终是话语建构的中心问题之一。杜布诺夫在研究犹太人生存境遇时发现了沙俄犹太人与众不同的一点，即数代以来沙俄犹太聚居区的宗教文化日渐衰落，世俗文化却蒸蒸日上。然而，类似的现代化过程却从未在中欧、西欧的犹太人发生过。这一发现使杜布诺夫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自治主义者的研究思路，他担心文化同化已使集体存在变得过于脆弱和不确定，因而不主张使用宗教来界定现代国家，而主张向过去寻求支撑点，刻画出能够为集体存在提供更为坚固的认同感的记忆。因此，他倾向于用浪漫主义情绪和象征手法来构建历史，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摆脱地域和物质束缚的“精神上的民族”。^①

1980-2010年间，诺先科等学者的田野调查平行展开，涵盖莫斯科、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大诺夫哥罗德、华沙、基辅等十几个城市，考察俄罗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问题。^②根据其调查结果，本文作者总结出当代俄罗斯犹太记忆危机的几个主要方面。

1. 记忆主体身份的悖论。大规模同化是俄罗斯犹太人的族群特征之一，在沙俄和苏联“文化移入”的策略下，相当一部分犹太人主动接受俄罗斯化，只有少数对以犹太教为基础的犹太性保持着自觉，成为当代为数不多的“记忆守护者”。诺先科等学者之所以将其称为“守护者”而非记忆主体，是因为在数百年的同化历程中，犹太性和宗教意识的淡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这些“守护者”生在犹太家庭，但作为犹太文化精神根基的犹太教已被逐出生活，阿什肯纳兹犹太身份仅仅依托于血统和日益被俄语取代的意第绪语，成为一种剔除了文化记忆内核和丰富生活的空洞身份。

2. 信仰缺失和文化没落。根据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被调查者在信仰层面呈现出三种明显的倾向：一部分犹太人经历了大屠杀和流放的历史灾难，已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另一部分选择投身虚幻的信仰，显现出一定意义上的造神冲动，为自我创造某种至高的力量，如崇高的智慧和命运等；第

① Дубнов С.М. Что такое евре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пыт крат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кончание). Восход, 1893. Декабрь. Т.12. С.110.

② 参见 Поле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Е. Носенко.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Пензу, 2006 г.;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2007 г.; Поле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автор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Смоленск, 2008 г.; Поле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автор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Орел, 2009 г.

三种则被俄语区的民间文化和生活气息所感染，主动放弃犹太教徒的清规戒律，或全身心地投入世俗生活，或改信东正教。随着犹太教的退出，许多犹太节日、饮食习惯、生活习俗也淡出人们的生活，仅在社区有意组织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记起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

3. 创伤记忆的神话化。“神话”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重取神话传说的本义，另一重则有“迷思”（миф）之义。沙俄和苏联的叙事策略使与战争、屠杀、流放、疏散、反犹主义运动相关的大部分史实被掩盖，俄苏犹太人的历史记忆缺乏可靠资料的支持；大多依靠屠杀幸存者、见证者和“记忆守护者”的口头讲述，与移民、流散生涯的种种遭际交织在一起，并掺杂了想象、象征等大量个人记忆的因素，逐渐蜕变为创伤主题的传说，各个版本姿态迥异，甚至很多与屠杀本身已无太大关联。同时，后苏联官方话语呈现出用“Холокост”取代“Погром”^①的倾向，学校、媒体宣扬“铭记大屠杀”的观念，但与俄苏犹太人祖祖辈辈切实相连的征兵、流放、疏散等历史记忆已被青年一代淡忘，成为远离生活的传说。

根据耶路沙尔米（Й.Х. Иерушалми）等学者的观点，后苏联犹太历史记忆的崩塌已呈现出不可挽回的趋势，以至于学界无法就记忆的真正内容哪怕是理想内涵达成一致。^②上述结果证实了杜布诺夫关于犹太宗教传统导致集体抵抗力削弱的担忧。尽管他呼吁将构建族群记忆作为解决身份认同难题的关键切入点，其思路也为众多研究者（包括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认可，但当代学者在记忆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普遍侧重追溯犹太大流散的共同源头，重视以《圣经》为主导的前民族主义架构和历史想象，而对启蒙运动之后的犹太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关注不足，更忽略了这段时期以来俄罗斯犹太群体历史遭遇的特殊性。

19世纪以来，俄国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屡次遭遇国家话语的校订和改写，以“犹太问题”（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为中心的国家话语策略是造成记忆危机

① 这两个俄语词汇均可译作“屠杀”，但语义有所不同：“Холокост”的词源可追溯至《希伯来圣经》，今特指20世纪30、40年代纳粹操纵的犹太种族灭绝事件；“Погром”则指在沙俄、苏联领土范围内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如1881年敖德萨屠杀、1919年基辅屠杀等。

② Иерушалми Й.Х. Евре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и еврейская память. Москва, Иерусалим, Гешарим: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2004. С.88-114.

的根源之一。“犹太问题”主要探讨犹太人与非犹太民族的共存问题以及犹太族群生活方式的改变、同化问题。俄罗斯领土上的“犹太问题”于19世纪初逐渐成为国家话语的关键词。1800年，杰尔查文（Г.Р. Державин）写成《关于预防白俄罗斯饥荒与犹太生活制度的意见》^①，提供了解决“犹太问题”的一系列方案：（1）告知犹太居民，俄国为其提供庇护并保证其宗教的不可侵犯；（2）参考个人意愿将犹太人分为商人、城镇市民、农民等阶层，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3）按比例迁移到阿斯特拉罕、新罗西斯克等便于犹太人从事相关生产的地区；（4）选派一定比例的犹太人赴彼得堡、莫斯科、里加等城市深造，接受俄罗斯文化和德国文化等等。^②多数学者认为，这份《意见》使“犹太问题”上升为全国范围内探讨的话题，为国家决策和相关话语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框架。从上述方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俄罗斯相关策略的几个要点：（1）限制犹太平民的生活范围，保持其在地域和宗教、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2）将犹太人的社会活动限制在特定的生产领域；（3）鼓励部分犹太人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同化。

自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起，犹太人就被严格限制在“犹太聚居区”之内。^③索尔仁尼琴在犹太史巨著《同行两百年》中提到，犹太人向来期盼弥赛亚的到来，无法将自己视为“聚居区”的常住居民；犹太拉比严格控制人民的精神生活，禁止阅读《塔木德》以外的著作，这使得俄罗斯犹太人逐渐形成了“对自身命运保持持续的警惕性”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则具有了“保存独特性的权威的社会形式”，尽管经历了多次移民，但“对新环境的适应更多是一种集体适应行为”，而非个人现象。^④直至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犹太世界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族群内部的犹太性坚不可摧，精

① «Мнение об отвращении в Белорусии голода и устройства быта евреев».

② Державин Г.Р. Мнение об отвращении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голода и устройстве быта евреев// Сочинения Державина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Т.7./Под ред. Я. Грога. 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72. С.229-332. 关于杰尔查文的观点与俄国“犹太问题”的关系，可参考 Цинцадзе Н.С. Державин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конце XVIII – начале XIX в// Клио. 2015. No.4. С.175-182.

③ 犹太聚居区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涵盖了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等地区。1791-1917年间，这里居住的犹太人占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以上，占俄罗斯犹太人口的94%以上。

④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 М.: Прозаик, 2009. С.43.

神资源和文化记忆来源主要是《塔木德》和卡巴拉神秘主义。19 世纪，犹太聚居区形成了一个具备集体意识和完整性的“犹太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并不觉得窒息，反而能够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滋养，按照自己的喜好构建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具有完整性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集体的精神面貌与传统的智识和犹太语言密切相连。”^①这一方面证明了“聚居区”的犹太人在最初时期保有以《塔木德》等核心文本为载体的文化记忆，具备身份认同的民族基础；另一方面则说明俄罗斯应对“犹太问题”时以限制、隔绝为关键词的策略，从反面加固了犹太人的集体意识和作为民族的独立性。因此，犹太人的民族独立性成为国家叙事策略试图消解的首要特质，这使得犹太人始终以封闭、不求进取的整体形象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当中。

1825 年以后，尼古拉一世的犹太政策形成一个强大的框架，其核心是消解犹太人心中族群集体意识，削弱“祖地”、“故土”等概念在集体记忆中的地位。尼古拉一世颁布 600 多条反犹法律，并将犹太人强制兵（кантонист）的最低征兵年龄降到 12-18 岁，军事化教育是集中营的变体，使犹太儿童脱离犹太信仰和文化环境，强制实现俄罗斯化。犹太征兵使大部分犹太人从少年时期与犹太信仰和家园情感告别，文化传承过程出现断裂，也使“尼古拉的士兵”（Николаевские солдаты）的形象留在俄罗斯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中。文化方面，对希伯来语印刷品进行书刊检查，随后查封所有犹太印刷品；从 1844 年开始，建立公立犹太学校，鼓励犹太人学习俄语，接受东正教文明的启蒙。俄罗斯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成效显著，部分犹太知识分子支持在犹太人当中普及俄语文化的举措，被称为“启蒙主义者”，他们秉持对沙皇权威的信仰，成为官方话语的拥护者。^②

苏联时期，犹太人被正式确定为合法民族^③，然而，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具有复杂的矛盾性。一方面，官方在“民族平等”的话语策略下大力提倡犹太文化，鼓励意第绪语学校、戏剧、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犹太人的宗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 С.43-45.

② Zvi Gitelman,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p.7.

③ Zvi Gitelman,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The Resettlement and Impact of Soviet Immigrants on Israeli Policy and Society*, Los Angeles: The Susan and David Wilstein Institute of Jewish Policy Studies, 1995, p.23.

教身份和民族属性受到压制。^①1930年后，苏联的犹太政策采用文化的自然移入策略。为响应跨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苏联的犹太文化一度出现繁荣景象，莫斯科的国家犹太剧院（ГОСЕТ）用意第绪语演出，并在比罗比詹建立犹太自治州。自治州的犹太人被主流话语形容为“苏联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斯大林的庇佑下不再遭受种族主义的歧视”^②，在自然移入完成之前，犹太人可保留部分文化特征，但允许保留的只有意第绪语文化，希伯来语则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播工具，遭到严令禁止。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苏联犹太人逐渐被视为“哑的犹太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根据1979年的统计，97%以上的犹太人已接受俄语，只有14%的犹太人将意第绪语视为母语；而1981-1986年间出版的61000余种印刷品中，只有41种是意第绪语，这证明犹太人已成为苏联时期俄罗斯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③

诺先科认为，在苏联时期，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俄语的“苏联犹太人身份”^④，而依托于希伯来语和其他语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身份随着历史灾难与记忆主体一同被清除了。^⑤二战结束后，苏联意识形态话语和历史叙事策略下的犹太文化范式和“苏联身份”彻底占据优势。基特尔曼进一步提出，这是一种在官方话语下形成的，剔除了宗教文化元素，受制于社会个体关系且“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殊身份。^⑥结合当代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可知，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知识分子的俄罗斯化造成了集体记忆中智识的断裂，犹太民众缺乏对犹太性的基本认识和犹太民族的基础知识，对犹太身份仅怀有“模糊的情感记忆”。^⑦俄苏犹太人内部早已酝酿着深刻的精神

① Jacobs Dan, *Studies of the Third Wave: Recent Migration of Soviet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3.

② 转引自 Арно Люстингер. Сталин и евреи: Траг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и советских евреев.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8. С.8.

③ L. Hirszowicz, "Jewish Culture in the USSR Today", *Jewish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73-289.

④ Советско-евре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⑤ Носенко Е.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ев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9. №.6. С.20-29.

⑥ Zvi Gitelman,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The Resettlement and Impact of Soviet Immigrants on Israeli Policy and Society*, 1995, p.24.

⑦ Т.Н. Friedgut, "Soviet Jewry: The Silent Majority", *Soviet Jewish Affairs*, 1980, Vol.10, No.2, pp.3-19.

危机，也正因如此，苏联时期犹太民众对政治宣传和国家话语的接受才轻而易举。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犹太记忆研究逐渐承认了犹太性消泯的事实，呈现出双向的批判性，在打破苏联叙事策略、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对后苏联时代的崇高化叙事提出疑问。事实证明，相比“福地”、“弥赛亚”等与“犹太性”相关的符号，当代俄罗斯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更关注的是个体生存状态。犹太集体记忆中“以色列地”的神圣性在个人记忆的冲击下日益瓦解，而“犹太性”这个事关民族身份的关键问题，在大多数俄罗斯犹太人心目中已等同于遥远的宗教概念，不再构成个体身份定义的基础。

三、“阿利亚”运动与“大熔炉”话语体系

“阿利亚”运动（Алия）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引发的大规模移民，广义上包含所有犹太人向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移民浪潮。“阿利亚”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字面意思指“上行、升华”，指代大流散时期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迁移行为。根据《简明犹太百科全书》^①的记载，13-19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的“阿利亚”都是一种零散的自发现象。真正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阿利亚”运动始于1882年，直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共有5次“阿利亚”浪潮。第一次浪潮持续至1903年，主力军为来自俄语区的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②第一次“阿利亚”运动标志着俄国犹太人的群体身份自觉，开始从“流散”与“回归”的角度审视族群的生存现状，赋予流散越来越多的消极内涵。^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

① Крат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② Сливкина Э.И., Гутгарц М. Крат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3. Иерусал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етер, 1992. С.377-387.

③ “流散”概念在形成之初除指涉被流放、驱逐的古犹太人外，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还指代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和贸易扩张；后用来描述所有海外犹太人的生活境况，并无明显的消极意义。但在19世纪，随着欧洲国家体系的完善，“民族”、“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融合程度加强，代表文化与国家、领土割裂状态的流散则具备了更多的消极含义；这一趋势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语境下愈发凸显。参见 Ксения Зайка. Диаспорические и иммигрантск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9. №.10. С.74-80.

中，流散不单单指涉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还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价值观念。^①

但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语言文化上的矛盾色彩：一方面，拒绝流散地的语言文化同化，坚信集体想象中的希伯来之根，要求以色列的土地复兴^②，并建立与希伯来文化相匹配的国家体系和权力话语；另一方面，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多数属于 1881 年后民族意识觉醒的“悔过知识分子”（кающаяс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已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同化，精通俄语而不懂希伯来语，因此面临着政治文化主张与政治宣传语言彼此矛盾的尴尬难题。这也导致俄国犹太复国主义难以形成强大、统一的思潮，很快面临内部分裂，因而很难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思想基础。

1889 年，阿哈德·哈姆（Ахад-Хаам）提出，与其关心土地的复兴，不如关心“心灵的复兴”和民族精神、道德的完善，犹太性的中心是在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追求民族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一主张与政治复国主义相对立，被称为“精神复国主义”（духовный сионизм），认为政治复国和土地复兴是“对犹太民族精神文化价值观的背离”，“犹太精神个性应与俄罗斯进步文化元素并进”，巴勒斯坦-以色列应当“成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枢纽；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建立起新的精神联系”，不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是建立“精英精神共同体”。^③从“精神复国主义”思潮开始，犹太性在俄国犹太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中逐渐由宗教概念向精神系统转化，具备了更清晰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意识。

1950 年《回归法》颁布后，以色列与苏联政府就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事宜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沟通，于 1965 年后初见成效，移民人数持续增加（见表 1），分别在 1965 年后和 1990 年后形成过两次“俄罗斯阿利亚”浪潮，其中 1990 年移民人数突增，被称为“大阿利亚运动”（Большая алия）。茨维·基特尔曼认为，“大阿利亚运动”是继 1882 年“阿利亚”运动后俄罗斯

① [以]阿摩司·奥兹著：《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5 页。

② 1882 年，在哈尔科夫成立学生小组“比卢”（Билу），主张复兴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土地，在巴勒斯坦建立模范垦区。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 С.120-125.

犹太群体身份自觉的又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更有赖于亲缘、家族和集体记忆，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减弱。在基特尔曼等学者 1990-2000 年间进行的主题为“俄罗斯犹太身份主要依据”的田野调查中，各年龄层认为犹太身份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亲缘、家族”、“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记忆”，占接受调查总人数比例的 70%以上；将传统习俗作为犹太身份依据的仅占 20%左右，而将犹太教作为身份依据的不足 10%。^①

表 1 苏联及独联体国家移民以色列人口统计（人）

年份	1965-1971	1972-1979	1980-1989	1990-2001	2002-2003	总计
人口数	24730	137134	29754	906127	31057	1128802

资料来源：Сливкина Э.И, Гутгарц М. Крат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377-387.

对于大流散和犹太复国主义语境下的以色列移民现象，学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称其为独一无二的移民现象，另一种则将其视为典型的移民现象。以色列社会学家舒瓦尔（J. Shuval）提出，这些移民在原籍国属于他者，通过移民方式来建立新的故乡和真正的祖国，必须抛弃原来的“伪身份”^②；“阿利亚”并非人口的迁移，而是一场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价值重构运动。^③正是鲜明的意识形态自觉，使这场“选择性移民”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移民现象。移民独特论至今仍是以色列社会主流话语中的强势力量。然而，20 世纪最后几年，更多学者对此质疑。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以色列移民的动因与世界各地移民的普遍动因并无实质上的差异，经济、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的驱动力量明显大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所谓“流浪的民族”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构的族裔神话。^④当代学者雷夫金娜关于后苏联移民动机的社会调查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变化趋势。

① 相关数据参考 Гительман Ц, Червяков В.С, Шапиро В.М. Этничность и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ев// Диаспоры. 2000. №.4. С.53-86.

② J. Shuval, “Migration to Israel: The Mythology of Uniquen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8, Vol.36, No.1, pp.1-23.

③ T. Horowitz, “Value-Oriented Parameters in 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1990s: The Israel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6, Vol.34, No.4, pp.513-535.

④ 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p.38.

表2 后苏联时期犹太人移民动机调查(%)

移民缘由	1995年	2004年
提高生活水平	22	37
担心政治不稳定因素	46	17
利于后代的发展	44	39
惧怕反犹主义	29	12
惧怕屠杀、暴力	28	5
对国家前景无信心	47	25
与家人团聚	25	9
其他	13	15

资料来源：Рывкина Р.В. Как живут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еремен// Демоскоп. 22 января 2006. С.47.

事实证明，1970年以后，俄语区移民的“阿利亚”性质逐渐减弱，大部分移民的目的已不是响应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召唤，他们单纯地想要离开苏联，寻觅摆脱重负的理想国。^①主要动机除提高生活水平外，更多的是对于苏联解体后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前景的不信任。对此，学者克鲁季科夫(М. Крутиков)提出“半苏联时空”(Парасоветский хронотоп)的概念，指1970-1980年间苏联各大城市的犹太文化自我隔离的流散形式，是一种在接受苏联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努力保留族群文化记忆的生活状态。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犹太移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新的土地上保留这种“半苏联”状态，避免苏联解体导致生活方式的剧变。^②在“半苏联时空”的框架下，移民者通过俄苏文化记忆来实现集体身份认同，重新定义了俄语文化的地理空间界线。

一直以来，以色列移民及民族关系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由艾森施塔德(S. Eisenstadt)一派主导，学界称之为“现代化建设范式”。在这一主流话语的框架下，以色列移民必须被社会彻底吸收，成为“社会中充分发挥职能的一员”，否则将一直属于“外来者”。在《移民的吸纳》一书中，艾森施塔德指出：“从移民者个体行为视角来看，吸纳的过程包括新角色的习得，初级群体意识和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扩大活动范围，摆脱初级群体的束缚，

① Носенко Е. Дома или в диаспоре? Израиль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амят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ев// Заметки по евр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2015. №4. С.185.

② Крутиков М. Еврейская память и парасоветский хронотоп//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4. №3. С.98-114.

融入社会系统。唯有吸纳过程的成功完成，才意味着移民者的自我观念、社会地位、价值体系成功融入了一个聚合性的社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充分发挥职能的社会成员。”^①巴尔-约瑟夫（Rivka Bar-Yoseph）则补充说：“吸纳过程应当是一次成功的再社会化，是新身份和角色体系的建构”，“成功的吸纳是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之间的动态平衡”。^②这一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大熔炉”（политика плавильного котла）的概念，将各犹太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视为“流散存在”的象征，认为犹太大流散向以色列的回归将引来一次流亡者的文化心理再造；流散地的文化元素是一种“伪流散身份”，应当被以色列的“权威身份”所取代，以便将“流亡中的犹太人”汇聚成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社会。在上述话语框架下，后苏联犹太移民多以保留“半苏联”生活方式为目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极其复杂，给以色列官方“集结犹太流亡者”的野心带来不小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后苏联时代移民至他国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群体，身份认同受到移入国政治局势的显著影响。移民至单一宗教国家（如以色列）的，往往遵从世俗价值体系，移民至多宗教国家的，反而倾向于将宗教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要依据。例如，在后苏联移民语境下，移民至以色列的以俄语为母语的犹太人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俄罗斯人”，而移民至其他国家的俄语犹太人（如英国、美国）则视自己的文化身份为“犹太人”。^③移居以色列的移民对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强调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强调民主的前提下，单一的犹太身份并不能给政客带来竞争力，相反，俄罗斯与犹太的多重身份在民主话语的语境中显得更有吸引力。这种新流散局面的形成还掺杂着经济因素，由于犹太族群在以色列无法得到国家补贴，因此“回归”以色列的移民多强调自己的原住国身份，这就导致统一的犹太身份非但没有形成，反而促成了马赛克式的文化面貌。^④从这种意义来看，流散现象并未随着俄罗斯犹

① S. Eisenstadt, *The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 p.9.

② 转引自 Majid Al-Haj,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p.45.

③ Прохорова И.Д. Диаспорическ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4. №.3. С.9-20.

④ Лэйтин Д. Де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2004. №.1. pp.5-35.

犹太人返回以色列而消失，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阿利亚运动构建出一种“新犹太流散”。^①马尔科维茨（Ф. Марковиц）等学者指出，俄罗斯犹太人移民至以色列后，发现往昔生活的地位和新生活同等重要，并逐渐意识到犹太和俄罗斯的双重文化身份，他们大多数仍使用俄语，多与身边的俄罗斯犹太人交流，过着一种和流散无异的生活。^②

20世纪80年代后已有学者对“现代化建设范式”和“大熔炉”理念提出异议，然而其着眼点在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话语权的独占和东方犹太人文化独特性被官方忽视的事实，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内部的族群多样性，却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以色列的社会结构与官方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从社会结构和人口构成来看，以色列无愧为世界上最多元化、跨文化融合最显著的国家，然而，以色列的“大熔炉”话语体系中却没有太多的跨文化知觉，官方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身份”的保护伞，将众多语言、生活习惯、文化记忆、价值体系迥然相异甚至相左的族群笼罩在伞下。而这一官方身份实则意味着其他任何一种“反身份”的非法化。^③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阿利亚”运动之后，大部分移民并未获得期望中的新生活和新身份，反而面临着希伯来语境下的又一次“记忆校订”，以俄语为依托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受到威胁，迫使知识分子从个人记忆、生活多样性、隐喻、象征等视角开拓多维度的记忆建构方式。

四、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历史文化记忆重构

集体记忆重构是以色列建国后国家民族主义叙事的首要策略，因此政治话语不断介入历史文化记忆生产。早在1920年，这一倾向在以亚博廷斯基（Jabotinsky）为代表的修正派中已有鲜明的体现。在犹太身份自觉的问题上，亚博廷斯基主张培养“新犹太人”（Новый еврей），即认为犹太人应与

① Eliezer Ben-Rafael, Mikhail Lyubansky, *Building a Diaspora*, Boston: Brill, 2006, pp.5-10.

② F. Markowitz, “Emigration, Immigration and Culture Changes: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Russian Jewish Community”, *Jews and the Jewish Lif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L.: Frank Cass., 1995, p.411.

③ M. Mautner, S. Avi, “Reflections on Multicultur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Israeli Society”, *Multiculturalism in a Democratic and Jewish State*, Tel Aviv: Ramot, 1998, pp.67-76.

流散地的意识形态和耻辱记忆决裂，回归《圣经》的共同源头，将这部民族正典作为犹太伦理道德的根基，并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构建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身份。^①此类观点对以色列文化的影响，在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担任总理时期尤为显著。本-古里安虽反对亚博廷斯基的政治主张，但他清晰地意识到犹太文化符号、民族核心文本对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圣经》是“过去”的意识中心和古代集体意象的资料库，是以色列这个再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在其影响下，《圣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主要语料来源。直至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任总理后，推崇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传统的倾向才逐渐得以改变，如学者宋立宏所说，贝京从不否认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②

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这种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的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基特尔曼等学者于1990年俄罗斯“阿利亚”运动后，就俄罗斯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主要依据展开田野调查，相关数据如下。

由下表可知，俄罗斯犹太人对身份认同的观念呈现出几个主要的变化趋势：（1）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犹太教、犹太语言对文化身份的约束力明显减弱；（2）犹太创伤历史记忆成为族群身份最重要的基础之一；（3）民族历史、传统及共同文化基础上的集体认同感仍然起重要作用；（4）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关系呈分离趋势。上述特征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历史文化记忆重构实践中，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犹太百科全书编纂、苏联创伤历史钩沉以及俄语文化自治倾向。

① Карасова Т.А. Эволюция основных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тановок сионизма в Израиле// Восток. 2010. №6. С.70-79.

② [以]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表 3 俄罗斯犹太人身份认同主要依据调查

主要依据	1992-1993 年	1997-1998 年
保留关于犹太浩劫的记忆	69.3%	77.5%
维护民族尊严和荣誉	77.6%	69.5%
有民族自豪感	51.7%	44.8%
了解犹太历史	48.3%	33.9%
了解犹太传统文化	32.3%	25.3%
与以色列国家命运密切相连	45.7%	25%
熟知犹太语言	31.8%	19.7%
信仰上帝	13.5%	16.6%
熟知并遵守犹太教教规	17.9%	14.5%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10.5%	7.4%

资料来源：Гительман Ц, Червяков В.С, Шапиро В.М. Этничность и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вреев. С.53-86.

（一）犹太百科全书编纂

亚博廷斯基对俄罗斯犹太人在流散地的文化状态做出如下概述：“我们要么应当承认犹太人是一个丧失全部文化的原始民族，要么应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全部文本中，有 95%都是宗教书籍，只有 5%为世俗书籍。我们在哲学、伦理、社会公正等领域的全部价值观念几乎都是从人与上帝的对话中诞生的。”^①俄罗斯犹太移民回归以色列后身份重建的第一步，是结束核心文本意识不足、集体文本缺失的“加路特”（Галут，意为“流放、放逐”）文化状态，构建权威化、体系化的记忆载体，呈现俄罗斯犹太文化的整体景观。这首先集中体现为犹太百科全书的编纂。

俄罗斯最早的一部犹太百科全书是由犹太科学文献协会和布罗克豪斯与叶弗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布罗克豪斯与叶弗隆犹太百科全书》^②，共 16 卷，是总结 20 世纪以前俄罗斯犹太人以及世界各国犹太族群历史、宗教、文化状况的首次尝试。然而，这部书的编纂是在犹太文化建构意识缺失的语境下进行的：“前沿犹太知识分子投身于俄罗斯社会活动中，热衷于犹太民族的权利平等问题，对百科全书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但百科全书“仍会完成自己的文化任务，即自觉地为俄罗斯犹太民族身份服务，成为集体文化的

① Моше Бела. Мир Жабогинского.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С.130.

② Гаркави А.Я, Каценельсон Л.И.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16 томах. СПб.: Общество для научных еврейских изданий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1908-1913.

纪念碑，为犹太民族的精神需求做贡献”。^①这部书问世后，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的百科全书式建构进入停滞状态。直至 1976 年，由耶路撒冷犹太族群研究协会编纂的《简明犹太百科全书》（1976-2005）开始陆续出版，才弥补了俄罗斯犹太研究半个多世纪的空缺。2005 年发布于互联网的《电子犹太百科全书》^②是对《简明犹太百科全书》的扩充和更新，意在跟踪当代以色列犹太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当代以色列犹太移民的主要资料来源。

从记忆研究视角来看，《简明犹太百科全书》和《电子犹太百科全书》的编纂是俄罗斯犹太移民文化身份自觉的鲜明体现，是构建文化记忆核心文本和凸显其“卡农”（Kanon）地位的需要，对于保持族群文化记忆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卡农”原意为“正典”，具有至高的约束力，文本形式有固化的特点，因而是一种具有仪式一致性的文化记忆媒介，在族群文化记忆断裂的危机语境下，对身份的连续性具有极强的补救作用。希伯来《圣经》是典型的“卡农”文本。《简明犹太百科全书》有着鲜明的犹太复国主义视角，记录了 20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犹太人从苏联到以色列的迁移历史，并面向俄语区读者，对《圣经》、《塔木德》以及希伯来经典文献中的术语和思想做出阐释。由此观之，这部百科全书在文化记忆重构与传承方面具备如下功能：第一，标尺功能，通过百科全书的话语建构方式，使俄罗斯犹太人的文化记忆形成完备的文本系统，并为《圣经》等“卡农”式核心文本提供权威解读，构成典范化的文化阐释形态；第二，强化身份认同，以核心文本为文化记忆的中心，为俄罗斯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共同而明确的记忆源头；第三，形成文化生活的动力结构，促使族群有共同的文化目标，增强族群的凝聚力、抵抗力、承载力和约束力，使流散族群向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转化。

（二）苏联创伤历史钩沉

精神文化层面的流散往往与民族集体创伤密不可分。^③民族文化群体被迫离开祖地，通常用流散这个词来表达沉重的集体经验，究其实质而言，俄

① E.K. «Крат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том// Лехаим. 2006. №.4. <http://www.lechaim.ru/ARHIV/168/ek.htm>

②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Общество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еврейских общин, 2005.

③ Ксения Зайка. Диаспорические и иммигрантск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С.74-80.

国犹太流散群体构成了一个小型的创伤社会。上文提到，流散地的“加路特”状态在犹太人的集体观念中具有消极色彩和耻辱含义，但从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理论视域来看，创伤经验是强化集体身份自觉的重要资源。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是创伤社会自我保护的形式，能够增强集体身份的约束力。^①笔者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创伤历史记忆构建中发现三个主要特点：重新定义真实性；压缩历史意识，侧重“新近回忆”；厘定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关系。

对俄罗斯犹太屠杀和创伤历史的记录可追溯到尼古拉·列斯科夫(Н.С. Лесков)于1883年写成的《犹太人在俄罗斯》(Еврей в России)。该书奉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命，对1881-1882年屠杀的缘由和经过做出官方解读，将这次悲剧归咎于犹太人本身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民族性格的缺陷，是沙俄犹太问题官方话语的典型代表。鉴于此，俄罗斯犹太移民知识分子在亚博廷斯基记忆观的基础上对历史真实性提出新的理解：并非所有“事实”都等同于真实，每个大现象都有自己的多副“面孔”，记忆这台自动机器能使主体接近这副面孔的普遍特征。^②1954年，马尔格林(Ю. Марголин)在以色列创建苏联集中营亲历者联盟^③，成员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建立档案中心，旨在保存记忆主体的口述、回忆录，展示俄罗斯犹太人创伤历史的真实面貌。为此，马尔格林提倡把历史记忆建构的重心放在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上，时间集中在苏联时期。这也使苏联记忆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历史档案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并于1980年后呈持续上升趋势，重要的文献有：爱伦堡(И.Г. Эренбург)、格罗斯曼(В.С. Гроссман)的《黑书》^④，坎德尔(Ф.С. Кандель)的《我们的出路之门：九页历史》^⑤，维茨曼(Ф.М. Вейцман)的《无祖国》^⑥等。以亲历者个体回忆为基础的叙事策略表明俄罗斯犹太历史构建中融入了更多的个体和群体关系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共同体意识，即

① [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作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杨航译，载于《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② Жаботинский В.Е.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ерусалим: Библиотека-Алия, 1985. С.60.

③ Союз выходцев из советских концлагерей.

④ Черная книга. 1980.

⑤ Врата исхода нашего. Девять страниц истории. 1980.

⑥ Без отечества. 1981.

个体融入创伤史这个集体语境，在由外而内的过程中产生并强化自我意识，而个体的自我意识是集体自我认知的载体，在此基础上共同体得以形成。^①通过个体记忆建构达到集体身份认同，是共同体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与“他者环境”中得以强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相似，均可视为共同体创立阶段“对立认同”的表征。

（三）俄语文化自治倾向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希伯来语被视为以色列犹太人的文化身份标签，来自各地的移民被要求使用希伯来语，但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巴特亚姆、海法等城市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聚居地形成了特殊的俄语区，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俄罗斯文化组织，如特拉维夫俄罗斯文化中心^②，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巴勒斯坦协会（Русск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等。虽然俄语文化自治至今未上升至以色列国家政策和政治话语层面，但已成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化形态，俄语文化系统完备，涵盖学校、报刊、图书馆、剧院、广播电视等各个方面。1997年前，俄语被列为以色列中学的母语之一，学生可以用俄语进行学习和考试，约有2100名中学生使用俄语接受教育。此外，俄语报纸杂志也很繁荣，1970年后陆续发行一系列俄语“厚杂志”（толстые журналы），如《22》、《耶路撒冷日志》、《俄罗斯书刊通讯》、《镜子》等，约50种；至1990年底，以色列境内的俄语报纸杂志已多达130种。^③耶路撒冷市立俄语图书馆是俄罗斯境外俄语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20世纪90年代初，由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建立的“盖舍尔”（Гешер）剧院，演出众多俄语剧目，也是俄罗斯剧院赴以色列巡演的平台。1990年后，以色列境内出现若干俄语多媒体频道，如广播电台“РЭКА”，“第一广播”（Первое радио）等，此外还有2002年起运营的俄语电视台“Israel Plus”（Израиль Плюс）。

以色列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种现象导致了“俄罗斯隔都”（русское гетто）的形成，是文化隔离和自闭的表现。^④但从文化记忆和集体认同的角

① [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第134页。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в Тель-Авиве.

③ Найдич Л.В. Новая алия сохраняет русски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5. №2. С. 225-241.

④ Элиас Н. Роль СМИ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репатриантов из СНГ в Израиле// Диаспоры. 2006. №4. С.85-104.

度来看，这是对立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吸纳”初始阶段的身份定义来说必不可少，昔日生活习惯的延续和记忆的唤醒有助于移民度过心态最不稳定的时期。与此同时，俄语媒介既是文化习惯延续、文化身份缓冲的需要，也是与以色列社会沟通、联系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 80%以上选择俄语文化媒体，但在时事、消息领域，绝大多数选择相信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当代学者认为该现象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分裂的一个有力佐证。^①以色列学者瓦伊斯柯普夫 (М. Вайскопф) 通过一个矛盾的结论指出这种分裂趋势的必然性：“吸纳的过程进行得越完善和顺利，俄罗斯移民融入以色列生活越容易，那么他与以色列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疏离。”^②民俗学家菲阿尔科娃 (Л. Фиалкова)、叶列涅夫斯卡雅 (М. Еленевская) 等记录相关口述时发现，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经常表示，当他们成功学会希伯来语、适应以色列的行为方式后，更倾向于回归俄罗斯文化。^③

据统计，20 世纪 80-90 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约 60% 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较为深厚的俄语文化根基。他们将俄罗斯文化而不是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视为精神故乡。对于他们而言，集体身份不仅表现为俄语文化习惯的保留，而且倚重俄语移民文化的整体建构，将流散地文化记忆作为身份认同的根基。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是以色列“俄罗斯境外犹太研究中心”^④编纂的 22 卷本论文集《俄罗斯境外犹太研究》。^⑤这部文献以共同的语言俄语为文化身份基础，得以将不同地域的犹太流散群体纳入同一文化语境，对移民以色列、美国、西欧、远东的俄罗斯犹太人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同一性的前提下考察俄语流散文化的内部差异。这种构建方式部分归因于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犹太移民提供的前车之鉴。移民至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起初致力于保存德语和德国文化传统，但由于“文化英雄”的缺

① L. Remennik,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the Main Vehic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Russian Immigrants of the 1990s in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3, No.164, pp.99-101.

② Вайскопф М. Стена// Еврейский книгоноша. 2004. №.5-6. С.4.

③ Фиалкова Л, Еленевская М. Русская улица в еврейской стран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ольклора эмигрантов 1990-х гг. в Израиле. М.: РАН, 2005. С.15.

④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Русское еврейство в зарубежье».

⑤ Русское еврейство в зарубежье. Иерусалим, 1998-2011.

失，浩劫的历史经验占据了绝大部分记忆空间，使德语与纳粹恐怖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一代德国犹太移民拒绝文化自治，使德语文化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传承出现断层。俄罗斯移民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将共同的语言视为文化符号系统，不仅关涉文字、篇章，也包括艺术、仪式、景观和以俄语文本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主人公等。亚博廷斯基、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伊利亚·爱伦堡等知识分子被塑造为俄罗斯犹太文化记忆主人公和“文化英雄”。与百科全书的撰写方式相比，记忆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更依赖当代权威学者的学术话语，突出其政治、历史遭际，引起社会共鸣，使其成为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导向和载体。

在对俄语文化自治倾向问题的探讨中，犹太流散与广义流散概念的边界被打破，导致“以色列俄罗斯流散”（рус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Израиля）这一矛盾概念的出现。俄罗斯文化在流散地和以色列呈现出惊人的连续性。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整个后苏联流散现象都应被纳入俄罗斯移民浪潮的研究体系，与前三次浪潮并称为“俄罗斯流散”（рус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意义几乎与“俄罗斯移民”（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境外俄罗斯”（русское зарубежье）等同^①。这充分显示了俄罗斯文化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还有学者认为，针对当代俄罗斯犹太人文化身份复杂化的流散现象，应使用“русскоязычная диаспора”这个术语，直译为“俄语流散”，旨在淡化民族起源，而以语言文化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扬·阿斯曼认为，对于构建集体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工具，集体认同建立在成员分享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的基础上，而这一点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来实现的，或者说，是通过使用共同的象征系统被促成的。^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学者倾向于将共同的语言作为犹太流散语境下文化身份识别的首要标志。

结 语

2019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以色列“凯伦·哈-伊索德”（Керен

① 关于“俄罗斯流散”四次浪潮的视角可参考俄罗斯《新文学评论》杂志的《流散》专刊：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4. №.3.

② [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第144页。

ха-Йесод)论坛上,普京发表讲话指出,“家族、亲缘、友情的纽带维系着俄罗斯、以色列两国的公民……以色列居住着近两百万俄语公民,我们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俄语国家。”^①不少当代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将被纳入“俄罗斯世界”的轨道。^②至于以色列是否可被视作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层面显然存在争议,但在社会文化层面,普京的论断暗示了以俄罗斯犹太移民为纽带的“俄罗斯-以色列”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可能性。

扬·阿斯曼在论述集体认同基本结构的升级时指出,在群体存在的最基本结构这个层面上,社会(民族)、政治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完全重合性;但在升级形式的层面上,民族、文化和政治形态的原初联合会出现自我分解的趋势。^③以色列的“大熔炉”理念试图将流散地文化背景各异的群体纳入同一社会文化体系之下,带有鲜明的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俄罗斯移民基于俄语文化的记忆和身份建构,可以达到在保留昔日文化身份的前提下形成新的公民认同的作用,一方面巩固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共同体的文化架构,另一方面促使移民形成新的身份意识,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问题,使俄罗斯、犹太、以色列身份在经历自我分解之后得到再一次融合。

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的记忆和身份问题,揭示了后苏联犹太流散现象所包含的复杂结构:第一,文化身份认同与国家政治身份认同之间呈分裂趋势,前者植根于流散地俄罗斯文化记忆的符号系统,后者有赖于以色列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第二,群体的迁移、融合引发严峻的文化适应问题,这是组成新联合体时的必经环节;第三,遵循认同系统创立阶段的对立性原则,即“对立认同”,在“与自我形成反差的”他者环境中,通过文化对立与对抗维护固有的文化身份。上述特征是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典型表征,表明当代犹太流散的性质已逐渐从基于社会单位的民族超级体向基于语言文化记忆的文化共同体转化。记忆危机是大流散语境下犹太人共同面对的难题,但

①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й Израиль: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род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евреев// Газета.ru. 17.09.2019.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

② Какие линии прочертил Путин в своей речи о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Царьград ТВ. 18.09.2019. <https://yandex.ru/turbo>

③ [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第134页。

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和“大熔炉”政策框架下，俄罗斯犹太移民共有的流散地经验和俄罗斯记忆反而充当起集体统一性和独特性的支撑点，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关键，为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契机。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srael has always been a main destination for the migration of Russian Jewish groups. Several large-scale migration flows after 1965 and 1990 contributed to the cultural spatial pattern of “Russia-Israel” axis. In the post-Soviet diaspora context, Israel’s “melting pot” concept has a demand for the upgrad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structure, which complicat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diaspora” and makes the identity issue of the Russian Jewish community more prominent. Russian Jewis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are reconstructed in the context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visions.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Zionist discourse, it is urgent to get rid of the shadow of diaspora ideology and rebuild national culture in line with Jewish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ussian Jewish intellectual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diaspora culture, emphasizing elite intelligence and spirituality. They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populist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views, unable to completely break away from the past, but instead relying more o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diaspora for their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the identity of Israeli Russian Jewish immigrants depends mo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showing the following trends: overcoming the memory crisis caused by Russian-Soviet national discourse, strengthening the bind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protecting Russian tradition in diaspora, and realizing the decomposi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going through the stag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opposing identities, an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 Russian-based diaspora cult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Post-Soviet Diaspora, Russian Jewish Groups, Cultural Identity

【Аннотация】 С конца 19 века Израиль был осно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миграции русских еврейских групп.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лн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ой иммиграции после 1965 года и 1990-х годов внесл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культурно-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ую модель «Россия-Израил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израиль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плавильного котла» требует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что усложняет коннотацию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иаспоры» и делает проблему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еврейской общины более замет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усской еврейской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й памя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рамках сионист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очно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тени идеологии диаспоры и перестроить источни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еврейским коллективным воображением;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усские еврейски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 находятся под сильным влиянием культуры диаспоры, подчёркивают элитар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а сознание и духовность,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под сильным влиянием популист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не могут полностью порвать с прошлым, и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всё больше полагаются на зна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опыта диаспоры дл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зраильских русских еврейских иммигрантов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зависит от построен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следующ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еодоление кризиса памяти, вызва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дискурсом, и укрепление привязк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защита рус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диаспоры и реализация разложения и реинтеграци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рохождение стади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адаптации и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и постепенный переход к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 диаспор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русс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общин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责任编辑 崔 珩)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 ——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王弘毅*

【内容提要】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关键词】波兰中等强国外交 波兰角色身份 “三海倡议” 北极治理

【中图分类号】D83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2-0189(25)

波兰转型30年来，已经从冷战时期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角色，逐步转变为在中东欧地区扮演领导者、在欧洲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兴中等强国。波兰国际身份的提升，与其所处的地缘位置——地缘政治枢轴

* 王弘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潘兴明教授、汪诗明教授、阎德学副研究员和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孙超老师，以及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修改建议。

(geopolitical pivots)^①、经济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功、东欧剧变后“融欧追美”的战略取向，以及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一、概念界定与既有理论的不足

学界对中等强国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多数学者认为，中等强国身份主要取决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而不只是他们的物质基础。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被用来特指那些不具备大国地位，但却有着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基欧汉（R. Keohane）将中等强国定义为那些无法单独发挥作用，但能够借助一个小集团或一个国际机制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国家。^②另有学者指出，中等强国只不过是一个身份追求者：他们不具备入围大国行列的资格，但是又不愿意将自己归类为“安于现状的国家”，需要扮演多边机制或论坛的建设者角色来施展影响力。因此，中等强国“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通常是出于增强其影响力和声望的渴望。^③本文认为，中等强国的衡量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等强国在世界力量格局中位居中间地位，即国家实力位居中等位次；第二，中等强国一般是新的经济增长中心；第三，该类国家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或对地区局势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从以上界定来看，波兰已经基本符合作为一个新兴中等强国的标准。具体的量化指标将在下文展开详细的论证。波兰具备了中等强国身份之后，可将其外交行为纳入“中等强国外交”^④的分析框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基础。通过回顾学界对“中等强国外交”的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学界对于波兰外交的理论阐释主要依据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

首先是结盟理论或称平衡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国家间结盟行为的逻辑

①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 Vol.23, No.4, pp.421-437.

② Robert 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9, Vol.23, No.2, p.296.

③ Saadia Touval, Zartman William,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SAIS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bingdon: Routledge, 1985, pp.252-253.

④ 本文所指的“中等强国外交”，是那些具备了“中等强国身份”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外交行为特征与偏好。

辑，包括对中小国家制衡与追随行为的解释。在现实主义理论谱系中，关于结盟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假定，分别是结构性现实主义“权力平衡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威胁平衡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利益平衡论”。“权力平衡论”尤为强调物质能力，国家主要被分为大国和小国两个类别。小国在无政府秩序中通常采取的外交偏好是追随强者，而不是制衡。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权力平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威胁平衡论”，即国家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制衡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①同属现实主义派别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兰德·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在《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中提出了“利益平衡论”。该理论认为，一国选择制衡还是选择追随策略，取决于国家内部精英统治集团是否认为制衡行动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②国内学者赵艳霞同时利用“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理论对波兰追随美国的外交行为做出了理论阐释。^③现实主义的平衡理论对波美同盟关系的不断强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波兰在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其外交重点开始转为寻求在次地区和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追求地区大国地位。显然，传统的结盟理论对此解释乏力。

其次，在后冷战时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在国际秩序中重新定义中等强国。此类研究被称为“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更多地关注外交政策行为和外交本身，而非全部基于物质基础。^④通常而言，行为主义论者认为，中等强的外交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理念，尤其是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的存在，为中等强国将物质能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可能。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对波兰在跨大西洋关系及地区多边事务中所着力扮演的积极角色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比如刘作奎在“波兰的外交政策走向

①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②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4, Vol.29, No.2, pp. 159-165.

③ 赵艳霞：“威胁平衡与利益平衡——试析波美关系”，《保定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32页。

④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Vol.72, No.4, pp.343-363.

与中波关系”一文中，指出波兰外交政策的第二优先方向，是在跨大西洋秩序中扮演可靠的盟友角色。^①在分析波兰深度介入乌克兰危机的缘由时，孔田平认为，“波兰希望通过乌克兰危机，在欧洲舞台上进一步提高自身影响力”。^②在涉及中东欧次地区的事务上，朱新光指出，波兰的目标在于追求“次地区大国”的身份，其途径是：积极筹建次地区合作组织，如中欧倡议组织、维谢格拉德集团和波罗的海国家大会等，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③同样，波兰学者理查德·歇巴（Ryszard Zięba）在其著作《21 世纪的波兰外交》中，将波兰界定为一个中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扮演以下五个角色：“其一，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经济体；其二，发挥抵制俄罗斯帝国扩张雄心的作用；其三，追随美国并作为美国的青睐者；其四，欧洲一体化的制动器；其五，欧洲一体化的务实参与者。”以上阐释都聚焦于波兰在国际社会的行为表现和政策分析上，未能构建起国内政治因素与“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理论逻辑。波兰当前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府将波兰的安全置于外交首位，一反前任政府践行的积极融欧主义多边外交，奉行一边倒的亲美外交。其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也将随之变化甚至逆转，这也是行为主义理论的局限所在。

综上所述，不论是“结盟理论”还是“行为主义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忽略了不同的中等强国之间在外交行为主观动机方面的差异性，同时也无法解释那些在物质上具备了中等强国实力、但却并不尝试在国际事务上追求更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如瑞典）；以及另一些在物质维度上被界定为小国的国家，却在地区或全球多边事务中发挥着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如新加坡）。基于此，为了更好地解释不同的中等强国，其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与差异性，有学者引入了社会学理论中的角色概念。

① 刘作奎：“波兰的外交政策走向与中波关系”，《当代世界》，2016年第7期，第25页。

②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第41页。

③ 朱新光：“地缘政治与冷战后波兰新外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3期，第77页。

表 1 中等强国外交的三种解释理论

代表理论	界定标准	衡量指标	外交偏好	优点	局限性
平衡理论	等级或位置	物质实力（权力平衡论） 威胁感知（威胁平衡论） 国家收益（利益平衡论）	倾向于采取追随强国的策略	可以解释中小国家的结盟行为与动机	无法有效解释中等强国既非追随也非结盟性质的多边主义外交
行为理论	外交行为	物质实力以及在国际秩序中的对外政策	奉行多边主义外交	将国家外交行为纳入到国际规范的驱动之下，更加关注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的本身效力	忽略中等强国之间主观动机的差异性
角色理论	扮演角色	身份定位 角色期望	联盟建设者、倡议提出者和沟通者	可以解释不同中等强国在外交行为及其动机上的差异性	在量化角色期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

表格为作者自制。

二、角色理论与中等强国外交行为逻辑

角色理论区分了中等强国身份（middle-power status）和中等强国角色（middle-power roles）^①这两个概念，并且将中等强国寻求国际身份的行为与其外交政策议程联系起来。^②借鉴对身份和角色的社会学理解，国际关系领域通常将“身份”定义为“关于特定国家对有价值属性（财富、强制能力、文化、人口、社会政治组织和外交影响力）排名的集体信念”。“角色”概念则指一套制定外交政策的规范，包括政府的态度、决策、反应、职能和承诺，也指外国决策者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身份的看法；角色在寻求国家身份行为及外交政策议程中十分重要。

按照角色理论，中等强国是指国家通过角色概念的确立所追求的一种国

① 在社会学中，身份和角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是紧密相连的。身份通常被定义为群体内的相对社会位置，角色可以被定义为对占据特定社会位置或状态的人所期望的行为。参见 William Thompson, Joseph Hickey, *Society in Focu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Vol.72, No.4, pp.343-363.

②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p.343.

际身份，即中等强国身份。^①具体而言，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取决于一国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立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内政治精英的角色期望。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变量，主要是基于国家角色定位基础之上的角色身份和角色期望。角色期望可以成为中等强国身份确立与其外交政策议程制定的中间环节。角色期望的建构植根于国内变化着的政治精英群体。鉴于政治精英通常会借助历史经验来证明其外交政策议程的合理性，因而历史经验可以成为中等强国构建其当前国际角色的重要因素。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建构之后，将产生一定的角色偏好。

通常情况下，中等强国因其所处的地缘位置、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局限性，因而可以在大国之间、地区及国际多边舞台上扮演“联盟建设者、调停者、沟通者、参与者和倡议者”等角色。其外交偏好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外交理念，通过在次区域和区域发挥领导力、积极参加国际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事务，谋求更多的话语权，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但基于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地缘位置和历史记忆等因素的差异，使得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②比如，韩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朝鲜，而不是国际霸权国或地区大国。其地缘位置处在半岛之上，周边陆地邻国仅有朝鲜一国，地缘安全形势也要优于波兰。较之波兰而言，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韩国身处亚太地区，在经济方面对中国依存度很高，但在安全上又依赖于美国，因此韩国不得不在东北亚地区扮演“经济和政治纽带”以及“平衡器”的角色，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③

波兰由于所处的地缘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其角色期望的内驱动力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波兰多次遭受邻国的瓜分，具有极强的地缘不安全感；第二，波兰曾经作为欧洲大陆上最盛的国家之一，历史上的大国荣光，重新唤醒了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大国雄心；第三，冷战时期作为

①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p.343.

② Cameron Th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vs. Israel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Can Role Theory Integrate IR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2, Vol.8, No.1, pp.25-46.

③ “President Roh Moo-hyun’s Address at the 40th Commencement and Commissioning Ceremony of the Korea Third Military Academy”, Seoul, 22 March, 2005, <http://english.president.go.kr>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使其在东欧剧变后仍然与传统的西欧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以上因素直接影响和传导给了波兰的统治精英。以当前的保守主义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为例，其政治理念具有显著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该党将安全视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外交上奉行“追美、制俄、疑欧”的理念。与之相反的是，前任公民纲领党政府却奉行实用主义政治理念，践行积极的地区多边主义外交，在美欧俄之间维持一种多元平衡的状态。

显然，角色理论将国内主客观因素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作了有效的结合，尤其突出了国内政治精英的角色期望，兼顾了波兰地缘、政党和历史的特殊性对其外交理念的塑造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波兰中等强国外交也具有像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那样在多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特征，这也凸显了波兰中等强国外交的普遍性。但现任保守主义政府的政治理念，使得波兰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特殊性尤为突出，而角色理论兼顾了波兰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规律。

三、波兰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

依据角色理论，中等强国身份的建构依托于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物质能力的扩展；二是自我认同，即该国政治精英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三是他者认同，即来自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该国国际地位的认可。^①

（一）物质能力

衡量中等强国物质基础的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规模、国土面积、GDP和军费开支等四个方面。国内有学者对国家大小划分的界限，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论析。^②本文将据此对波兰的基本物质能力进行衡量。

首先是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截至2017年，波兰国土面积为31万平方公里，在197个被纳入的国家排名中位列第69位，位居前35%，被划分到

^① 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p.350.

^②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12-17页。

了中等国家之列。人口规模约为 3798 万，在 196 个纳入世界人口排名的国家中位列第 37 位^①，位居前 19%。其次是GDP和军费开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截至 2018 年，波兰的GDP指标位列 3000 亿美元到 2 万亿美元之间的中等国家序列；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排在第 7 位，英国脱欧后波兰将跻身欧盟第六大经济体（见表 3）。其GDP增长率在近十年来大幅高出欧盟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见表 4）。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8 年世界各国GDP统计数据，波兰位列第 23 位，位居全球GDP排名的前 13%^②，远远高于中等位次，有望冲击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俱乐部。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各国收入群体划分中，波兰被划在高收入国家之列。在军事实力排名方面，根据全球火力网数据，波兰在 137 个被纳入排名的国家中位列第 24 位，位居前 17%。^③

除了以上的基础指标之外，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状况、营商环境、人口结构、失业率等具体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物质能力的有效指标。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9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波兰的营商环境便利指数在 190 个经济体中排在第 40 位，跻身前 21%。^④全球股票指数提供商富时罗素(FTSE Russell)，自 2018 年 9 月起就将波兰的市场地位从新兴市场升级为发达市场。^⑤另外，欧盟委员会对波兰 2019 年和 2020 年GDP增长的预测是：“波兰将在欧盟成员国的发展速度方面位居第二。”^⑥在失业率方面，波兰近十年来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尤其是 2015 年之后，失业率远低于欧盟总体水平（见表 5）。

①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World Bank, March 19, 2019,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poland?view=chart>

②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tructure of output”, <http://wdi.worldbank.org/table/4.2>

③ “2019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BETA)”,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p>.

④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 p.4,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pdf>

⑤ “FTSE Russell Upgrades Poland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ed Market”, 30.09.2017, <http://archiwum.thenews.pl/1/12/Artykul/328269>

⑥ “欧委会：波兰将成为欧盟第二快的发展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 年 5 月 11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905/20190502861956.shtml>

表 2 国家大小划分

国家类别	基础维度		实力维度	
	面积（万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亿）	GDP(万亿美元)	军费开支（亿美元）
大国	>200	>1	>2	>200
中等国家	25-200	0.35-1	0.3-2	40-200
小国	<25	<0.35	<0.3	<40

表格为作者自制。

表 3 2018 年欧盟 28 国 GDP 总量前十排名表（10 亿美元）

国家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波兰	瑞典	比利时	奥地利
GDP	3951	2829	2780	2076	1428	915	586	556	532	456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为作者自制，数据来源：IMF: WEO October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2/weodata/weoselgr.aspx>

表 4 2009-2018 年欧盟国家平均 GDP 增长率与波兰增长率对比表（%）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欧盟	-4.3	2.2	1.8	-0.4	0.3	1.7	2.3	2	2.6	2
波兰	2.8	3.6	5	1.6	1.4	3.3	3.8	3.1	4.9	5.1

表格为作者自制，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digpub/european_economy/bloc-1a.html?lang=en

表 5 2009-2018 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与波兰失业率对比表（%）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欧盟	9	9.6	9.7	10.5	10.9	10.2	9.4	8.6	7.6	6.8
波兰	8.1	9.7	9.7	10.1	10.3	9	7.5	6.2	4.9	3.9

表格为作者自制，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digpub/european_economy/bloc-1a.html?lang=en

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2016 年波兰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3%、22.27%和 74.73%。^①在人口结构方面，位于 15-64 岁之间的波兰人口总数截至 2018 年占比为 67%，0-14 岁人口占比为 15%，65 岁以上占比为 18%。^②按照老龄化社会的衡量指标，波兰属于中等程度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15 年发布的各国人口平均年龄预测报告，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波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8 年，第 16 页。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wdi.worldbank.org/table/2.1>

2050年波兰人口结构的平均年龄将达51.8岁，排在全球第十位。^①就这一点而言，老龄化对波兰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带来挑战，而在其他方面，波兰表现出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二）自我认同

角色理论下政治精英群体对本国国际角色的自我认知，是建构其中等强国身份的核心要素。根据波兰外交部发布的2017-2022年外交战略文件，波兰的外交优先目标与定位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安全，发展波兰自身的国防能力，增强在北约和欧盟的地位，追求积极活跃的地区政策；二是增长，努力推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三是高站位，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中塑造一个积极的波兰形象。^②2019年11月17日，波兰外交部长贾切克·扎普托维奇（Jacek Czaputowicz）在本国举行的一次外交庆典中明确表示，“成为20国集团成员是波兰未来明确的目标。”^③这一言论印证了此前两天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在总统府举行的对外服务日庆祝活动中发表的关于波兰希望加入20国集团的声明。^④除此之外，一国的政治精英也倾向于结合该国的历史经验，建构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身份。波兰谋求中等强国身份的内在动力，植根于波兰曾经作为欧洲大陆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历史记忆。身处欧洲中部的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国家，在中世纪时期有过辉煌的历史。波兰曾先后击败过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奥斯曼帝国和莫斯科大公国。^⑤在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1386-1434年在位）统治期间，波兰取得了诸多辉煌战果。^⑥16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曾一度是欧洲

①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Key Findings and Advance Tables”, *Population Division*(201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9.07.2015, ESA/P/WP.241.

② “Polish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2017-2021”, p.5, <https://www.msz.gov.pl/resource/0c98c3b2-9c5d-4c42-8761-f7827134ee76:JCR>

③ “G20 Membership Remains Ambitious Goal for Poland”, November 16, 2019, <https://poland.in.com/45364360/g20-membership-remains-ambitious-goal-for-poland-fm>

④ “Prezydent: chcemy być przyjęci do G20 i innych światowych gremiów”, *PolskieRadio24*, <https://polskieradio24.pl/5/1222/Artykul/2404203,Prezydent-chcemy-byc-przyjeci-do-G20-i-innych-swiatowych-gremiow>

⑤ 孔寒冰著：《东欧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⑥ [法]安德烈·瑟利耶著：《中欧人文图志》，王又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强国，比俄国或任何德意志公国都要强大。^①这些历史记忆，至今仍激励着波兰政治精英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雄心。

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在本国学者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共识。最具代表性的是华沙大学教授理查德·歇巴（Ryszard Zięba），他认为按照新现实主义者的假设，对国际体系影响最大的行为体是最强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因此国际反恐行动的首要参与者，也应该是这类大国，如美、俄、英、法、德等，其次是作为中等强国的波兰等国和国际组织。^②

另一位华沙大学学者强调，波兰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民众和研究机构中得到广泛的认可。波兰公共舆论调查中心（CBOS）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政治满意度方面，截至2019年，52%的民众对本届政府持满意态度。^③在对欧盟态度方面，27%的民众支持欧盟有限度的一体化，并不断提高波兰在欧盟中的地位；25%的人认为应该深化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④在波美关系方面，多数波兰民众对本届政府不断强化波美同盟持积极态度。其中83%的民众认为，美国是波兰相当重要的伙伴。同时，50%的人认为波兰对于美国是相当重要的伙伴。^⑤从以上可见，波兰民众对本国外交地位的认知具有较高的期望。该学者还认为波兰中等强国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在于其所处的地缘位置。夹在东西大国之间的地缘位置，使得波兰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局势，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波兰的这种影响力通常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施展出来，但可以通过多边国际组织（如北约）得以发挥。^⑥

（三）他者认同

① [美]伊塞·沃洛克、格雷戈里·布朗著：《现代欧洲史——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与进步（1715-1789）》，陈蕾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4-45页。

② 该学者在其著作中明确地使用了“Middle Power, a Mid-Size and Middle Rank Country”来描述波兰的国家类别。参见 Ryszard Zięba, “The Security Concept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Euro-Atlantic Security System”, in *The Euro-Atlantic Security 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p.87.

③ “Social Reactions to the New Government”, December, 2019, p.2,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9/12_2019.pdf

④ “Is Law and Justice(PiS) Leading Poland out of the EU?”, p.2,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8/11_2018.pdf

⑤ “The State of Poland-USA Relations”, April, 2019, p.2,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9/04_2019.pdf

⑥ Justyna Zajac,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West,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4.

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本国政治精英的认知，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通常情况下，中等强国都是地区性大国，在所在地区一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首先，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在中东欧地区具有一定的认可度。比如 2015 年波兰和克罗地亚联合提出的“三海倡议”，得到了其他 11 个中东欧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并且“三海倡议”领导人首届峰会在波兰举行。捷克学者认为，在美国的支持下，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扮演了地区领导者的角色。^①另一位来自匈牙利中欧大学的学者认为，波兰在 1989 年政权更迭和 2004 年加入欧盟之后，克服了地缘政治劣势，使其在中东欧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强国。^②

其次，从欧盟方面来看，来自德国的学者认为，波兰既是维谢格拉德集团体量最大的国家，又是与法德联合发起魏玛三角的成员，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使得波兰可以在英国脱欧后欧盟领导权的重新调整中扮演战略性角色。^③2018 年 3 月，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寻求改革德国、波兰和法国三者之间的“魏玛三角”机制，并呼吁波兰承担起作为欧盟决策制定者之一的领导角色。^④法国方面也对波兰在欧盟中的地位予以认可，其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蒙特查林（Amélie de Montchalin）于 2020 年 1 月在“魏玛三角”机制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英国脱欧后，法国、德国和波兰的人口占欧盟的近半数，与 GDP（不含英国）和人口都排在欧盟第六位的波兰展开更多合作意义非凡。”^⑤

此外，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教

① Viktória Jančoškova,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European View*, 2017, Vol.16, No.2, p.232.

② Wyatt Nagorski,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Post-1989 Central Eastern Europe: Poland’s Rise to the Middle”, Master’s thesis, Central Europe University, 2007, p.2.

③ “Berlin and the V4 in a Post-Brexit Europe”, 27 June 2018, <http://wise-europa.eu/en/2018/06/27/berlin-and-the-v4-in-a-post-brexit-europe/>

④ Deutsche Welle, “Germany’s Top Diplomat Heiko Maas to Revive Trilateral Talks with Poland and France”, March 16, 2018, <https://www.dw.com/en/germanys-top-diplomat-heiko-maas-to-revive-trilateral-talks-with-poland-and-france/a-43016326>

⑤ EURACTIV, “Macron Launches Charm Offensive to win Over Poland”, January 29, 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politics/news/macron-launches-charm-offensive-to-win-over-poland/>

授，将波兰视为一个新兴的地区大国。他认为波兰能够成为一个地区大国的三个关键要素是：处在俄德之间的地缘位置、经济竞争力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其中第三个是关键因素。^①来自美国菲奇堡州立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约书亚·斯佩罗（Joshua Spero），同样将波兰界定为一个中等强国，并指出波兰在中东欧地区拥有的重要影响力。^②

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在一篇公开刊物中提及，波兰和中国、土耳其、韩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国，作为新兴强国（*emergent powers*），正在使加拿大的外交在国际舞台上黯然失色。^③该学者在文中将波兰定位成一个处在关键地带、并可以对大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另有学者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认为，普遍接受的中等强国包括：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波兰和土耳其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些国家都在追求适合中等地位的外交。^④由此来看，波兰在国际上被视为一个中等强国是具有合理性的。

四、角色期望与波兰的外交角色偏好

波兰的中等强国角色定位，主要受到其国内政治精英基于历史记忆的角色期望。东欧剧变之后，波兰以其所处的独特地缘位置、波美同盟关系的不断强化以及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就，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

① “Geopolitics Guru: Poland is a Rising Power”, October 3, 2018, <https://polandin.com/39304593/geopolitics-guru-poland-is-a-rising-power>

② Joshua B. Spero, “Great Power Security Dilemmas for Pivotal Middle Power Bridging”,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09, Vol.30, No.1, p.147.

③ Bruce Gilley, “Reawakening Canada’s China Policy”,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2008, Vol.14, No.2, p.121.

④ Andrew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p.14-16; Pierre G. Goad, “Middle Powers to the Rescu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0, Vol.163, No.24, p.69.

第一，融入西方并扮演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①东欧剧变初期的波兰实力尚弱，1990年波兰GDP在全球排名第36位，军事实力排名第40位，无法支撑其在中东欧谋求主导权的地区大国雄心。加上在冷战时期作为苏联卫星国的历史记忆，使得1989年后的波兰政治精英在角色期望方面渴望重新融入西方，因而走上了全面的经济和政治转型道路。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波兰的国际角色，也由冷战时期作为对抗西方阵营的东欧国家，转变为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搭建起东西欧之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使波兰在欧洲的身份得以突出。例如，波兰在1989-1991年在德俄等大国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1989年8月，第一个从苏联集团脱离出来的后共产主义联盟政府在波兰开始形成。^②独立后的波兰首任外交部长斯库比泽夫斯基（Krzysztof Jan Skubieszewski）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理念，谨慎地处理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其与民主德国在1970年波德条约的基础之上确定了波德“奥得-尼斯河”边界，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在1989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多次互访。波兰领导人本着非对抗和务实的战略原则，使得双方在尊重主权、权利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多个方面达成了一致。此外，1989年9月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对波兰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强调，“波兰回归民主道路对整个欧洲是巨大的成功”。作为回应，波兰总理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表示，“我们非常清楚存在于双边关系中的历史负担，但我们的对话也将着眼于未来。”^③由此可见，波兰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直面大国的军事威胁，但其可在动荡的、对抗性的区域秩序中促进大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协调，消减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烈度，从而降低大国在该区域内的对抗性。^④

此外，对德和解为波兰加入欧盟、彻底融入欧洲，提高在欧洲的国际身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89年以来，德国在波兰加入欧盟事务方面扮演

① 美国学者斯佩罗（Joshua B. Spero）认为，波兰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其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弥合东西欧之间长久以来分歧的桥梁，即调停者。参见 Joshua B. Spero, *Middle Powers and Regional Influence: Critical Foreign Policy Junctures for Poland, South Korea, and Boliv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9, p.1.

② Ibid, p.7.

③ Ibid, p.10.

④ Ibid, p.3.

了波兰利益的非正式代言人角色。^①例如，1991年8月，在德国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倡议下，德、法、波三国外长在德国中东部小城魏玛举行了首次会晤。此后，德、法、波三国外长每年定期会晤，“魏玛三角”机制随之建立。从本质上看，“魏玛三角”是欧盟东扩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突出了波兰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地位。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对此评价，“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同时具有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②

第二，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波兰扮演的另一个重要国际角色，是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尤其是在1999年成功加入北约以后，波兰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积极配合美国。例如，波兰2003年追随美国参与了伊拉克战争，2019年2月配合美国举办了“华沙中东安全会议”。近年来，波兰作为美国的能源伙伴，不惜高价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有波兰学者认为，此举表明，“现任政府并不是真正为了实现天然气进口多元化，而是一味地讨好美国，并完全放弃来自俄罗斯方面的能源进口渠道。”^③

从角色期望来看，波兰自1772年以来遭受俄、普、奥等邻国的瓜分与沦亡的历史记忆，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波兰政治精英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自我政治认知。尤其是2005年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卡钦斯基兄弟执政之后，波兰在外交取向上奉行强烈的保守主义理念，强调民族利益，凸显波兰作为东欧大国的地位，试图借此在欧盟框架内谋求大国身份。正如卡钦斯基总统所言：“我并不热爱美国，但是美国给我们提供一个保护伞；同时，美国与波兰相距甚远，因此波兰不会对美国产生直接依赖。美国在波兰有着自身的战略利益存在，虽然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但也增强了我们在北约和欧盟的战略地位。”^④这种政治认知来自波兰右翼政府根深蒂固的恐俄心理，以

① Tadeusz Lebioda, “Poland, die Vertriebenen, and the Road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 Karl Cordell, *Po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165.

② [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③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Basel: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267.

④ Justyna Zajac,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West,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16, pp.114-115.

及对自身所处缓冲地带的不安全感。因此，转型之后的波兰孜孜以求的愿望就是追随美国，加入北约，得到集体安全的保障。在成功实现“入约加盟”之后，波兰的安全得到了多重保障。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波兰开始在中东欧地区寻求地区大国地位。

第三，欧洲地区大国地位的追求者。波兰作为一个议会制国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同样受到政党更迭的影响。波兰自 2004 年加入欧盟以来，以公民纲领党为代表的融欧主义长期占据上风，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扮演了积极建设者的角色，为其地区大国身份的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撑。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之后，波兰的地区大国抱负在保守主义政府的带领下更加雄心勃勃。该党在难民分配和宪法改革等多个议题上公开挑战欧盟的权威，并在中东欧地区发起联结三海之间的地缘政治倡议。

从角色期望角度来看，在 2007-2014 年，来自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理念上奉行积极的融欧主义。在政治方面，该届政府重启魏玛三角机制、奉行与美国更加务实的盟友关系、缓和对俄关系等一系列外交举动，使其在地区间发挥的国际角色愈发重要，国际地位和认可度也随之提升。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2009 年 7 月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向法国外长提议，提高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建议法波在安全领域首先展开合作。^①此外，波兰在欧盟委员会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2011 年 7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提出了大量旨在增强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的倡议，其中包括：第一，联合采购和使用防御设备；第二，改革欧盟战斗部队；第三，建立欧盟层面的永久性军民合作计划和指挥总部；第四，积极推动与欧盟东部国家的合作。^②

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之后，其在政治理念上奉行保守的民族主义，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大国雄心得到进一步激发。波兰一改前任政府的融欧主义政策，相反在难民问题和宪法改革等多个议题上，不顾德法等大国的施压，公然挑战欧盟权威。

具体而言，在难民问题上，波兰坚决抵制欧盟委员会出台的强制性难民

① Justyna Zając,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West,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p.121.

② *Ibid.*, p.122.

摊派方案。在法制方面，现任政府自 2015 年以来的司法改革被欧盟以破坏司法独立为由提出了指控。对此，波兰执政党反驳称，欧盟干涉了波兰国家内政，双方陷入了长期的纠纷之中。而且，德、法、波三国之间的“魏玛三角”会晤也在 2016 年之后中断，以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被贴上了疑欧主义的标签，一度成为影响欧盟团结的搅局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波兰对于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团结的重要性，在英国脱欧后显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波兰作为 2020 年开年的首访国家，表达了法国希望与波兰开展更多合作、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意愿。^①

总而言之，波兰中等强国角色期望的建构，将直接塑造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偏好。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处在缓冲地带的新兴中等强国而言，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尚不能支撑其在国际安全领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因此，谋求在中东欧次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具有专业优势的国际多边治理领域扮演积极角色，成了波兰塑造其中等强国身份的优先选项。

五、案例分析：三海倡议与北极外交

波兰依靠自身的地域和特定领域优势，在“三海倡议”和与北极治理相关的多边科考论坛中扮演了倡议者、协调者和建设者角色。反向来看，这些角色的扮演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其中等强国身份，提高波兰的国际地位。

（一）在中东欧地区发起三海倡议

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波兰的地区大国抱负更加凸显，与克罗地亚亚联合发起了链接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三海倡议。^②覆盖范围

① “Macron Seeks to Smooth Relations with EU Rebel Poland”, February 1, 2020, *France vingt-quatre*,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0201-france-poland-emmanuel-macron-green-deal-european-union-climate-goals-carbon-neutrality>

② “三海倡议”当前的实施进展，除了于 2017 年在第二届“三海倡议”首脑峰会上成立了“三海城市论坛”外，2019 年波兰国家开发银行和罗马尼亚进出口银行共同签署了三海倡议投资基金创始协议。基金监事会由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捷克的开发银行代表组成。目前，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两个创始金融机构已承诺出资超过 5 亿欧元作为启动基金。另外，“三海倡议”还将争取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基金的投入。该基金的重点是推进三海地区的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项目。根据 2019 年“三海倡议”官方发布的“2019 优先互联互通项目报告”，在交通互联互通领域（转下页）

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 12 个国家。波兰在其中扮演了主要倡议者的角色，一时间被认为是波兰地区大国雄心复苏的重要标志。正如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契霍茨基（Bartosz Cichocki）在 2018 年布加勒斯特三海峰会上所评论的，“波兰正在成为一个与以色列和英国相当的力量”。^①

波兰的三海倡议已经引发了德国、俄罗斯以及欧盟方面的密切关注。在俄罗斯方面，其国内主流媒体之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刊文称，“三海倡议：是否标志着波兰时刻的来临？”该文指出，“‘三海倡议’的第三次峰会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虽然这个区域框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华沙政坛背后的地缘政治野心让人怀疑波兰时刻是否已经到来。”^②在德国方面，《南德意志报》国际部负责人柯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指出，“建立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邦’，是几代波兰人旧地缘政治梦想的象征。”^③另外，三海倡议创立伊始，欧盟就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该倡议有分化欧盟的风险。直到 2018 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受邀参加了该倡议的首脑峰会，来自欧盟层面的疑虑才逐渐化解。在 2019 年斯洛文尼亚举办的第四届三海倡议首脑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再次列席，并赞扬了三海倡议在能源、交通和数字等主要领域计划实施的互联互通项目，并表示欧盟将会利用凝聚基金继续支持三海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④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

（接上页）达成十一项多边合作协议；在数字化方面，达成的协议有八项；在能源方面达成九项。这些项目中的多个得到了欧盟基金的支持。参见“Three Seas Initiative - Priority Interconnection Projects, 2019 Status Report”, June 2019, pp.1-3, <https://irp-cdn.multiscreensite.com/1805a6e8/files/uploaded/Status%20Report%202019-online.pdf>

① Minister już widzi Polskę w roli globalnej potęgi. Warto zejść na ziemię, WP opinie, September 19, 2018. <https://opinie.wp.pl/minister-juz-widzi-polske-w-roli-globalnej-potegi-w-arto-zejsc-na-ziemie-6296980029589121a>

② Andrew Korybko,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Has Poland’s Moment Finally Arrived?”, 15.09.2018, https://sputniknews.com/radio_trendstorm/201809151067999865-the-three-seas-initiative-has-polands-moment-finally-arrived/

③ Bartosz Wiśniewski, “Wielki plan małych państw”, TVN24, 03 lipca 2017, <https://www.tvn24.pl/magazyn-tvn24/wielki-plan-malych-panstw-jak-trojmorze-wzmocni-lub-podzieli-unie,106,1968?debateSlug=magazyn-tvn24>

④ “Three Seas Initiative Summit Urges EU to Consider its Goals”, 7 June 2019, *The Slovenia Times*, <http://www.sloveniatimes.com/three-seas-initiative-summit-urges-eu-to-consider-its-goals>

Walter Steinmeie) 也首次应邀出席了此次峰会。以上表明欧盟层面对三海倡议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 并有意将该倡议作为改善中东欧地区基础设施状况、缩小欧盟地区差距的积极平台予以支持。

按照角色理论逻辑, 波兰在三海倡议中的角色期望主要来源于当前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自我政治认知。该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Jarosław Kaczyński) 通过追求保守的爱国主义塑造波兰的发展方向。^① 2019年, 法律与公正党颁布的行动纲领指出, 波兰的外交目标将致力于提高其在次地区、地区和全球领域的国际地位; 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 波兰应该充分发挥在该地区的潜力, 推动该地区国家的主体性和主动权。当前, 波兰在中东欧地区通过多个合作形式的实践, 有力地推动了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实践包括: “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机制” (Bucharest Format)、 “维谢格拉德集团” 和 “东部伙伴关系” 等。^②

“三海倡议” 的提出, 也是波兰对长期以来波俄之间能源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有力回应。波兰试图通过联合中东欧国家, 建立三海区域内的能源联盟, 实现能源的相对独立。比如, 在 2019 年 “三海倡议” 峰会达成的九项多边合作协议中, 涉及多项天然气的互联互通。包括以下项目: 第一, 由波兰发起的 “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联” (GIPL) 项目, 参与国家有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 第二,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天然气管道连接项目 (BRUA); 第三, 由斯洛伐克发起的 “东线项目” (Eastring), 参与国家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③

麦金德曾对波兰的地缘局势作过如下评述: “波兰免于左右进犯的不二法门, 就是联结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 有一大批独立的国家楔入德俄之间。”^④ 波兰当前积极推动的 “三海倡议” 的地理覆盖范围, 恰好与此基本吻合。也有波兰学者认为, “三海倡议” 实质上是一个地缘政

① Viktória Jančoškòvò,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European View*, 2017, Vol.16, No.2, p.232.

② “Prawa i Sprawiedliwòsci 2, polski model panstwa dobrobytu”, pp.176, 183, 185, September 14, 2019, <http://pis.org.pl/dokumenty>

③ “Three Seas Initiative - Priority Interconnection Projects, 2019 Status Report”, pp.1-3.

④ [英]麦金德: 《陆权论》, 徐枫译,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 第131页。

治项目，旨在确立波兰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者角色。^①

（二）谋求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地位

2015年，波兰出台了《波兰北极政策的关键地区与优先行动》战略报告，至此，波兰的北极外交战略得以正式确立。波兰在北极事务中扮演的国际角色，主要来自其长久以来在北极治理领域积累的专业优势和历史积淀，这助推了波兰在北极事务上谋求地区大国地位的角色期望。

当前波兰在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几个科研机构（平台）中都有自己的事务代表，这几个机构（平台）分别是：北极地区最大的科学合作平台——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北极观测网络、欧洲极地委员会和斯瓦尔巴群岛科学论坛（Svalbard Science Forum）。^②波兰极地站（Polish Polar Station）是欧洲北极地区唯一的此类设施，该站每小时发送一套气象数据，供世界各地的天气预报机构使用。^③这些监测数据得到了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等不同国际机构的认可。波兰极地站还是欧盟成员国的两个永久载人站之一。^④因此，其他非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和欧盟对波兰在北极科考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所倚重。以上要素共同建构了波兰在北极事务中扮演的积极参与者、科研合作平台的搭建者，以及议题的倡导者等角色（见表6）。

从具体实践来看，第一，波兰在北极科考领域扮演了重要的倡议者角色。“所有在斯瓦尔巴群岛进行的北极科考活动，都是经由挪威研究理事会主持的斯瓦尔巴群岛科学论坛进行国际协调的，而波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各类科考合作议题的发起国。”^⑤如在2010年和2011年，波兰智库连续两年发起组织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部长级会议，第一次是与北欧国家的大

①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Basel: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264.

② Michał Łuszczuk, Piotr Graczyk, Adam Stępień, Małgorzata Śmieszek, “Poland's Policy towards the Arctic: Key Areas and Priority Actions”, *Policy paper*, 2015, Vol.113, No.11.

③ “Key Role for Poles in Polar Research”, *The Warsaw Voice*, March 31, 2015, <http://www.warsawvoice.pl/WVpage/pages/article.php/27953/article>

④ Piotr Graczyk, “Poland and the Arctic: Between Science and Diplomacy”, *Arctic Yearbook* 2012, 2012, p.145.

⑤ Research in Svalbard, “About RIS”, <https://researchinsvalbard.no/about>. 转引自肖洋：“一个中欧小国的北极大外交：波兰北极战略的变与不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2期，第65页。

使馆合作，第二次是与加拿大大使馆合作。^①这两个活动不仅成为专家讨论的平台，而且为北极治理“波兰方案”的提出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了波兰在北极事务及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位。波兰还作为倡议者，于2013年4月在克拉科夫举办了北极科学峰会周，进一步提高了其在极地事务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第二，在地区层面，欧盟的北极政策概念被视为波兰参与北极事务的几个重要层面之一。波兰积极利用欧盟制定北极政策的机会，通过自身科研优势，积极参与协调欧盟在北极理事会中的利益，谋求与欧盟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提高其在欧盟中的战略身份和外交影响力。^②2011年11月，在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波兰组织了一次由欧盟所有成员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了欧盟的北极政策，波兰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此外，波兰还在多个不同场合积极支持欧盟的北极政策，包括协助欧盟谋求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身份。^③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对外行动署共同起草并向欧洲议会提交了议案——《制定欧洲联盟对北极地区的政策：2008年以来的进展及后续步骤》。对此波兰政府表示，波兰欢迎欧盟对北极地区的政策，认为该政策符合波兰的期望，并宣布愿意与欧盟成员国合作制定欧盟的北极政策。^④

第三，在全球层面，较之其他北极大国，波兰的国家实力有限，因而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优势领域。^⑤按照这一原则，波兰副外长马切·什普纳尔（Maciej Szpunar）2011年3月在第二次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部长级会

① Michał Łuszczuk, “Arctic Council Observer: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Poland’s Approach towards the Arctic Region”, *Polar Oceans Governance*, 2019, pp.487-502.

② M. Łuszczuk, “Propozycje założeń stanowiska strony polskiej wobec dokumentów unijnych dotyczących prawnym i międzynarodowej i politycznej problematyki rejonu Arktyki”, 2011, p.26; Piotr Graczyk, “Poland and the Arctic: Between Science and Diplomacy”, *Arctic Yearbook 2012*, 2012, pp.143-144.

③ J.Grzela, “Rola i miejsce Arktyki w polityce zagranicznej Polski”, in R. Czarny (Ed.), *Daleka Północ w globalizującym się świecie [Special Issue]. Studia Humanistyczno-Społeczne*, 2011, No.5, p.200; Piotr Graczyk, “Poland and the Arctic: Between Science and Diplomacy”, *Arctic Yearbook 2012*, 2012, pp.143-144.

④ Leif Christian Jensen, Geir Hønnelan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s of the Arcti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581.

⑤ P. W.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19, No.1, p.125.

议上提出了波兰北极政策的“四大支柱”，即波兰的北极活动应基于：遵守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并制定与北极科考和其他合作有关的各种协定框架；积极参与制定欧盟的北极政策；与北极理事会合作；发展与极地问题有关的公共外交。^①波兰支持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北极地区的领土争端；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的改革，同时积极参与构建高效的北极多边治理框架。在不断变化的北极时代，波兰在北极科研和与北极治理相关的国际多边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角色。从表 6 可以看出，波兰近年来在北极科考领域扮演的角色较为活跃。这为促进波兰利用这些外交渠道发展与北极和非北极国家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平台。^②

表 6 近年来波兰在北极科考领域扮演的主要角色

年份	参与方	事件	扮演角色
1998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德国、英国、荷兰、波兰	北极理事会第一届观察员国部长级会议	正式成为永久观察员国
2008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德国、英国、荷兰、波兰、西班牙、法国	北极理事会副部长级会议	倡议者
2009	丹麦、法国、德国、芬兰、英国、波兰等正式观察员国和四个候选代表国(中国、日本、南非、意大利和欧盟)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部长级会议	承办方和组织者
2010	同上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部长级会议	承办方和组织者
2011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英国、荷兰、波兰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部长级会议	参与者
2012	包括波兰在内的《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的几十个国家	斯瓦尔巴群岛科学论坛	倡议者
2012	——	北极持续观测网计划	领导者之一
2014-2016	波兰与挪威、俄罗斯、德国	最大规模的多学科北极联合科考项目——极地研究项目	议题倡议国与领导国

表格为作者自制

① M. Szpunar, “Wystąpienie Podsekretarza Stanu M. Szpunara na polsko-kanadyjskiej konferencji arktycznej”, Warsaw, Poland, 1 March 2011.

② P. Graczyk, “Observers in the Arctic Council -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The Yearbook of Polar Law*, 2011, No.3, pp.587, 621.

总之，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在北极地区原本没有经济与战略利益的国家来说，通过发挥其传统意义上的科研优势，以科研为依托，扩大对于北极事务的介入，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北极外交除了作为国家形象的助推器外，还进一步巩固了波兰在北极理事会中的北极科研大国的身份。

结 语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地区和次地区大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日趋活跃。波兰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取得显著成绩、处在地缘政治枢轴且备受美国倚重的次地区大国，近年来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扮演的角色也日益抢眼。自 2015 年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以来，其先后在中东欧地区发起了“三海倡议”，出台了北极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传统观念上被国际社会视作一个小国的波兰，已经不再安于现状，偏安一隅，而是试图在次地区和地区多边事务中谋得一席之地。

在角色理论框架下，角色定位和角色期望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偏好。波兰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综合国力的提升，波兰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排名都可跻身中上位次，而经济转轨所取得的成就也比较突出。在军事能力方面，波兰拥有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保险，加之不断强化的波美同盟关系，也为波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安全保障，使其在北约前沿防御中扮演愈发重要的支点角色。二是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自我认同，当前执政党相较于前任政府，地区大国雄心更加凸显。三是来自国际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助推了波兰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

角色期望主要来自波兰政治精英对其当前国际角色的自我驱动。当前波兰执政党属于保守的右翼政党，其在政治认知上，更加突出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爱国主义。其对波俄关系的历史因素更为重视，因而地缘上的不安全感也更加突出。近年来波兰在国际社会中愈发“引人注目”的外交举动，受到了其中等强国身份和中等强国角色期望的双重驱动。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促使其在中东欧地区发起“三海倡议”，追求领导地位；同时也在其擅长的专业领域——北极多边科研机制或论坛中，扮演重要的倡

议者和沟通者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多边事务上，波兰不仅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首届“16+1 合作”机制的推动者和举办国，而且也是中东欧地区唯一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国。从这当中也可窥见波兰雄心渐起的中等强国外交角色。总而言之，对波兰而言，通过更加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国际多边事务，将不断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能见度，进而助推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巩固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

【Abstract】 Poland's status as a medium power has been jointly shaped by its enormous economic achievements since the transition, its domestic political elites' perceptions as a regional power, and improvement in recogni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us as a medium power has constructed Poland's role expectation, driving it to play roles such as "a mediator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a firm ally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a seeker for great power status in Europe"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Especially since the Law and Justice Party took power in 2015, through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and "Arctic Diplomacy", Poland has been actively seeking leadershi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tatus as a regional power in terms of Arctic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e existing "alliance theory" and "behaviorism theory" ignore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motivations in diplomatic behaviors among different medium powers, while the role theory highlights the causal logic between domestic elites' political perceptions and their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beneficial to reveal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medium powers' diplomac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current Poland's ambitious diplomatic decision logic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role theory.

【Key Words】 Diplomacy of Poland as a Medium Power, Poland's Role and Identity, "Three Seas Initiative", Arctic Governance

【Аннотация】 Огром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сл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ризна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державой внутривосточной элитой и

повышение призн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статус Польши как средней державы.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татуса средней державы создало ожидания о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роли Польши, побудив Польшу играть роль «посредника между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ой», «твёрдого союзника трансатлан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искателя статуса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после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артия «Право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пришла к власти в 2015 году, Польша активно стремилась к лидерств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статусу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державы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Арктике, запустив «Инициативу трёх морей» и «Арктиче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в научной сфер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теория альянса» и «теория бихевиоризма» игнорируют различия в субъективных мотива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редн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теория ролей подчёркивает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ую логику меж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ознанием внутренней элиты и принятие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выявлению различных мотиваци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азных типов средних держав.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редпринята попытка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нынешнюю амбициозную логику принят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в Польше в рамках анализа теории роле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льши как средней державы, ролев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Польши, «Инициатива трёх морей», контроль в Арктике

(责任编辑 崔珩)